特别报道：大厂用人术 60
诺奖经济学奖：研究“半边天” 34
寻找吸引外资新增长点 40
中国电动车欧盟调查风暴 46
谁是“终极电池”？ 54
肿瘤基因检测断臂求生 78

财新周刊

Caixin Weekly



加沙困与斗

这场突然打响的战争究竟将怎样展开、持续多久，
对巴以和平进程乃至中东的地缘格局
又将投下何种深远影响？

P.18

2023年 第40期 10月16日出版
总第1076期
邮发代号：32—235
ISSN 2096-1251
定价：人民币40元 港币60元 www.caixin.com

当地时间 2023 年 10 月 8 日，加沙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从加沙发射火箭弹。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最新封面报道｜加沙困与斗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电报频道：https://t.me/ Qikan2023

这场突然打响的战争究竟将怎样展开、持续多久，对巴以和平进程乃至中东的地缘格局又将投下何种深远影响？

文丨财新周刊 王自励，罗子琳（实习），曾佳

2023年10月7日是犹太教安息日，也是以色列住棚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清晨六七点钟，突然拉响的一连串刺耳防空警报，将笼罩在朦胧天光中的耶路撒冷彻底叫醒。

这座希伯来语意为“和平之城”的古老城市，近年少有防空警报响起。许多睡眼惺忪的耶路撒冷居民，尚来不及搞清楚袭击从何而来，仅凭常年演习训练出的习惯，纷纷跑向住楼配备的安全屋躲避。

在许多以色列人的记忆中，这是“最糟糕”也“最漫长”的一天——从清晨开始，爆炸的巨响和警报声便接二连三传来，天空中不断升腾起火箭弹被拦截后的白烟。激烈反对以色列国家存在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一天之内向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以色列中部和南部地区，密集发射了至少3500枚火箭弹。作为回击，以色列随后亦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持续轰炸。

在鲜遭火箭弹袭击的耶路撒冷，许多公寓楼加强了安保防卫，住户们也抓紧添置必要物资，节日本该轻松的气氛变得凝重。“第一天几乎都在躲警报。”耶路撒冷的中国留学生冯安对财新表示，即便躲在地下室的防空洞，仍能感受到火箭弹被拦截引发爆炸所带来的巨大震动，还能听见战斗机不断从空中飞过。

10月8日，袭击后第二天，冯安便立即收拾行囊，从耶路撒冷乘大巴投奔特拉维夫的亲友。当时，在通往特拉维夫的公路上已看不到私家车，往来的大多数是以色列士兵。之所以选乘大巴，也是因为特拉维夫及以南地区的火车已全部改为军用，不再搭载平民了。

耶路撒冷等地遭遇的火箭弹袭击，只是一场更大规模血腥进攻的序幕。



2023年10月10日，以色列莱伊姆，音乐节场地附近被摧毁的车辆。 图:Ilia Yefimovich/ 视觉中国

在火箭弹的掩护下，约1500名哈马斯的武装人员，炸毁以色列军队在加沙边境修筑的围栏和路障，分乘摩托、皮卡、快艇、滑翔翼等交通工具，从陆海空三路潜入以色列南部，向至少22个以色列人的城镇、集体农庄和军队营房发动袭击。

此后赶来增援的以色列国防军在与哈马斯武装分子激战后，不得不面对数十甚至数百具尸体散落四处的骇人景象，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婴儿。另有约150名失踪的以色列人和外国人，被挟持至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大本营，至今生死未卜。

主政以来一贯以对巴勒斯坦强硬形象示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袭击发生的第一天即向哈马斯“宣战”，以色列内阁还启动了数十年未使用的战时条款，并解除了对以军交战规则的所有限制。尽管扬言以色列将进行“强有力的报复”，并声称将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追击到哈马斯藏身的每一个角落”，但在此次袭击发生前正深陷

内争泥淖的内塔尼亚胡也警告民众说，以色列将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这场战争需要时间。它将是困难的。我们将面临艰难的日子”。

这是自1973年埃及、叙利亚向以色列发动突袭的“赎罪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军事防御系统遭遇的最严重破坏。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仍在持续的激烈交火，已酿成近年来巴以冲突的最重大升级。

截至10月13日，这场冲突已造成以色列方面军民共约1300人死亡；而在以色列持续轰炸下，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死亡达1500人。双方的死亡人数合计已超2800人。此外，哈马斯还挟持了约150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扣押在加沙境内。

袭击发生后的第四天，10月10日，以方宣布加强攻势准备，将紧急动员的预备军人数量从原本的30万人扩大至36万人。这一宣布，愈发增加了外界对以色列军队即将发动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地面进攻的担忧。分析认为，一旦以色列决定用地面部队进攻的方式全面打入加沙地带，残酷的巷战场景或很难避免，并将在这片仅有365平方公里、聚居着超过200万居民的稠密地区，酿成严重的平民死伤。

以色列军方同时表示，在击退越境攻击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后，其已重新有效控制遭哈马斯袭击的以色列南部和加沙地带边境地区。在以色列将兵力向南部边境一带集结之际，以色列政府还宣布对加沙地带实施断电、断水、切断食物和能源供应的全面封锁，以要求哈马斯释放其掳去的人质。



2023年10月7日，在这个美联社获得的视频中，一名参加音乐节的女性被哈马斯武装组织成员劫持。左边用阿拉伯语写着：“我们的人已经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视频截图)

在一些地区观察者眼中，这场意料之外的战争表明：在近年来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关系走向缓和，以及沙特和伊朗等多对区域宿敌走向和解的表象背后，一直生活在贫困、封锁或生存空间被切割之下的巴勒斯坦人的诉求若得不到正视，作为中东问题最核心矛盾的巴以关系，仍将不时掣肘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在哈马斯同以色列交战的首日，以色列引以为豪的情报和军事防线，便轻而易举地遭哈马斯攻破。这也令长期在与巴方对峙中占尽优势的以色列，不得不反思自身军事策略，以及近十余年来其对巴勒斯坦问题愈发强硬化的处理手段。

在近年来社会和内部政坛持续动荡的以色列，哈马斯此次未区分平民与军人且不惜公开掳掠人质的攻击行动，在一夕之间给了原本身陷司法争议案和政治漩涡的内塔尼亚胡庞大的国际同情，以及战时动员下的政治能量。

然而，这位三度出任以色列总理，并借美国支撑顺势打开孤立外交局面的以色列政坛老手，如今也正因其拒斥“两国方案”、长期推进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控制区的分割蚕食，以及削减打压巴勒斯坦治理当局管理能力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受到批评和检视。

随着以色列与哈马斯走向全面开战，伊朗在中东地区扶植的其他激进宗教武装势力亦卷入交火。外界不乏担忧，在加沙一带的巴以战火，恐蔓延成中东地区范围更广泛的冲突。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后，美国总统拜登在强调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之际亦警示：“敌对以色列的任何一方都不要试图从这一局势中获利”。



2023年10月12日，以色列，加沙地带边境附近的音乐节在被哈马斯袭击后的场面。图:Ohad Zwigenberg/视觉中国

哈马斯发起的这轮袭击，令以色列政军体制遭受公开羞辱，也让巴勒斯坦问题重回全球聚光灯下，但其针对平民的极端暴行亦遭到普遍挞伐谴责，使巴勒斯坦人的国际舆论处境更为局促。接下来，这场突然打响的战争究竟将持续多久、以怎样的形式展开，对巴以和平进程乃至中东的地缘格局又将投下何种深远影响？如今，冲突会升级和推进到哪个程度的发球权，又回到以色列一侧。外界正屏息注视。

以色列的“9·11”

从耶路撒冷转移到特拉维夫后，冯安仍不时需要在防空警报拉响时，躲进公寓的安全屋。从1993年开始，以色列政府强制要求所有新住宅和公共建筑内，都要修建门窗经特殊加厚处理的安全屋，用于冲突时紧急避险；旧的楼房则通常配有地下或半地下的防空洞。

尽管以色列已处于“战争状态”，在耶路撒冷攻读硕士的冯安暂时没有回国的打算：一方面，目前回中国的机票已涨到约2万元人民币一张；另一方面，她也担忧，在火箭弹纷飞的战时搭乘飞机“太赌了”。

同样身在耶路撒冷的中国留学生李平，则已成功从“战区”以色列撤离到意大利罗马。10月7日袭击第一晚，她与男友先从耶路撒冷驱车抵达以色列北部，再乘火车前往当地的机场——由于远离南方的激烈交火地带，当时以色列北部一带的列车和机场仍在运转。

李平告诉财新，进入“战争状态”后，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北部的城市，社会仍基本维持正常秩序，但家家户户都开始收拾平日通常用作储物间的安全屋，并开始囤积物资，“人们希望确保在安全屋里，备上至少能维持三天的食物和水”。

赶到机场后，李平才发现，预订航班起降的一号航站楼已关闭，只剩三号航站楼仍在运营。机场的电子屏呈现一片红色，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所幸，李平在接受了繁琐的安检后顺利登上离开以色列的航班，在战争打响后的第三天抵达罗马。

对哈马斯正式宣战后，以色列政府已在48小时内迅速宣布征召规模达30万名预备役人员，其后又扩大到36万。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征兵。根据最新统计，以色列大约有46.5万名预备役军人，每人每年最多可服役60天。

此前，由于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强推的司法改革，曾有大量预备役人员在以色列国内的政潮中拒绝服兵役，以示抗议。但在哈马斯袭击后，冯安和李平身边的许多好友都陆续被征召回军队，“这时候感觉，战争真的来临了”。

据李平介绍，预备役士兵通常不会被送往前线，而是被召至以色列境内的各个军事基地，为现役军人的行动提供支持。虽然他们也会为自身的安全担忧，但在以色列陷入危机之际，李平称，自己被征召的以色列朋友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应该去响应征召，回到军队”。

哈马斯在“赎罪日战争”50周年之际发动的这次突袭，似乎把措手不及的以色列拉回到1973年的梦魇。据CNN报道，不仅以色列，美国的情报机构亦没有事先察觉哈马斯将发动此类性质的袭击。

在50年前的那场“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情报系统也被认为出现了巨大失误。当时，埃及和叙利亚通过反复征召士兵、频繁调动军队等行动制造混淆，成功麻痹了以色列；并特意选在犹太教传统节日“赎罪日”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突袭，致使以色列在战争前期一度陷入被动。

本轮冲突中，以色列人的死伤亦达到1973年来前所未有的规模。截至10月12日，冲突6天以来，已有1300多名以色列人在哈马斯的袭击中丧生，另有约3300人受伤、150余人遭俘虏。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康里克斯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称，这次袭击称得上是以色列版本的“9·11事件”和“珍珠港事件”叠加在一起：“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以色列人在一场袭击中被杀死，更不用说敌人在一天内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活动了。”

北京大学以色列和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宇在接受财新采访时指出，近年来，巴以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和摩擦其实不断，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地区；但相比起此前的摩擦冲突，哈马斯这次在进攻上掌握了主动权，“哈马斯自己选择了时机，没有跟着以色列的节奏走”。

王宇认为，此次哈马斯的突袭将对以色列社会心理造成很大冲击。“自1973年以来，以色列就没有在本土遭受过这么大规模的袭击，人员上也没有遭受过这么大的损失。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情报系统和‘铁穹’防空系统，在此次袭击中也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在王宇看来，未来以色列社会恢复信心并非易事，这也将成为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的挑战。

以色列军方称，哈马斯在袭击以色列的第一天，就控制了加沙地带周边的至少3个以色列人定居点，这是2007年以来的加沙—以色列冲突中从未有过的。哈马斯武装人员直接攻入的以色列南部城镇达20多个，遭屠杀的1000多名以色列人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面对国际舆论指责的针对平民的暴力和人质劫持行为，哈马斯发言人哈姆丹曾回应称，哈马斯的目标虽非平民，但包括以色列方面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安插的“定居者”。他还称：“以色列南部的‘定居者’不是平民。定居者是占领的一部分，也是以色列武装部队的一部分。”

10月7日冲突首日，在距离以色列与加沙边界约5.3公里的Re'im集体农场附近，哈马斯武装分子还袭击了一个聚集3500人的电子音乐节。

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武装分子或乘滑翔伞从天而降，或开着摩托和卡车陆续抵达，并用AK-47突击步枪向当时正欢庆住棚节的年轻人们开火，引发人们仓皇逃命。还有一股武装人员事先埋伏在当地的防空洞附近，对听到警报来躲避火箭弹的人群进行射杀。音乐节现场发现了至少260具尸体，还有部分人被劫为人质，其中包括许多外籍游客。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还有约7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了接近加沙边境的以色列南部屯垦庄园Kfar Aza，并杀害当地的社区成员，尸体遍布小路、草坪、房屋和农庄内的其他地方。

哈马斯能从陆海空三路潜入以色列南部，对至少27个以色列边境的城镇、村庄和过境点直接发动袭击，其计划的周密程度和行动的协调一致性令外界惊讶。

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在这场跨境袭击的初始阶段，哈马斯武装人员首先利用无人机和直升机投掷了简易炸药，破坏了靠近加沙边境数座无人驻守的遥控通信塔和观察塔。2018年，哈马斯曾使用燃烧的风筝袭击以色列的边境通信塔，而使用无人机则似乎是首次。

随后，这些哈马斯武装分子用电锯将边境的防护网切出一个通道，驾驶摩托和卡车闯入以色列境内，同时配合皮艇、滑翔翼等从海空两路登陆以色列。

此次袭击中，哈马斯还与加沙地带的第二大武装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联合作战，尽管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存在分歧。在10月7日哈马斯突破以色列防线的数小时后，杰哈德武装人员也从加沙地带潜入以色列，并据称劫持了30名以色列人质。10月9日，还有杰哈德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对以色列士兵发动袭击。

在10月8日于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官员屡次强调，这次事态并非传统意义的“巴以冲突”，而是由“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发动的大规模袭击。

加沙掌控者

自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持续轰炸，即便是在夜间空袭也“一刻未歇”。联合国10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空袭已摧毁加沙地区的1000所房屋，至少12600间住房受损。由于失去家园或躲避轰炸危险，加沙地带已有近34万人流离失所，超过20万人只得在当地92所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开设的学校避难，但其中已有多所学校在空袭中受损。

随着冲突持续，以色列政府还在10月9日下令，在此前切断加沙供电的基础上，进一步阻断食品、燃料、电力供应，“全面封锁”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当地水电基础设施遭破坏的影响已波及数十万人。据联合国人道主义办公室10月12日发布的报告，加沙地区230万人口中，已有超过65万人处于严重缺水状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10

月12日表示，由于缺乏燃料，加沙已有两座海水淡化厂和三座废水处理厂停运，许多家长被迫要让孩子饮用不干净的水源。

位于西奈半岛东北部、地中海东岸的加沙地带，是一条总面积约36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长度约41公里，宽度为6公里至12公里。加沙地带境内主要由巴勒斯坦人聚居。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这里先是被埃及吞并，后又在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

2005年，以色列开始从加沙全面撤军，并放弃了当地所有以色列“定居点”。但此后，加沙地带的外围边境、海岸线与领空仍受以色列控制，形同孤岛。在目前加沙的七个过境点中，以色列控制了除埃及与加沙间拉法赫（Rafah）过境点外的剩余六个。

自2007年起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是泛宗教政治势力“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于1987年在反对以色列占领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First Intifada）期间诞生。哈马斯旗下拥有一支武装部队“卡桑旅”，同时还在加沙运营着学校、医院等社会福利网络，这为深陷生活困境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对加沙高失业率下的许多贫困人口而言，加入哈马斯的军事分支成为受青睐的职业选择。

与在约旦河西岸执政的巴勒斯坦传统主导政治力量法塔赫不同，意识形态立场更为激进的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地位与生存权，且不放弃武力斗争路线，并强烈反对1993年巴以谈成的《奥斯陆协议》。这也成为宗教与世俗路线之外，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主要政治分歧。

尽管哈马斯的据点在加沙，其影响力亦延伸到约旦河西岸、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以及卡塔尔和埃及等中东国家。在地缘对立严重的中东，哈马斯被视为与伊朗、叙利亚政权和黎巴嫩真主党同属一个阵营。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等许多西方国家和机构，则将哈马斯或其军事部门列为恐怖组织。

作为20世纪90年代巴以和谈的成果，巴勒斯坦民族在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全境实现了有限自治，目前控制着两地共约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

1994年成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作为政治权力机构，代表巴勒斯坦人在巴方所控地区行使有限的自治权。2005年，阿巴斯接替巴勒斯坦已故领导人阿拉法特，出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2008年，阿巴斯当选巴勒斯坦国总统，并连任至今。

但在2006年1月的第二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阿巴斯领导的立场相对温和的法塔赫，却意外败给激进派的哈马斯。巴勒斯坦这两大主要政治派别之间的“夺权”之争，从此日渐公开化。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无人区。图: Leonard Freed/IC photo

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哈马斯通过武力，从法塔赫手中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法塔赫则继续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后，巴勒斯坦的两块管治范围陷入两派分治，这一对立状态持续至今。

2007年哈马斯主政加沙后，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实施封锁，严格控制其物资与人员进出，导致加沙地带近230万人口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特别是电力、燃气和饮用水严重短缺，陷入人道主义危机。

据统计，加沙当地的失业率已从2007年封锁前的23.6%，上升到2022年底的47%。总部位于日内瓦的欧洲地中

海人权监测组织称，加沙地区的贫困率也从2005年的40%上升到2022年的61.6%。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数据则显示，加沙95%的人口没有干净用水，80%以上的人口依赖援助。



大约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在戈兰高地作战的以色列炮兵。图:Terry Fincher/ 视觉中国

以色列封锁加沙后，哈马斯一度利用位于埃及和加沙边境的复杂走私隧道，将装备、武器和资金运入加沙，并通过对进口货物征税创收。此外，哈马斯的主要资金来源还包括从伊朗、卡塔尔等国获得的援助。美国财政部2019年披露称，此前四年间，哈马斯麾下的“卡桑旅”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获得了逾2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自2007年控制加沙以来，哈马斯便不断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军队和犹太人目标发动袭击。哈马斯指挥的武装力量及其拥有的大量武器，也由此成为以色列眼中的一大安全威胁。

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最新这轮袭击后，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轰炸报复，已造成当地惟一的发电厂完全关闭，生活服务基本瘫痪。而常年的动荡和封锁，本就令加沙面临平均每天12小时的定期停电困境。



1973年10月14日，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坦克在叙利亚前线前进。图:Gabriel Duval/ 视觉中国

此前，由于电力短缺，加沙全域所有的13家医院不得不依靠备用发电机维持夜间正常运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0月12日警告称，失去电力导致的医疗仪器停摆和紧急手术的搁置，将可能把“医院变成停尸房”。

自10月7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在法塔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也有至少27名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冲突中丧生。

据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PCPSR）2023年6月的民意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民众认为，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政治分歧是巴以斗争以来“最具破坏性”的事态。同时，超过一半的巴勒斯坦人表示，其将在未来的选举中支持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



1982年6月，黎巴嫩西顿，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士兵在“加利利和平行动”中占领了港口城市西顿。图:Bryn Colton/ 视觉中国

近年来，由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深陷腐败丑闻，被指治理能力低下，且无力反抗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社区的强硬作为，阿巴斯及其领导的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声望日益下降。相比之下，主张激烈对抗以色列、军事斗争活跃的哈马斯，则收割了更多民意，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代表性明显上升。

百年恩怨何来

巴以之间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最早可追溯到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当时，随着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战败，地理上被称作巴勒斯坦的地区，沦为战胜国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21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东部建立起外约旦酋长国（即今日的约旦王国），西部则仍称巴勒斯坦（即今日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当时的英国政府通过发表《贝尔福宣言》，承诺将支持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此后，散落在各地的犹太人陆续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当时，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只有大约5.5万名犹太人，当地仍以阿拉伯人占多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许多欧洲的犹太人欲逃离迫害、寻找新的家园，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移民开始成规模增长和聚集，并与原居于当地的阿拉伯人发生了许多血腥冲突。与此同时，反对当时英国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暴力事件也不断增多。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在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而地处巴勒斯坦中部，作为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发源地的耶路撒冷，则被规定为“独立个体”，置于特殊国际政权之下，由联合国管理。

1948年5月14日，以犹太人为主体的以色列国正式宣告成立。第二天，英国即宣布结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托管统治。但由于联合国的分治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及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未能诞生。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后，围绕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曾爆发5次大规模战争。

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77%的土地，以及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地区。一半以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居民要么逃离，要么被驱逐出了巴勒斯坦，他们流散到周遭的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等地沦为难民。

1956年7月，英国、法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联手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闪电战，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

战争最终以埃及在美苏的干预下赢得苏伊士运河的全部主权，以色列军队同意撤出西奈半岛而收场。

1964年5月，由法塔赫等多个政治派别组成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下称“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成立。巴解组织成立后，其武装派别对以色列频繁发起的袭击，以及第二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逐渐呈现的团结之势，都对以色列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在此情况下，1967年6月，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场仅持续了6天的闪电战，以阿拉伯国家战败并遭受严重损失而收场。

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占领了本由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本由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以及叙利亚所控制的戈兰高地等共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战争中，约100万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

为了收复失地，埃及、叙利亚在经过周密准备后，于1973年10月6日突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开始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

由于选在犹太教赎罪日当天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战争初期，埃、叙军队一度占上风，使得以色列军队遭受了较大的挫败。此后，随着战况逆转，双方陷入对峙，最终在国际社会斡旋下达成停火。

1982年6月爆发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则是以色列以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刺杀为由，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人，对邻国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以色列发动这场战争，旨在打击当时活跃在以色列以北的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武装势力。当时，以色列军队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南半部地区，并最终迫使巴解组织游击队从黎巴嫩撤出。

长年的战争，令阿以双方都感到不堪重负。1991年10月，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组成的阿拉伯代表团两方，终于第一次坐到谈判桌前，尝试解决40余年的冲突。

1991年的首次会谈，构筑了此后历轮阿以和谈的基本框架和原则，标志着中东和平进程正式启动。这次会议确立了“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即让以色列通过归还它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各方领土，换取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和平相处。

1993年，巴以双方在挪威奥斯陆进行了历史性对话，签署《奥斯陆协议》，确立了和平方案的框架。

这一里程碑式的协议，也让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分别建国的“两国方案”，成为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解决巴以冲突的政治基础。

该方案主张，建立一个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的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家。

当时，巴以双方还约定，将在两年之内，针对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的最终地位重启谈判，谈判还将包括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犹太人定居点问题等棘手的核心议题；当时双方约定，到永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之前，这一过渡期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五年。

然而，《奥斯陆协议》签署仅两年后，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就遭到了犹太极端分子刺杀。巴以和平进程由此陷入停滞。

尽管自1993年里程碑式的《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巴以双方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曾进行过多轮谈判尝试，但由于巴以各自的内部政治形势变化，以及双方激烈的立场分歧，再加上国际和地区政治气候变化等种种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巴以和谈便未再取得实质性进展。

哈马斯铤而走险

“今天，人民正在重新获得他们的革命。”10月7日袭击开始后，哈马斯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德伊夫在一段10分钟的录音中表示，为了报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一系列暴力行径，哈马斯决意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行动，从而“让敌人明白，他们肆无忌惮、不受追究的时代已经结束”。

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一直谋求以1967年战争爆发前的巴以边界为基准，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但自2014年巴以和谈中断以来，巴以冲突烈度不断升高，2022年更成为联合国有记录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伤亡最惨重的一年。以色列的强势地位，以及巴勒斯坦控制区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均被割裂的现实，都令巴勒斯坦建国的目标愈发遥遥无期，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处境的关注和声援也在减弱。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认为，此次哈马斯在发动大规模火箭弹袭击的同时，还采取了攻击平民、劫掠人质等不寻常手段，正是为了在国际社会造成一种“轰动效应”，让世界将目光重新聚焦巴勒斯坦问题。

他向财新指出，近年来，相较于约旦河西岸地区涌现的一些小型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近年来在反抗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社区生存空间方面的表现其实相对沉寂。再加上，加沙地带的民生状况正不断恶化，当地民意已开始浮现针对哈马斯治理不力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哈马斯急需这样一场大规模行动，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乃至全世界证明自己。”

然而，在与以色列整体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哈马斯对以色列不区分平民和军人的攻击和杀害，近乎一种“自杀式袭击”，并将招致以色列的毁灭性报复。

哈马斯缘何铤而走险？这或与近年来美国公开“挺以”的政策和中东地缘格局演变之下，巴以之间处境和力量对比急剧失衡有关。

特朗普2017年就任美国总统后，在四年任期内，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大幅度往以色列一方倾斜。

2017年12月，特朗普宣布正式承认地位和归属仍存争议的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这一举动，已背弃了此前美国对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的坚持。

2019年，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政府在未经与巴方商议下，径自推出所谓的“世纪协议”解决方案。该方案主张将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不变动耶路撒冷东西两部的现有范围和由以色列控制的状态，使以色列能继续握有1967年后由以色列武装夺取、迄今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东耶路撒冷。

由美国、以色列主导的这一方案虽然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但又要求巴勒斯坦所辖区域内的巴方主权必须受限——包括要维持并承认以色列安全力量在当地的权力；要接受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空域的控制；巴勒斯坦各派力量还必须“非武装化”。该方案还主张，以色列以“反恐防御”为由在耶路撒冷东部所建筑的隔离墙，应得到保留，并应作为未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的两座首都的分界线。

美以起草的这一方案，还承认了以色列现有在约旦河西岸设置的犹太人定居点的“主权”，但约束以色列必须在未来四年停止扩建定居点。

对于美方这些立场明显偏颇的“调停”动作，巴勒斯坦方面予以强烈拒绝和抵制。

作为施压手段，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8月底宣布中止美国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机构的资助，还在当年9月宣布关闭巴解组织驻华盛顿的办事处。

与几乎“一边倒”支持以色列的特朗普不同，2021年就职的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早在竞选期间就一直积极主张维护“两国方案”，并承诺将帮助恢复巴以双方的接触。对于以色列右翼政府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拜登也屡次公开表示反对。

不过，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尚未恢复被特朗普政府下令关闭的巴解组织驻华盛顿的办事处，也没有撤销特朗普时期将美国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在拜登任内，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聚居地进行切割和蚕食的土地扩张举动，也未得到实质上的约束和遏止。

2023年9月27日，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温内斯兰在安理会进行例行报告时指责以方说，仅在过去三个月中，以色列方面多新建了1万多套住房。温内斯兰称，以色列人定居点的扩张，进一步巩固了非法占领，助长了暴力，阻碍了巴勒斯坦人对其土地和资源的使用，“系统性地削弱了巴勒斯坦国的生存能力”——而巴勒斯坦国的生存能力，是两国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的促成下，以色列在2020年，陆续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突破了以往在本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中，仅有作为邻国的埃及和约旦两国与以色列建交的孤立局面。

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法里兹·马赫达维2021年接受财新专访时指出，特朗普政府欲通过促成阿以建交潮，帮助以色列变成“中东的一个正常国家”，并“改变整个巴以和平进程的形势”。在他看来，以色列政府则希望借此举，将巴勒斯坦从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中孤立出来，“如此一来，巴勒斯坦人就会感到孤立无援，然后就会接受以色列可以强加给他们的任何条件”。

对此，以色列方面也并不讳言。在2023年9月于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内塔尼亚胡颇为自矜地夸耀道，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将迫使巴勒斯坦作出让步。他还称，巴勒斯坦人口仅占阿拉伯世界人口的2%，不能让巴勒斯坦问题阻碍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内塔尼亚胡当时如此诠释自己的战略：“当巴勒斯坦人看到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已经与犹太国家和解时，他们也更有可能放弃摧毁以色列的幻想，最终走上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道路。”

在此次袭击爆发之前，拜登政府正积极推动在海湾地区具领袖地位的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美、以、沙三方磋商的协议，沙特将承认以色列国家的正当性，并愿意在2024年初提高原油产量抑制油价，以换取美国为沙特提供武器销售、安全保障和帮助沙特建设民用核项目。

然而，这一阿拉伯多国和以色列关系逐渐改善的趋势，令身处以色列强势政经和安全压力下的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愈发感到不安，并滋长了长期主张武力对抗路线的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挑衅行动。

“虽然哈马斯袭击的是以色列，实际上也是在向沙特示威。”丁隆指出，沙特作为“阿拉伯世界领头羊”和“伊斯兰世界盟主”，不仅在政治和精神层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沙特还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援助。对巴方来说，沙特与以色列一旦建交带来的冲击，或将是难以承受的，因为倘若这一趋势成为现实，“从此巴勒斯坦问题可能被彻底边缘化，甚至所谓的巴勒斯坦建国事业也会没有了”。

10月7日新一轮冲突爆发后，在包括巴林、摩洛哥、土耳其、也门、突尼斯和科威特等地，中东各地区频频上演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民众示威活动。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对财新指出，哈马斯打着“维护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的旗号发动此次袭击，目的正在于动员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情感，支持巴勒斯坦对抗以色列。在他看来，考虑到当前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舆论压力，这场冲突势必令沙特与以色列建交的进程大大延缓。

此轮巴以对抗骤然升温后，沙特政府在第一时间发布的声明中，并未谴责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暴力行径，而是呼吁“双方保持克制、立刻停止升级”。在这份立场声明中，沙特还重申其“一再声明的警告”——认为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土地的持续占领，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剥夺和持续的系统性挑衅”，巴以局势有可能被引爆。

但在丁隆等观察者看来，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虽将遭到迟滞，但不会被完全被阻止。



2023年10月11日，加沙城，巴以冲突持续至第五天，一名受伤的巴勒斯坦男子被送往医院。图：Ashraf Amra/视觉中国

从2020年起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多国建交，再到2023年沙特与伊朗实现和解，近年来在地缘纷扰缠斗不休的中东，已有越来越多的域内国家，希望摆脱传统的政治冲突和对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民生。在这种“缓和潮”之下，沙特与以色列建交亦是“大势所趋”。

以色列神话失色

无论此轮冲突最终如何收场，军事上被视为弱势一方的哈马斯，此次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密集发射数千枚火箭弹，其武装人员更在火炮的掩护下，出人意料地从陆海空多线协同进攻，并成功突破安全屏障潜入以色列境内。这已令以色列情报和军事防御工程“固若金汤”的神话黯然失色。除了军事面的冲击，此次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得以遂行，或还将对以色列的安全感、社会共识的走向乃至国际人才流动与营商环境的评估，带来长远的影响。



2023年10月8日，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被以色列空袭摧毁的清真寺。图:Said Khatib/视觉中国

尽管以色列军队和政府支持的定居者自2005年已彻底撤出加沙地带，但以色列仍控制着加沙地带的领空，并与加沙共享陆上边界和海岸线，实际上掌控着加沙地带的进出审查权。

除了定期在以色列南部与加沙接壤的边境地带巡逻，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还通过安装传感器、摄像头和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实施严密的全方位监控。

然而，在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突袭当天的短短数小时内，这一看似森严的以色列边防系统不断遭到突破：社交媒体流出的视频显示，持枪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用推土机拆除带刺的金属网围栏，炸毁过境点的混凝土路障，开着皮卡和摩托冲入以色列境内；还有哈马斯武装人员乘坐快艇和动力滑翔伞，从海空两路潜入以色列。



2023年10月9日，以色列空袭加沙城。图：Mahmud Hams/视觉中国

在袭击的最开始，这些哈马斯武装分子便已成功将大部分以色列人质挟持，并转移到加沙境内。面对如此复杂但协调一致的进攻，以色列的边防基地却几乎毫无防备。一些以色列士兵甚至是在宿舍中睡觉时遇袭的。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高级研究员科比·迈克尔（Kobi Michael）对财新表示，此次以色列情报和安全部门的失误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战术上，边境的监视和远程操控系统未能提供有效情报；其次是战略上，以色列当局对哈马斯及其行动模式和意图产生了误判。

过度依赖技术监控手段获取情报，可能让以色列低估了哈马斯突破侦察进而大规模渗透的能力。

另据《纽约时报》披露，哈马斯正是利用了无人值守的远程遥控边境摄像头、传感器和机枪也可以被远程摧毁的弱点，发动无人机摧毁了调动这些监控系统的蜂窝通信站和信号塔，继而令整个以色列边境的预警和协调指挥系统彻底瘫痪。

最终，共有超过1500名加沙的武装人员，从以色列南部边境的近30个突破口潜入，他们至少冲破了四座以色列的边防军事基地，并且全程没有遇到阻击。

此次行动前其实蛰伏已久的哈马斯，亦做了长期的秘密训练和准备。

据路透社援引接近哈马斯消息人士的报道称，哈马斯甚至在加沙建造了一个模拟的以色列定居点，并在那里练习如何抢占据点和袭击，还制作了演习视频。

为了确保行动计划不外泄，参与演习的约1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均未被告知自己为何受训，甚至连一些哈马斯的领导层都被蒙在鼓里。

许多军情专家指出，考虑到哈马斯此次袭击的规模和作战种类，其训练活动和部署理应难逃以色列先进情报系统的捕捉。

“或许哈马斯的事前准备情况依然大致符合他们的‘标准操作’（SOP），同时他们特意做得比较模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中东问题的教授巴内特（Michael Barnett）向财新如此推测，“就像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前夕，埃及和叙利亚所做的那样。”

孙德刚则指出，过去一年里，内塔尼亚胡在国内强推司法改革引发的争议和社会分歧，已经耗费了以色列政府相当大的精力；在安全政策上，以色列军队则将防御重点，放在近年来小规模恐袭活动高发的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反而忽视了靠近以色列南部、长期受围困的加沙地带。“强者对弱者容易产生轻视，以色列自认为对加沙的军事封锁较为牢固，所以可能轻敌大意了。”

自2021年5月哈马斯与以色列在激烈交火11天后达成停火以来，过去两年间，尽管另一支以加沙为基地的激进武装组织杰哈德频频向以色列发起火箭弹袭击，哈马斯的表现却相对低调，并未向以色列发动重大军事挑衅。

这也可能让以色列误以为，只要给予控制加沙的哈马斯经济激励——比如放松对加沙物资和人员流动的管控等，哈马斯便不至于发动一场与以色列的战争。

在另一些观察者看来，此轮冲突不仅暴露了以色列军情系统的漏洞，更反映出以色列对哈马斯和加沙采取的政治军事战略亟须反思和调整。

以色列专家迈克尔向财新指出，长期以来，以色列并不主动发起进攻，对哈马斯挑衅的军事回应也都相对节制和对称，其目标正是维持局势的“平静”（calm）。

同时，以色列还希望通过提供经济上的好处，一方面约束哈马斯的武装活动，同时确保巴勒斯坦两大权力派别——控制加沙的哈马斯与控制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维持裂痕。

然而，以色列这样做的“漏洞”也显而易见：哈马斯得以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巩固自身在加沙地带的政治权力，同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并暗中发展自身军事能力，为大规模进攻的那一天做好准备。

在迈克尔看来，从以色列的角度看，“这一战略是失败和错误的。并且不幸的是，我们为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据《纽约时报》援引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常务董事、退役少将塔米尔·海曼（Tamir Hayman）的说法，以色列军方对哈马斯并不抱有幻想，并已认识到这个控制加沙的激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与主导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完全不同——前者永远不会接受对以色列国家的存在给予任何形式的承认。

但海曼坦言，原本对以色列领导人来说，哈马斯仍是值得交涉和谈判的对象，因为控制着加沙的哈马斯，本来能帮助以色列管束当地其他的巴勒斯坦激进武装分子和抗议者，从而帮助维护局势的稳定。

在迈克尔看来，随着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式向哈马斯宣战，旧的加沙战略也将被大幅改写，由新的军事清剿计划取代。“如今，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以色列已决意消灭哈马斯的军事力量，改变原有的安全架构，确保未来哈马斯将无法再从军事上威胁以色列——无论是继续扩大轰炸还是发动一场地面进攻，以色列将为此采取所需的任何手段。”

走向全面进攻

自2007年哈马斯击败法塔赫、取得加沙控制权以来，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就日渐陷入一种模式化的暴力循环：每当遭到哈马斯的袭击挑衅，以色列就对其实施程度有限的打击，但不寻求完全推翻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在冲突烈度骤然升高的情况下，则由埃及等国际斡旋力量介入，促成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此后，以色列通常会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以允许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加沙；相应地，哈马斯则会进一步管束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斗争活动，避免对以色列发动更多袭击。

这种目标仅限于遏制其发展，而非摧毁哈马斯军事和生存能力的妥协模式，是否真能维护以色列的安全，正在受到检视。

在10月7日开始的这轮哈马斯进攻已造成逾千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百余名人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以色列正准备对加沙发动一场大规模、或长达数月的地面进攻，以全面终结哈马斯从军事上威胁以色列的能力。

近年来，围绕主动进攻加沙、派遣地面部队等问题，以色列政府的立场一直较为保守，对哈马斯的反制多以空

中轰炸为主，希望尽量避免卷入扩大性的全面冲突，并减少大规模人员伤亡带来的国际舆论压力。

2014年的加沙战争，是以色列军队最近一次直接攻入加沙进行的地面作战。当时这场长达50天的流血冲突，造成超过2200名巴勒斯坦人和超过70名以色列及外国人死亡，另有上万人受伤。

为提高哈马斯发起武装挑衅的成本，并缓解加沙的人道主义困境，以色列近年来对加沙地带的贸易限制和药品、水、燃料供应等管控有所放宽，同时还采取一定措施，帮助促进当地出口和改善破旧的公用设施。

自2018年以来，以色列允许卡塔尔向哈马斯输送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以增强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维持和平的经济动力。以色列还允许越来越多的加沙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境内工作，以赚取更高的工资供养家庭。截至今年1月，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加沙居民的工作许可证发放数量已从两年前的2000份至3000份，飙升至近2万份。

在2018年初以色列执政党利库德集团的会议上，内塔尼亚胡就针对为何允许加沙地区接受卡塔尔等外国资金援助解释道：帮助哈马斯维持对加沙的统治，进而确保哈马斯与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之间陷于对立和分裂，能更有效地阻止巴勒斯坦的建国事业。

然而，最新这轮冲突事态令以色列意识到，即便在看似享有绝对军事和情报优势的情况下，以色列仅凭在经济上给予空间的羁縻政策，便想将哈马斯的活动维持在一定烈度以下的愿望，恐难实现。

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当前最棘手的挑战之一，是如何确保上百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和外籍人质的安全。此前，在2006年哈马斯绑架一名年轻以色列士兵沙利特（Gilad Shalit）事件中，尽管当时以色列也对加沙展开猛烈的轰炸报复，但直到五年后的2011年，哈马斯才在以色列政府同意交换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的让步下，最终释放这名以色列人质。

目前，哈马斯已发出威胁称，若以色列继续无预警地轰炸加沙地区的民房，就将开始公开处决人质。但在哈马斯尚未停止进攻、以色列国内民意激愤的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恐难有妥协让步的空间。

“现在没有与哈马斯谈判的余地——只有当他们屈膝投降，没有任何军事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通过谈判来解决人质问题。”迈克尔向财新如此阐释以方的立场，“哈马斯必须明白这一点：如果不释放人质，他们将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然而，令外界担忧的是，考虑到加沙有限地理空间内的稠密人口，以及当地平民住宅同军事营地混杂的情况，若以色列大举动武进攻加沙，将难以避免极大数量的平民伤亡，更可能直接危及仍困在当地的100多名人质的生命。

随着加沙冲突的持续，在约旦河西岸、黎巴嫩等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其他地区，也可能进一步涌现反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武装抗议活动，从而酿成更多暴力事件和伤亡。

另一方面，虽然以色列在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及后勤等方面占据巨大优势，但哈马斯也已从多年冲突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如今，他们不仅掌握了反坦克导弹、无人机等装备，还在加沙修建了许多坚固而隐秘、配备通信系统的地下隧道。

在以色列发动地面进攻之前，此次突袭中已展现惊人协同作战能力的哈马斯，很可能已做好充分准备。如今的哈马斯不仅熟悉以军的战斗方式，更懂得如何利用加沙高人口密度的城镇环境，增强自身的作战优势。

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袭后，作为以色列盟友的美国已大幅增强在巴以周边地区的军事威慑力量，包括调动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东地中海地区，加强在以色列周边地区的F-35、F-15、F-16和A-10等战斗机中队，并向以色列直接提供弹药、拦截器等军火支持。



2023年10月11日，一架F/A-18战斗攻击机从美军的“福特”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美国总统拜登派遣航母及其舰队前往东地中海地区，以示对以色列的支持，同时警告支持哈马斯的伊朗“要小心”。图：美国国防部/视觉中国

袭击发生以来，美以两国高层一直就局势保持密切沟通，美方更多次承诺将继续大幅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不过，白宫也已表明：美国无意调动地面部队介入冲突。



2023年10月11日，黎巴嫩Duhaira，以色列炮击后浓烟滚滚。10月8日，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向以色列军事阵地发动了导弹袭击。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11日以色列对黎以临时边界黎巴嫩一侧进行炮击，涉及5个村镇及周边地区。图 :Hassan Ammar/视觉中国

截至10月12日，白宫证实已至少有27名美国公民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另有部分美国公民沦为哈马斯人质。尽管拜登政府多次重申，以色列绝对有权利对哈马斯的暴力作出回击，但在以色列酝酿地面进攻之际，拜登10月11日透露称，他在近期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已呼吁对方克制，“以色列在所有的愤怒和沮丧中应该按照战争规则行事”。

目前仍不明朗的是，以色列若果真向加沙发动地面进攻，将寻求达成怎样的目标——是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能力，还是彻底推翻哈马斯的统治、进而直接占领加沙？

若以色列军队推翻哈马斯后留在当地，那么更棘手的挑战将在于，该如何治理这块拥有200多万巴勒斯坦人口的飞地——这也是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曾面临的困境。

若以色列在击败哈马斯后，选择再次从加沙撤军，那么当地留下的权力真空又该由谁填补？

巴内特认为，现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最希望避免的，仍是这场地面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伤亡。



2023年10月11日，加沙城，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图:Hatem Moussa/视觉中国

他预计，接下来以色列或将首先派遣小规模地面部队进入加沙作战，希望能在尽量保障以色列士兵和人质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向哈马斯传递非常严厉的信号”。至于这场军事行动最终将如何扩大、持续多久、寻求实现哪些目标，则可能取决于以色列最终掌握的情报。

战争后续难料

尽管迄今为止，此轮冲突的大部分战火仍集中在加沙和以色列南部的边境地带，但随着同情巴勒斯坦、受到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于10月8日向以色列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火箭弹袭击，连日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紧张局势的升高，令外界对这场冲突进一步外溢的担忧加剧。

被美国、欧盟、阿盟等列为恐怖组织的黎巴嫩真主党，是伊斯兰什叶派武装和政治组织，在黎巴嫩属合法政党之一，在国会拥有席位并参与联合执政。黎巴嫩真主党以消灭以色列的存在、驱逐西方势力为宗旨，历史上曾多次同以色列爆发冲突。

截至10月10日，以色列北部的黎以交界地带已连续三天响起炮火声。双方的相互炮轰已造成黎巴嫩真主党数名成员丧生、至少一名黎巴嫩军人受伤，还有多名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方区域的武装人员被以军打死。与伊朗联系紧密的黎巴嫩真主党称，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意在“声援巴勒斯坦的抵抗力量”。



2023年10月9日，美国纽约，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并造成700多人死亡后，人们参加在以色列总领事馆前举行的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图:Fatih Aktas/视觉中国

10月10日晚些时候，以色列军方还称其发现了多枚迫击炮弹从叙利亚射向以色列，其中几枚落入以色列境内的空旷地带；以军则用炮击予以回应。《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叙利亚安全官员的说法称，这些迫击炮弹是由伊朗支持的民兵从戈兰高地附近发射的。

10月12日，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色列向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国际机场与阿勒颇机场发动了空袭，损坏机场跑道，导致这两个机场瘫痪。

在哈马斯等亲伊朗武装发动袭击背后，以色列地区劲敌伊朗的角色格外受关注。

伊朗政府被视为哈马斯的主要支持者，为其提供财政和军火援助以及作战训练。黎巴嫩真主党亦于上世纪80年代受伊朗资助建立，被认为是伊朗操控黎巴嫩政局、在中东扩张势力的主要凭借力量。



2023年10月8日，美国纽约，在抗议区的另一边，一群亲以色列的示威者聚集在一起，举着以色列国旗。两拨人之间偶尔会发生口角和相互奚落。图：Allan Tannenbaum/视觉中国

在地区冲突中扶持“代理人”、扮演幕后操纵角色，也一贯被视为伊朗维系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方式。过去，伊朗与其长期对手沙特分别介入也门、叙利亚等地的战乱，以争夺地区主导权。直至今年3月，已断交七年的伊朗和沙特才在中国的斡旋下实现和解，缓步启动关系正常化进程。

10月8日，《华尔街日报》援引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信源报道称，伊朗的武装力量之一——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花费了过去几周的时间，参与策划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意外袭击。该报道还声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此前于黎巴嫩贝鲁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哈马斯的这次行动“给予了最终首肯”。

然而，伊朗政府已多次明确否认其参与哈马斯的袭击行动，哈马斯军事官员也强调，发动袭击是哈马斯自己做的决定。伊朗总统莱希更在10月11日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首次通电话，讨论当前巴以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莱希与穆罕默德讨论了“停止针对巴勒斯坦人战争罪行的需要”。

美国政府亦表态称，美方尚未看到伊朗直接参与或幕后支持哈马斯袭击的证据。

在巴内特看来，若伊朗被证实卷入其中，则以色列政府将面临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的压力，包括打击伊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事设施。

不过，据他判断，目前以色列政府希望尽量避免多线作战，因此将首先专注应对加沙地带的局势，然后再处理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问题。随着冲突的继续，伊朗可能对哈马斯加码军事等方面的援助，但伊朗应该也会“尽量确保不引发一场地区全面战争”。

回到以色列国内，这场持续发酵的危机将对以色列社会及政坛的未来走向投下何种影响，目前仍难有定论。

王宇指出，一方面，哈马斯在以色列境内制造的暴行，已点燃以色列公众的普遍愤怒，未来以色列民众对巴勒

斯坦人乃至以色列阿拉伯裔公民的敌意和抵制情绪势必会进一步增强；但另一方面，这场造成大批以色列人伤亡和人质被俘的危机，又是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史上最右翼”政府任内发生的，待危机平息后，以色列社会启动问责时，内塔尼亚胡政府将难逃酿成安全局势“破口”的主要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以色列社会和政坛的气氛会不会进一步右转，仍有待后续观察。

作为以色列政坛的“不倒翁”，内塔尼亚胡曾三度出任总理，合计执政时间超过15年，为以色列建国以来掌权时间最长的总理。任职期间，内塔尼亚胡以其鹰派形象著称，在巴以问题、伊核问题上始终持强硬态度。

尽管身陷多项腐败指控，在2022年11月的最近一次大选中，内塔尼亚胡依然领导右翼联盟重新登台，组成了一个包括多个极右翼政党在内的政府。此次与内塔尼亚胡结盟主政的“宗教锡安主义者”党持极右翼立场，其纲领甚至包括完全兼并约旦河西岸地区。

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以色列舆论场在激愤之余，也浮现出一些对内塔尼亚胡愈发趋于强硬化的巴勒斯坦政策的批评和反省声音。

犹太裔喜剧演员、哈马斯袭击时身在耶路撒冷的Daphna Baram在发表于《卫报》的文章中，就对以色列长期封锁加沙的政策反思道：“如果你把200万人关在地球上最大的集中营里，偶尔用炸弹炸死数千人，那么你就制造了一座火山，总有一天会在你面前爆发。”

希伯来语杂志Local Call记者Orly Noy则在《卫报》的专栏文章中说，尽管不应该“淡化或宽恕哈马斯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提醒我们自己，哈马斯现在对我们施加的一切，都是我们多年来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

以色列《国土报》在哈马斯袭击后第二日刊发的社论中则指出，当内塔尼亚胡在建立一个以“吞并和剥夺（巴勒斯坦控制区）”为目标的政府时，在奉行“公开无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权利的外交政策”时，内塔尼亚胡“完全没有察知到——他正有意识地将以色列带入危险之中”。

这篇社论还批评道，虽然此次哈马斯发动的袭击行动中，以色列军事和情报方面的失败明显，但这并不能免除内塔尼亚胡对危机的总体责任，“因为他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事务的最终仲裁者”。

在丁隆看来，政治生存韧性极强、屡屡在争议和丑闻中涉险过关的内塔尼亚胡，虽在领导以色列作战期间不至于立即倒台，但“总会有政治清算的那一天”。

他认为，今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强推争议性的司法改革，造成以色列陷入社会撕裂、政治瘫痪的不正常状态，直接导致了以色列在哈马斯进攻面前的巨大军事溃败。而这一次危机带来的创伤和损害，则可能是以色列国家和人民都无法承受的。

10月13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布警告，要求位于加沙北部的110万平民为自身安全计应撤往加沙南部，“此地即将成为战场”。

文中冯安、李平均为化名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闻丨巴以冲突全解读

版面编辑：刘潇

社论｜优化民营经济法治环境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是最有效的“定心丸”



2023年10月11日，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一生产电动车的民营企业的员工在装运出厂的新车。图：视觉中国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再出重要司法文件。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进一步释放出决策层增强民营企业家信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积极信号。不过，正所谓“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指导意见》须尽快不折不扣地执行，民营经济法治环境才能持续优化。

近20年来，力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不算少。单是中央层面便先后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等四部专门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综合性重要文件。最新一部是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指导意见》便是中央精神在涉企案件审判执行环节的具体落实。《指导意见》提出了27条明确、细化的具体要求。这些要求大多并非首次提出，却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提到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人们常津津乐道“五六七八九”（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然而，这既非唾手可得，又非固若金汤。投资额、工业营收、民企税收等指标显示，民营经济的年均增速正在逐级而下：近五年（2017—2022）平均增速高于近三年，近三年（2019—2022）平均增速高于近一年，去年又高于今年上半年。它既是中国经济增长压力加大的缩影，又拉低了中国经济的增速。这一严峻形势应当引起全社会的警觉。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预期不稳，原因错综复杂，一个突出因素就是他们担忧企业产权和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这并非自扰。侵害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对企业家超期羁押、非法扣押处置企业家和企业资产、用刑事案件处理经济案件等现象仍比较普遍。个别涉企案件争议极大，“力排众议”作出的判决令民营企业家们忧心忡忡。

《指导意见》要求，强化涉企产权案件申诉、再审工作，健全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依法甄别纠正机制。这是各级法院的当务之急，因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各级法院对于涉企冤错案，应当克服重重阻力，有错必纠。2017年底，最高法院决定对张文中、顾雏军、江苏牧羊集团等三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涉产权案件启动再审并依法改判，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2017年到2022年，全国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涉产权刑事冤错案件256件361人。此番与《指导意见》同时发布的还有12个涉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这些案例表明，纠错努力一直在持续，不过，传播声势明显不足，这就难免影响其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效果。这些冤错案当初的冲击有多大，纠错时的声势就该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健全常态化冤错案件纠正机制，并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冤错案件产生。

涉企案件处置应当提高透明度，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近来，围绕社会广泛关注的个别大要案，猜测和传言不断。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司法机关应尽可能适时公开案情进展，避免不良的经济社会影响继续发酵。应加强对司法系统的社会监督，通过庭审直播、裁判文书上网等渠道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近年来，裁判文书上网

数量激剧减少，这显然不利于法治环境的改善。

在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格权方面，《指导意见》着墨颇多："依法惩治故意误导公众、刻意吸引眼球的极端言论行为，推动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舆论环境、法治环境。"这里，要厘清言论自由与违法犯罪的界限。认识问题是无法、也不应当用强制手段解决的。有些人利用互联网、自媒体等传播渠道，肆意侵犯企业家的名誉权，这类行为当然应当依法追究。民众基于义愤，常要求对某些人士"禁言""销号"，这其实并非良策，更可取的办法是让正确的声音顺畅发出，这样才能做到邪不压正。

近来，不断有学者呼吁在民营经济上实现理论重大突破。应当承认，目前涉及民营经济的理论确实存在方枘圆凿之处。人们各取所需，甚至一些"不正确的议论"也不失理论依据。因此，必须把为什么发展民营经济、如何发展民营经济等问题从理论上讲深讲透，并从制度和法律上体现所有制中性。有学者建议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入《宪法》，这是值得重视的。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持续优化法治环境，这不是经济增长压力下的权宜之计，而应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还应对过去数年的"收缩性政策"做出认真严肃的梳理，并坚决纠偏。政策出台前，应充分听取各市场主体尤其是各类型企业团体组织的意见，设置必要的提前量、过渡期或缓冲期。还要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贷款获得、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消除民营企业面临的各类壁垒。对于广大民营企业家来说，"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是最有效的"定心丸"。

（本文为即将于2023年10月16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40期社评）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民营经济新国策

版面编辑：李东昊

最新财新周刊｜寻找吸引外资新增长点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金融投资的收益和风险波动周期相对较短，回流相对容易；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长钱”，更多受全球供应链重新布局、中国经济自身转型升级影响，如何找到吸引外资的新增长点



资料图：上海浦东新区。图：视觉中国

文丨财新周刊 王石玉 王力为

无论从统计数据还是从企业与机构的“体感”来看，海外投资来华的热情似乎正在经历阶段性消退。

2023年9月2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延续；虽然二季度逆差收敛，但上半年整体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126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扩大409亿美元。

证券投资项下，2023年二季度证券投资逆差有所收敛，由一季度564亿美元降至59亿美元，但2023年二季度却是直接投资项下连续第四个季度录得逆差，二季度末逆差额达322亿美元，创该项目逆差规模新高。

不仅统计数据显现出海外投资来华趋缓的迹象，投资机构和实体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热情似乎也有所降温。对资本市场来说，投资偏好主要受相对收益和风险变化的影响。一位中国经济学者告诉财新：“我们9月访问华尔街，很多投资人都说，他们没觉得中国的金融开放会‘逆行’，但目前地缘政治风险、经济修复低于预期等因素，是他们趋于保守的原因。”

金融投资收益和风险的波动周期相对较短，可以平常心待之。“美国在降息、软着陆阶段，资金也会慢慢流出。”景顺董事总经理、亚太区固定收益主管黄嘉诚对财新表示，“目前美国高利率环境决定了全球资金的流向，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今年的表现比较突出，但这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现象。”不过黄嘉诚也坦言，从中国流出的资金未来并不必然都向中国回流，“这取决于到时候其他市场的吸引力有多大”。

在实业中，不少外资企业正面临抉择，是否将供应链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搬迁？上海美国商会（AmChamber Shanghai）近期发布的《2023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40%的受访企业表示“正在调整或计划调整来华投资计划”，其中大多数将目光投向东南亚。

直接投资面向实体，周期更长，影响更为深远。中国美国商会（AmChamber China）总裁何迈可（Michael Hart）在接受采访时对财新表示，海外企业在中国新增投资的热情正在降低，“即使决定新增投资，往往也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落地，因此即使中国从现在开始大力吸引直接投资，恐怕外商直接投资（FDI）数据也还要低迷几年”。

面对外资来华有所降温的迹象，中国接连出台多项吸引外资的政策。最重磅的就是2023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下称“24条”）。最新信号则是10月12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研究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的可行性。

金融管理部门也频频对外资机构释放友好信号。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主持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和外资企业座谈会，研究加大金融支持稳外贸稳外资力度、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有关工作。摩根大通、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特斯拉、巴斯夫、托克、施耐德等外资金融机构和外资企业参加了座谈会。

从多家外商商会发布的调研报告看，目前外资企业比较关注相关政策的落地情况、持续性和可预见性。

金融和实体投资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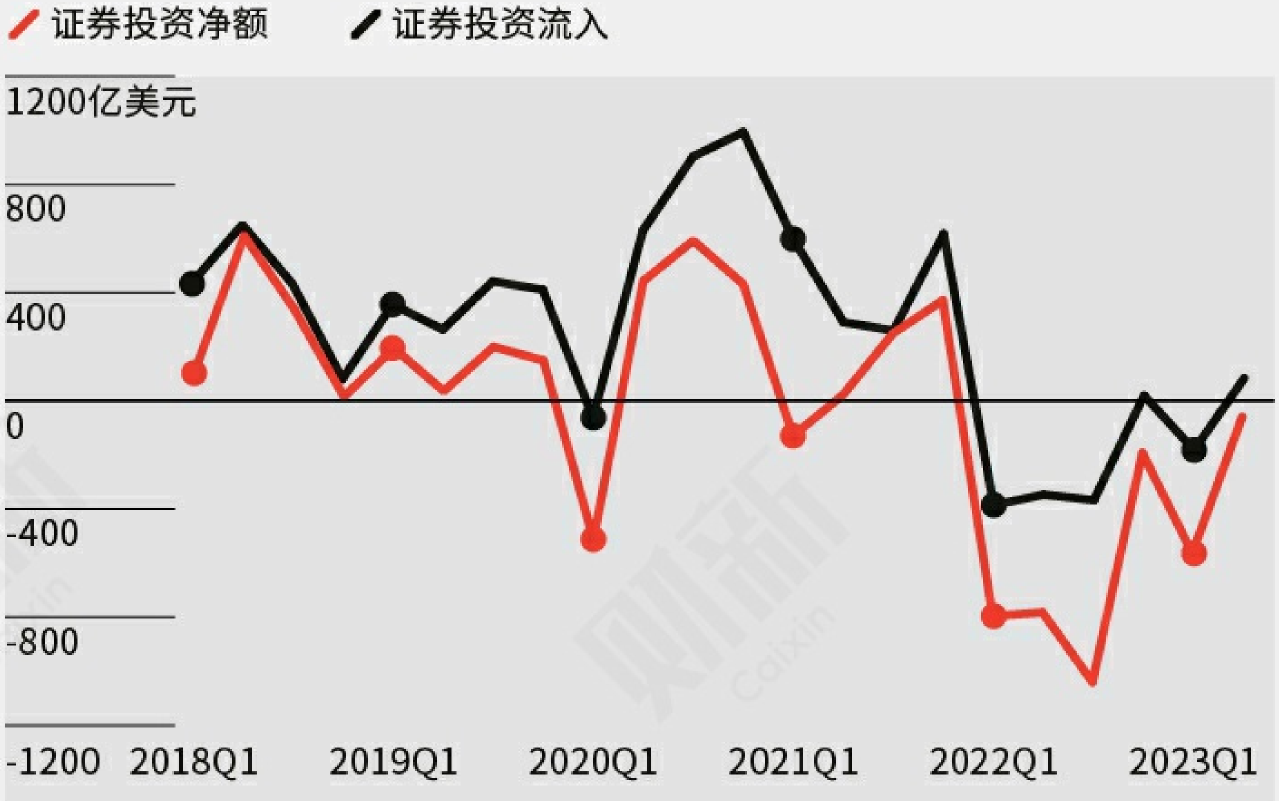
国际收支平衡统计口径的金融账户下，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基本反映了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两个领域中的跨境资金流动情况；最近一年，两者走势明显分化。

以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来看，证券投资项下的流出高峰在2022年，尤其是三季度；近期证券投资外流已有所收敛。

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暴发影响，中国证券投资时隔两年多首次出现逆差，单季幅度达到512亿美元，是彼时的最大逆差额。不过当时证券投资项下仍然呈现一定韧性，除了一季度叠加一定季节性因素出现逆差，2020年其余三个季度仍是较为可观的正流入。2020年证券投资全年流入955亿美元，2021年全年流入规模则收窄至514亿美元。

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证券投资逆差收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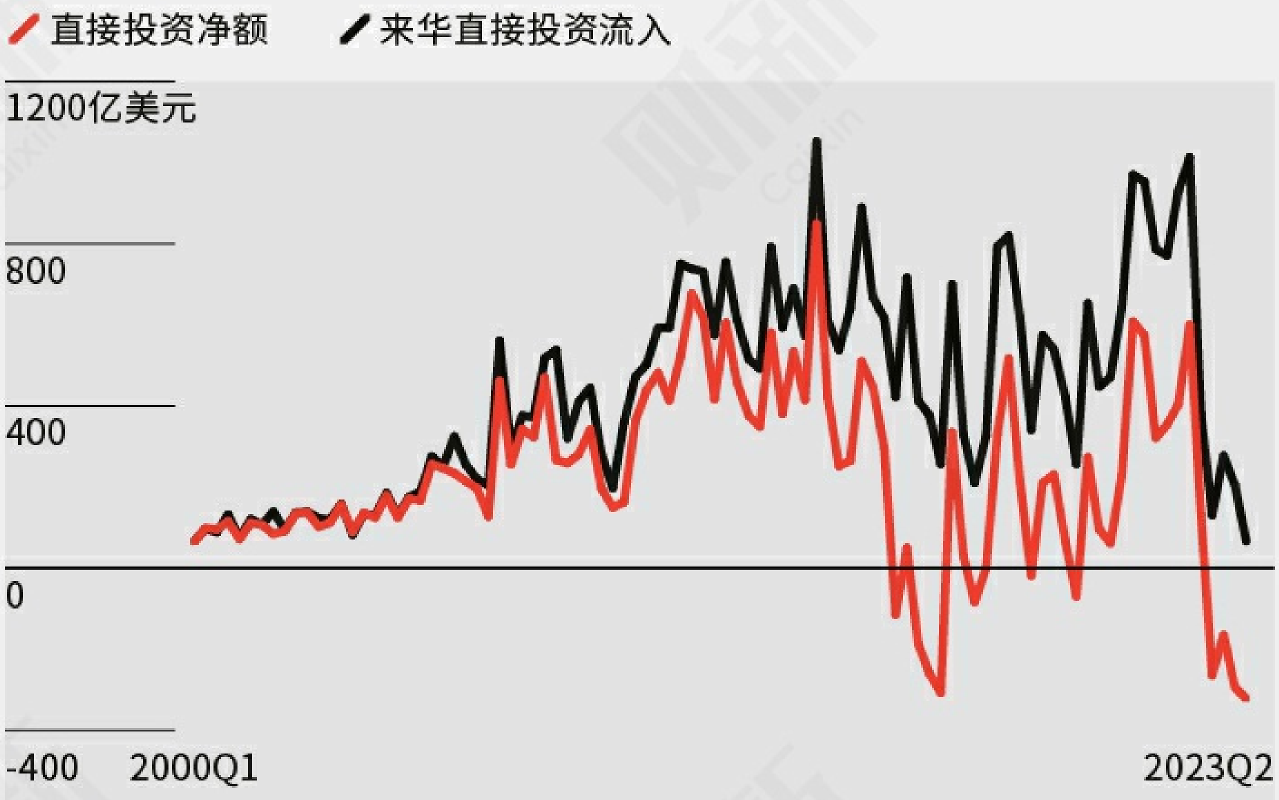
2018年一季度末至2023年二季度末的证券投资净额和证券投资流入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际收支口径下来华直接投资探底

2000年一季度末至2023年二季度末的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和来华直接投资净额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2年以来，证券投资项下连续六个季度出现逆差，三季度逆差幅度增至1040亿美元；此外，2022年1月后，

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也开始下行，由4.06万亿元最低降至3.16万亿元。

不过从近期看，证券投资逆差已有所收敛。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二季度证券投资逆差为59亿美元，特别是该项下记为负债的来华证券投资录得了84亿美元，虽然规模尚未完全恢复，但也已是2022年以来的最高值。

2023年8月，债券通北向通交易量环比增长36%至1.09万亿元，月度日均成交量升至474亿元，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据债券通统计，国债及政策性金融债交易量最大，分别占月交易量的33%和51%。

总体看，2023年8月境外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小幅回升至3.17万亿元。一位外资银行外汇分析师对财新指出，境外投资者减持人民币债券的边际效应在减小，"减持最猛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去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稳定的持有人，之后可能还会慢慢回升"。

相比之下，来华直接投资的净流量仍显疲态。自2022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直接投资项目下已连续四个季度呈现逆差，2023年二季度逆差规模创新高为322亿美元。其中，记为负债的来华直接投资二季度仅有67亿美元，同比下降82%，是2000年二季度以来新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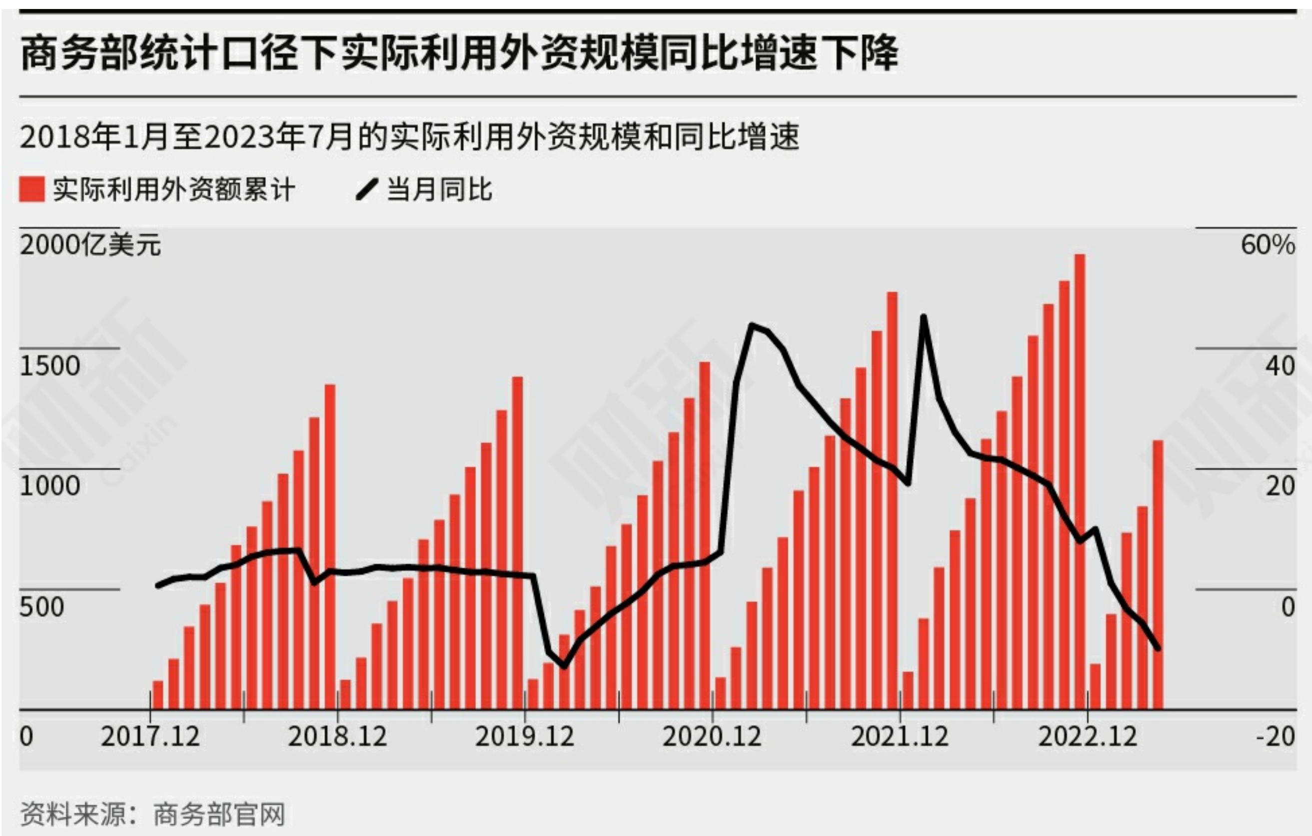
"绝大部分已建厂投资的海外企业应该不会立刻撤走，但是目前看来我比较担心新增投资的流入会非常有限。"何迈可坦言。

上海美国商会的《2023年中国商业报告》指出，2022年以来，将中国作为其总部首选投资目的地的受访企业比例有所下降，较2021年下降10个百分点至2022年的18%；2023年继续下滑至17%。"企业调整投资方向的主要原因，包括为投资多元化准备备选方案、其他目标市场的增长机会以及中国市场变化。"

金融投资何时回流

金融市场中的资本流动周期更短，波动性也更强。在不少投资机构看来，在美国强劲加息的大背景下，短期内减持中国资产主要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相对收益。

"对于国外投资者，是否投资中国资产，其中一个因素是其他资产的收益如何。"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洲资产配置主管胡俊礼指出，在美元加息的背景下，美元债券的收益很可观。"如果美元投资者买中国国债然后以期汇交易对冲外汇，大概有3到4个百分点的收益，但直接持有美国债券就能有约5个百分点的收益，也不需顾虑太多汇率波动风险。"



吸引子科技董事长石磊也指出，和偏向长期的产业资本相比，金融资本的波动相对更大。"一种是短期的投机力量，可能每个月都会变化，我们的市场对此已经比较适应了；另一种是长期配置型的金融资本，这一轮外资流出中也见到了这类资金的撤出。"

瑞银最近发布的研报显示，在近890余只样本基金中，中国资产占投资组合的比重从2021年1月的6.5%降到2023年8月的3.1%，其中360只基金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头寸。

石磊解释，配置型资金回撤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对中国增长中枢产生了新的预期，并在观望中国经济

转型期间的资本回报率变化；另一方面，这些配置资金在中国的敞口暴露很小，“可能只占机构自身仓位的3%到5%，主要是股票，但它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规模可能显得较大，回撤对市场有一定影响”。

近期，一些长期看好中国的投资人改变预期，转向其他新兴市场。“金砖国家”这一名词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Jim O'Neil）指出，中国疫情政策调整后的经济增速低于许多市场分析人士的预期，“短期加速并未出现，使得不少人重新修改预测。中国需要解决经济增长、消费疲软、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

“这次中国经济似乎失去了强劲反弹的魔法。”一位华尔街大型投资机构新兴市场首席分析师直言。他曾坚定看好中国市场，但近期无奈地指出，虽然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空间确实都还很大，“但我们不确定中国是否还将经济发展置于首位”。

瑞银集团新上任的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思杰（Sergio P. Ermotti）指出，中国的经济形势与过去20年的情形已然不同，防疫政策调整后的复苏形势较为复杂，其他一些国家展现出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持续发酵，“很难说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因素能解释投资者为何此时减少了向中国的投资”。

安思杰对财新直言，尽管中国与全球经济政治形势正在变化，“但我没有听说哪家机构打算完全退出中国，问题更多在于想以多快的速度进入中国，而不是作出完全退出这样的最终决策”。

短期看，投资机构正在关注美元加息影响消退、中国经济继续好转所带来的回流“窗口期”。“一方面是美元加息周期能否结束，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有所缓解；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的本土经济一定要稳下来，从盈利表现方面对风险资产定价起到积极作用。如果这两方面都能实现，资金在中短期的未来还是会流回中国的。”胡俊礼表示。

德意志银行国际私人银行部亚洲投资策略主管刘佳指出，经济复苏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更重要的还是信心的恢复”。他表示，在最近两至三个月内，市场的谨慎态度可能还会维持，但随着8月和9月的金融经济数据已体现出逐步稳定的迹象，信心正在慢慢好转。“我们看到三季度中国经济正在企稳，预计四季度会有小幅的复苏。投资、房地产、进出口等领域的回暖可能较慢，但只要能看到稳定向上的趋势，外资回流是比较容易的。”刘佳说。

不少市场人士仍然认可人民币资产的配置价值。刘佳认为，中国权益市场整体处于估值较低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很有吸引力，“但信心的恢复还需要更多宏观数据的支撑”。他介绍，虽然目前德意志银行给予中国股市中性评级，预计未来12个月内中国股市有望实现7%至8%左右的预期回报。

胡俊礼也指出，并不认为当前对中国资产的偏低配置会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低配。“虽然中美关系等宏观因素不会完全好转，但其实这些因素已经被计入了当前的资产价格中，中国股票的估值现在已经低于五年平均值的一个标准差以上。未来一旦经济修复、企业盈利向上、美元下跌等基本面利好出现，全球的各大投资组合还是会考虑回补中国的仓位。”

不过，中国资本市场相较其他新兴市场的相对优势或许正在变化，印度、印尼等亚太新兴市场正以强劲势头追赶。黄嘉诚坦言，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落幕，资金必然重新从美国流向其他市场，“但会不会悉数进入中国还是个问号”。他指出，如果中国GDP增速较为平稳，有望吸引资金回流，但同时也要关注其他市场的货币政策周期和经济周期。

“这是一场全球资本竞赛。哪里的资金需求更大，哪里的吸引力就更大，得到的钱就更多。”黄嘉诚说。

“平准基金”回填外资缺口？

自2023年5月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表现相对低迷，五个月内上证指数震荡下挫5%，其间一度险守3000点。其中，8月上证指数跌幅最大，单月跌幅5.2%，而该月内北向资金净卖出规模也创下近三年新高，累计净卖出896.83亿元。

根据中金公司研报统计显示，当前外资持有A股市值规模约3.5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比重为3.8%，占自由流通市值的比重为9.0%。

“如果外资撤出速度比较均匀，影响也不大，但如果出现集中撤出，就会造成一定流动性风险，资产定价也会出现偏差。比如8月至9月的股市大跌，就出现了由于股市中流动性收紧导致的无差异下跌，已经脱离了一些企业的基本面。”石磊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平准基金适当补上外资集中撤出的缺口，对稳定市场有一定必要性。

10月11日晚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先后公告称，获控股股东中央汇金增持银行A股股份，并且中央汇金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以自身名义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

此次，工农中建四大行分别获得中央汇金增持1800余万股至3700余万股不等，以10月11日四家银行各自的收盘价计算，中央汇金共计投放4.77亿元。

此举被视为一种稳定市场的信号。中央汇金一直以来承担国有金融资产所有者、管理者的角色，也曾在2008年和2015年“股灾”时出手救市，部分发挥了平准基金的作用。此外，成立于2011年的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在2015年“股灾”期间也承担平准基金的作用，向央行再贷款及向17家银行同业拆借超万亿元，注入股市。不过，中国

尚无真正法定意义上的平准基金。

平准基金一般由政府以法定形式通过特定机构设立，在股市出现剧烈震荡时，对市场中非理性的波动予以逆向操作，以避免暴涨暴跌的行情。从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经验看，平准基金通常在"股灾"出现后由财政部或央行出资，根据市场发展情况进行市场化操作，并最终实现退出，历时四至九年不等。

中国是否也要以平准基金的形式为"国家队"进场稳定股市制定一套相关规范？这是现在讨论的方向之一。如果要设立平准基金，需要明确出资方、管理人，同时也需要确定投资制度及监管规则。据财新了解，若要设立平准基金，在流程上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基金规模或至少1万亿元，首批或为5000亿元。

"主要参照外资流出A股市场的规模计算，今年1月至8月外资净流出5000多亿元。"一位知情人士说。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所此前发布的《境外救市基金的经验与启示》指出，救市基金旨在解决非经济因素的市场冲击，"如果造成股市大幅震荡的原因属于经济因素，基金就只能起到短期抬升股指的作用，无法扭转市场整体下跌趋势"。该文章还指出，救市基金既不能追求短期出清退场，也不能一直留在市场中。"待市场稳定回归正常轨道后，就需要考虑并设计合理的退出机制，让市场自身运作调节。"

变迁中的外商直接投资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2023年一季度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位列全球第三，次于美国，与巴西持平。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主要来自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积极招商引资政策。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变迁下的供应链重新布局、逆全球化兴起、中国经济自身转型升级等一系列变化，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将迎来新阶段？

外商直接投资是典型的"长钱"，投资与回报的周期更长，但近期已经出现边际变化的迹象。商务部口径下统计的2023年1月至7月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额合计1118亿美元，同比下降9.8%；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平衡表统计口径下的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二季度合计仅67亿美元，同比下降幅度达到82%。

商务部统计口径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的不同在在于，后者直接按照净额编制，统计项目中还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吸收的资本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已分配未汇出利润、股东贷款等内容，因此可能受到外企利润水平、收入再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但两种口径均体现出直接投资净流入的降温迹象。

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商业报告》指出，对于未来五年在华业务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受访企业比例降至52%，为该调查历史最低水平。中美关系是七成受访企业预计降低投资的主要原因，担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营商政策的企业也约占到半数，可见非经济因素在外商投资决策中的分量不低。

近期中国已在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国务院发布"24条"后，又宣布外籍人士的税收优惠政策延期至2027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士可以选择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或享受住房补贴、子女教育费等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

上海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等多家外商商会都对"24条"表示欢迎，也指出文件中提及了不少此前商会声援支持的政策方向。"比如说，个人所得税相关的优惠政策得以延期就打消了很多人的担心，因为如果税率优惠取消，那在中国找工作的成本就会变得更没有吸引力。"何迈可表示。

不过，不少外资企业仍在观望"24条"的实际落地情况。"'24条'对税率、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有所涉及，但有不少环节较模糊。"何迈可说，希望这样的税率政策能常态化，"这不是给外国人'开后门'，而是中国以这样的激励政策与其他市场竞争投资"。

中国欧洲商会主席詹斯·埃斯克伦德（Jens Eskelund）在一次媒体会上指出，政府各个部门间的"KPI"存在差异，并非每个部门都将吸引外国投资当作关键绩效，"各部门之间的目标存在差异，而企业被夹在中间，这是比较难受的"。他解释道，"国家安全和技术国产化（self-reliance）是影响欧洲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

除了宏观经济和政策因素，外商减少对华投资可能还是"无奈之举"。何迈可对财新解释，多数跨国集团对新市场加大投资由许多环节组成，包括决策、实地调研、谈判、开设门店等，周期会长达两至四年。"问题是之前的三年中，外商的决策团队很难到中国来。"

"不过，疫情并没有影响所有公司。有些公司前期投入已经做好或者已经有了长期规划，这样的外商企业的投资计划可能不会变化。但也有些公司只好表示'如果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没办法到实地拜访，投资计划只好暂时搁置'。"何迈可指出，"这种停滞不仅导致中国2023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放缓，也意味着即便中国采取行动，可能也很难快速见到明显反弹。"

从更长期的视角看，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新产业升级加速、欧美企业"回撤"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产业转移的"再布局"，这也导致外商投资流向中国以外的其他目的地。

光大证券宏观经济报告指出，轻工品等低技术链条产业向东南亚转移更多受到人力成本与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的推动，其中也包括中国企业主动外移产能的影响；同时部分产业链回流欧美本土或向邻近国家转移，也可能对中国

出口产生持久性影响。

“这是上一个时代的结束。”石磊说，“以数十年为周期来看，过去那个中国承接成熟产业的时代结束了，现在这些投资要到东南亚、印度，因为那里有更好的产业转移潜力，这是很正常的，不需要‘强留’。未来中国和欧美市场可能是竞争合作的关系。”

未来，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新经济动能，或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在增长点。国家统计局《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4%，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8.9%；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90.5%、46.8%、21.0%。

商务部数据也显示，高新技术产业是引资主力。2023年上半年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7037亿元中，高技术产业占比升至近四成，引资规模增长7.9%。

“我们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比较充足的，现在应着重于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防范系统性风险，这不仅包括金融系统和经济系统，也包括社会救助等方面。”石磊指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进出口自然会出现调整，国内市场也将趋于统一，部分低效率企业逐步出清。

有外商企业盼望中国的产业政策能进一步向外企放开。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3—2024》指出，部分行业被限制为“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cy）”，导致部分欧洲公司被迫将在华业务本地化，与其他地区的业务分离，“这是一种昂贵且效率极低的解决方案，也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长城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蒋飞认为，当前全球通胀环境留给中国一个“机遇期”，中国需要提高投资效率，在有限的货币政策使用空间内，通过深化改革和提高效率的方式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与石磊的观点不谋而合。“以往我们可能很少重视资金的投资回报率，这背后是一部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未来的企业应该更加注重资金利用的效率。”□

刘冉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李东昊

专栏｜并非寻常的降准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此次降准几被淡忘，但原本非同寻常；备受期待的“金九银十”期间中国经济究竟表现如何，即便身处国庆长假，仍牵动所有人的神经



资料图：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图：视觉中国

文丨高占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特聘高级研究员

2023年9月14日，星期四，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降准0.25个百分点，释放银行体系长期资金约5000亿元。按央行在公告中的表达，其意在“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此次降准是2020年以来的第七次、2023年以来的第二次。这原本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举措，却因近期其他事件的发酵被抢去了风头，以至于似乎要淡出人们的视线。这不公平，故而有再说一说的必要。

此次降准究竟有何不同寻常之处？

很多时候，对于某一货币政策的落地，各方是有共识和预期的。然而这次不同：此前虽曾有不少对于9月央行是否会降准的讨论，但认为不会降者居多。所以，这次降准令很多人深感意外。自8月以来各有关部门放松房地产、活跃资本市场和化解地方债的政策频出，而央行在指导下调存量房贷利率的同时也曾多次降息，加之在此次降准前的9月11日发布的信贷和社融数据好于预期，故而市场未寄望会有这次降准也是可以理解的。出乎意料的必然是不同寻常的，此其一。

此外，也有人费解于为何这次降准选择在周四宣布而不是通常的周五下午收市之后。考虑到宣布降准的次日国家统计局要发布经济数据，所以有意错期调峰也未可知。然而，9月15日发布的8月数据大超预期，其带来的意外甚至还高于降准：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从7月的2.5%反弹至4.6%，强于预期的3%；工业生产同比增速从7月的3.5%回升至4.5%，强于预期的3.8%；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加快；进出口同比跌幅收窄；CPI同比转正至0.1%；PPI同比跌幅从7月的4.4%收窄至3%。数据好还降准，称之为非同寻常当不算过，也更易理解央行在降准公告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这句话的深意。

笔者观察，此次降准在时机的选择上，除上述几个“不同寻常”之处，还有如下特殊的针对性：

第一，加强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创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同时也盘活作为债市最大投资者——商业银行的长期资金。9月地方专项债券集中发行，身负化解地方隐债使命的1.5万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也已箭在弦上。更何况，9月22日还有一笔规模1150亿元的国债发行——这创下了中国国债史上单只普通国债的最大规模发行纪录。

第二，为商业银行调降存量房贷利率减轻压力、提升动力。下调存量房贷利率，有助于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消费信心。对商业银行来说，虽此举可减少提前还贷压力，但其动力仍恐不足：整个银行业余额超过38万

亿元的个人住房贷款，仅0.5个百分点的利息减免，对应的便是高达1900亿元的利息损失，而2022年全年商业银行的净利润也不过2.3万亿元。在商业银行净息差不断收窄的情况下，来自央行的支持可谓雪中送炭。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9月7日，四大行宣布了关于存量首套个人房贷利率调整的相关细则，将自9月25日起不用客户申请便自动调降。

第三，确保季末流动性合理充裕。三季度末历来是一个特殊时间节点：后有国庆长假，今年还与中秋首尾相连；9月18日至19日要进行集中的税期缴款；自8月下旬开始，债市出现一波调整，资金利率明显抬升，理财产品再现赎回压力。在此背景下，9月14日的降准，加之9月15日重启14天逆回购，均是解决季末流动性压力的关键举措。此外，在资金外流、汇率承压、股市波动、恒大违约等事件发酵的特殊时期，避免在季末流动性管理上出现任何闪失，更显得无比重要。

并不平静的9月已然过去。随后，人们沉浸在难得的中秋、国庆假期中，欢乐之余，有心人仍时时关注“金九银十”期间的中国经济。从国家统计局和财新于9月30日和10月1日先后发布的9月采购经理指数（PMI）的表现看，喜忧参半。而长假后各项指标如何，更是牵动所有人的神经，且拭目以待。

版面编辑：李东昊

最新财新周刊｜中国电动车欧盟调查风暴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针对产自中国的纯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由欧盟委员会自行发起，背后是政治游戏还是贸易保护？中外车企应如何应对？

文丨财新周刊 余聪 杜知航

9月初，50余家来自中国的汽车企业和供应链企业在德国慕尼黑车展中积极亮相，博得欧洲市场关注。当地媒体、社交平台乃至产业界，都出现了诸如"中国电动车表现超预期""有科技感、极强竞争力"等赞扬之声，但与之相伴的也有浓重的危机感——欧洲汽车行业可能面临挑战甚至危机。

车展刚落幕，当地时间2023年9月1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首次透露，欧盟委员会正在启动一项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10月4日，欧盟宣布对产自中国的纯电动汽车正式开始反补贴调查，调查期预计不超过13个月。

欧盟认为，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从政府补贴中获益，使得产品价格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电动车大举出口欧洲，市场份额不断提升，损害了欧盟汽车工业企业的利益。

2010年以来，欧盟已多次对中国商品进行反补贴调查，光伏组件、电动自行车、玻璃等商品最终均被施加反补贴税；而这次针对电动汽车的调查风暴或将更加复杂。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合规业务部顾问戴梦皓对财新指出，相比光伏或轮胎案，欧盟更关注电动车上游补贴情况，调查会囊括很多项目，甚至关注到了锂钴镍等上游原材料生产。不少业内人士向财新表达担心，认为本次调查结果最终大概率会征收反补贴关税，这将削弱中国电动汽车在当地的竞争优势。

10月4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称，欧方仅凭主观臆断就发起调查，缺乏充足证据支持，不符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欧方要求中方在极短时间内进行磋商，且未提供有效的磋商材料，严重损害了中方权利。

财新获得的欧盟委员会《对产自中国的纯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的证据备忘录》（下称《备忘录》）显示，在10月4日正式发起调查之前，9月22日，欧盟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启动前咨询，欧盟于10月2日收到中国政府的反馈意见。中方提出，欧盟材料中的证据要么过时要么不具体，也不能说明补贴与对欧洲汽车工业"损害威胁"的因果关系。但欧盟最终未采纳中方意见，仍继续发起调查。

同在10月4日，欧盟中国商会表示，欧委会调查没有基于欧盟产业界实质性申诉，未充分考虑调查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及双边经贸关系带来的损害。此外，欧委会夸大了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对欧盟市场的"损害威胁"。

调查因何而起？

贸易逆差是欧盟此次发起电动车调查的动因之一。

9月25日，中国和欧盟在北京举行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列举数据称，过去两三年，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份额从1%提升到8%，按照这种增长势头，欧洲汽车工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欧委会认为，中国对欧盟的新能源汽车出口速度加快，2025年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份额可能由目前的8%升至15%。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成为欧盟汽车进口第一大来源国，进口量同比增长近两成达到52.2万辆，占总进口量的16.1%。同期，位居中国之后的主要进口国依次为土耳其、英国、韩国、日本，其中土耳其、日本均同比微跌。

而在中国本土市场，由于中国车企电动化转型步伐领先，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逐渐提升，不断挤压外资品牌市场份额。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下称"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达到54.6%，为历史新高点。

欧洲汽车制造商一直是中国汽车进口的重要来源，如今发展压力巨大。安联研究在2023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过去十年，欧洲进口汽车在中国市场份额已从2013年的约2.9%跌至2022年的1.8%，对应2022年进口量已跌至50万辆以下。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对财新称："如果看看中欧贸易逆差，就不会惊讶有反补贴这样的事出现了。"欧盟商会在最新发布的企业情况意见书中提到，2022年中国对欧盟贸易总额是欧盟对中国出口的近3倍。

而欧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发起调查的另一重背景攸关政治。

德国咨询公司Sinolytics顾问韩博文向财新分析称，一般而言，反补贴/反倾销调查是由产业公司发起的，但此次

欧盟调查并未基于任何欧洲公司的投诉，而是欧委会自发发起，因此，此次调查并非出于纯商业目的，而是部分由政治目的驱动。

冯德莱恩被形容为"欧洲最有权力的女人"，自其2019年就任欧委会主席以来，欧盟委员会已对谷歌、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发起反垄断和数据安全的调查，单次最高罚款多达12亿欧元。2024年，冯德莱恩的第一届任期将结束，不排除她为竞选连任而创造"政绩"。

根据欧盟反补贴规则，欧盟将深度调查对欧销量最高的几家在华汽车公司。一名熟悉反垄断的律师称，可能最后被抽中调查的除了上汽集团（600104.SH），剩下全部是外资或合资企业，调查最终也会伤及"自己人"。一名接近宝马中国的人士就向财新称："宝马在中国有这么多投资，也有出口欧洲的业务，他们不想被政治游戏裹挟。"

目前，从中国向欧盟出口新能源汽车的企业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上汽集团（600104.SH）、吉利汽车（00175.HK）等国内车企；另一类就是特斯拉（NASDAQ：TSLA）、华晨宝马、雷诺等在华生产的外资或合资品牌。尽管蔚来汽车（NYSE：NIO/09866.HK）、小鹏汽车（NYSE：XPEV/09868.HK）、比亚迪（002594.SZ）、长城汽车（601633.SH/02333.HK）、东风岚图、一汽红旗、奇瑞汽车等多家中国车企均已布局欧洲市场，但它们出口体量均较小，仅上汽集团规模较大：上汽集团曾披露，2022年其在欧洲（含英国）的出口量超过10万辆。

也有行业人士分析，最终欧盟可能会对中国车企和在华外资车企区别对待，施以不同税率。此外，亦有中国车企担心，一旦自己被抽中调查，会否节外生枝地牵出其他问题。一名比亚迪欧洲业务人士称，许多中国车企合规工作做得肯定不如欧洲人细致。

2021年以来，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1年中国汽车出口量同比翻倍至201.5万辆；2022年达到311.1万辆；2023年前三季度，出口汽车就达338.8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82.5万辆，超过2022年全年。

欧洲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关键增量市场。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整理的海关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纯电动汽车33.8万台；2023年前八个月出口33.9万台，已超过去年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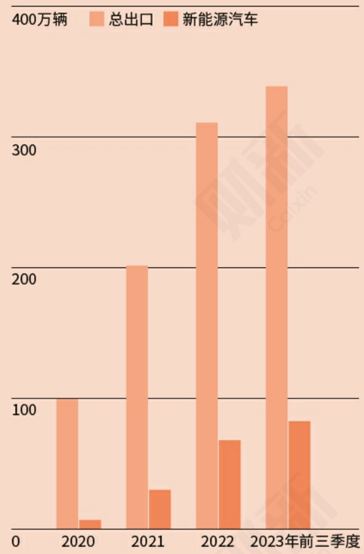


2010年以来
欧盟多次对华采取反补贴反制措施

产品名称	调查启动时间	终裁时间	反补贴税率/措施
钢铁	预计2023年10月	未定	未定
纯电新能源汽车	2023/10/4	预计2024年底	未定
石墨电极系统	2021/11/18	2022/7/20	未采取临时性反补贴措施
光缆	2020/12/21	2022/1/19	5.1%—10.3%
铝转换箔产品	2020/12/4	2021/12/22	8.6%—18.2%
热轧不锈钢板卷	2019/10/10	2020/11/9	未采取临时性反补贴措施
玻璃纤维织物	2019/5/16	2020/6/15	17.0%—30.7%
电动自行车	2017/12/21	2019/1/18	3.9%—17.2%
卡客车轮胎	2017/10/14	2018/11/12	3.8—57.3欧元/单位
铁、非合金或其他合金钢热轧卷板	2016/5/13	2017/6/9	4.6%—35.9%
冷轧不锈钢板	2014年8月	2015/7/24	未采取临时性反补贴措施
玻璃纤维长丝	2013/12/12	2014/12/23	4.9%—10.3%
聚酯短纤维	2013年12月	2014/12/17	未采取临时性反补贴措施
自行车	2012/4/1	2013/5/23	未采取临时性反补贴措施
有机涂层钢	2012/2/22	2013/3/15	13.7%—44.7%
晶体硅光伏组件及关键零部件	2011/7/1	2012/6/30	0—11.5%
数据卡	2010年6月	2011/3/3	未采取临时性反补贴措施
铜版纸	2010/4/17	2011/5/14	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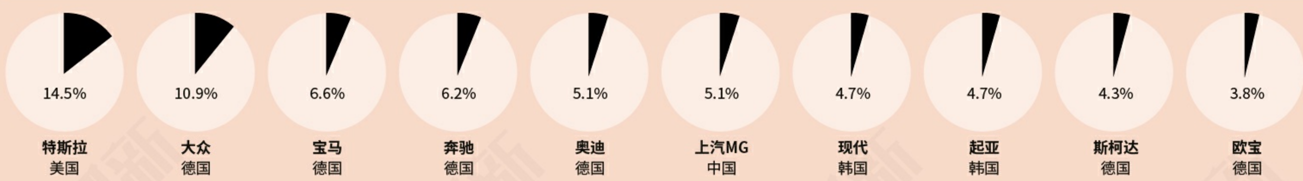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和国盛证券研究所

2023年
新能源汽车出口预计超过100万辆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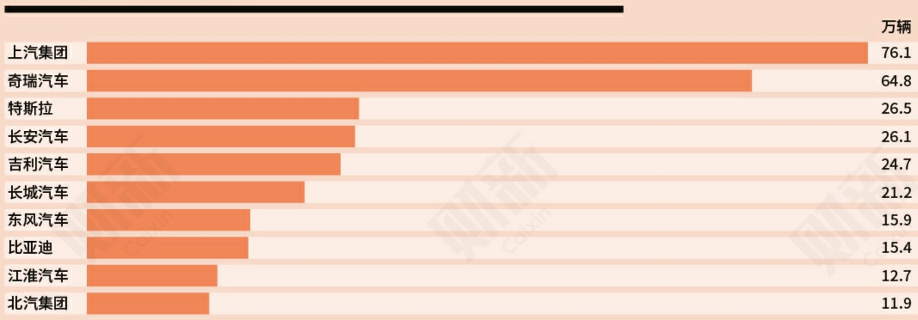
2023年三季度
上汽MG在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与奥迪相当



注：数据为2023年三季度欧洲主要国家新能源汽车销量前十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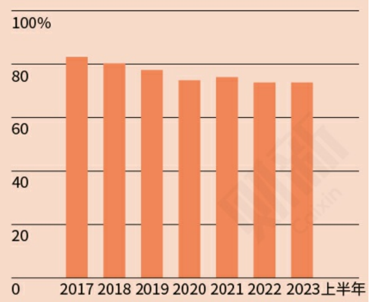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EU-Evs数据平台

2023年前三季度
上汽集团出口量显著领先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产能过剩现象浮现
中国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欧洲次之。市场调研机构Canalys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电动汽车销量在全球市场占比为55%；欧洲所占份额为24%。

进入2023年，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成为中国汽车市场的痛点，导致供给侧竞争剧烈、价格战频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2.7%。不少中国车企希望"出海"开拓新市场，尤把利润率较高、市场成熟度高的欧洲视为目标。欧洲本地汽车产能不足、制造成本走高，而市场对新能源汽车需求旺盛，正处于电动化转型加速期。ACEA数据显示，2023年8月，欧盟纯电动汽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20%，去年同期仅为11.6%——而今年同期，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超过30%，其中纯电动汽车渗透率约为23%。

在地缘政治经济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中国车企"出海"面临着政策不确定风险加大等严峻挑战。在此预期之下，车企"出海"模式已开始从整车出口（CBU）向投资、本地化生产升级，在东南亚和拉美市场近两年都开始密集布局产能。一名传统车企资深海外业务人士称，一直做贸易肯定不行了，但前些年奇瑞汽车在巴西建厂后遭致的损失业内有目共睹。"海外投资投向哪里、怎么投，还需要全方位慎重考量。"

奇瑞是首家在巴西投资建厂的中国乘用车企业，2014年当地工厂建成投产。但后续市场开拓不及预期、销量低迷，巴西业务陷入高额亏损，一度对国内业务也造成拖累。2016年，奇瑞巴西业务主体——奇瑞巴西进口、制造和销售汽车有限公司，负债总额达13亿元。

EFS汽车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祁雪凡向财新称，中国车企需要更多智慧去适应海外市场游戏规则。

何谓“反补贴”

欧盟委员会所指“补贴”，主要是指生产、制造端补贴，而非市场消费端补贴，即并非公众熟悉的中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

上述《备忘录》显示，调查指控的补贴主要包含三类：第一类是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直接财政支持，如国有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优惠融资和定向信贷；第二类是政府指导下，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可以低价获得土地、电力，以及新能源汽车原材料、零部件等；第三类是各种形式的税收优惠，例如新能源汽车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率由普通税率的25%降至15%。

《备忘录》列举了大量具体案例。其中以比亚迪为例，金融支持方面，比亚迪年报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借款总额（包括所有银行贷款和债券）约为人民币185.17亿元，年报称“本集团接受政府以零利率或低于市场利率发放贷款”。在电费优惠方面，许多纯电动汽车生产商都得到了相关部门支持以减少电费支出，例如比亚迪在2018年从深圳市降低工商业用电成本基金中获得1.15亿元以上资金。在上游矿产方面，2022年9月，宜春比亚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该公司为比亚迪与宜春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资公司，而后者是宜春市国资旗下公司，这让比亚迪得以控制生产成本。在税收优惠方面，比亚迪2021年报显示，公司被认定为高新科技企业，享受15%的所得税税率。

《备忘录》又以中国国有企业上汽集团为例，在政府技术创新及研发补助方面，上汽集团2022年年报称，报告期内获得了共计36亿元政府补贴，其中包含直接财政补贴20.55亿元、搬迁补助费3.54亿元、长期资产购置补助费7.58亿元、技术改造补助费1750万元、项目开发补助费3.9亿元；在政府引导资金支持方面，上汽集团子品牌智己获得大量支持。除此以外，上汽集团还享受土地、电力、原材料、税收等方面的支持。

欧委会认为，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相关产品的生产和供应链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充分构成可诉性补贴（countervailable subsidy）。

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指出，中国车企新能源产品在海外的价格高于中国国内，因此欧盟无法提出反倾销调查，只能进行反补贴调查——这是一种贸易保护，旨在阻止或延缓中国汽车出口对当地车企的冲击，为当地车企跟上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提供帮助。

欧盟预计调查最长不超过13个月，将分“三步走”：首先确定产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是否得到了补贴；其次，这些受到补贴的产品是否对欧盟的新能源汽车行业造成了损害；第三，决定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并评估这些措施是否符合欧盟利益。

现在欧盟已启动了第一步——10月4日正式发起调查，七日内在华生产并出口欧盟的新能源汽车企业须向欧盟提交问卷。按欧盟规定，凡在2022年10月到2023年9月在华生产并向欧盟出口过纯电动车的企业都要提交问卷，不包含混合动力汽车和摩托车。

据财新了解，长城汽车已于欧洲时间10月11日提交了问卷；但大部分车企都申请了延期交表，例如特斯拉申请了延期两天交表，并获批准。特斯拉向欧盟写信称，问卷填写时间正值公司财报季，公司人手不足，此外特斯拉是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性公司，要检查旗下所有实体是否牵扯到调查，这也需要时间。

一家中国传统车企欧洲业务人士告诉财新，10月10日，其所在团队也提交了延期申请，一个小时就获得了欧盟同意延期的答复，“其实欧盟有这个预期”。他还提到，大家还在商讨怎么填，以将风险降到最低。

长城汽车提交的问卷显示，欧盟的问题包括产量、产能，出口到欧盟的、在华的、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数量和金额。此外，欧盟还调查了产业链相关情况，包括公司产业链上的锂、钴、镍、电池电芯等供应商名称。不过，长城汽车并未回答这部分问题。

上述只是第一步中的一小步，七天问卷调查之后，欧盟还将抽样选取强制应诉企业进行全面核查。一般而言，欧盟会从提交问卷的车企中，选择出口量最大的前2-5家企业进行强制应诉。业界预计，按出口数量排序，上汽集团、特斯拉、雷诺、吉利汽车和宝马，将很可能是最终深度调查的对象。

是否提交抽样问卷关乎处理结果。如果企业拒绝提交抽样问卷，将被列为“不合作对象”，将适用最高反补贴税率。戴梦皓提到，不论中国品牌还是在华外企，大家目前都在积极应诉，为下一步深度调查做准备。

前述传统车企欧洲业务人士推测，按照欧盟的逻辑，国企、央企肯定在补贴中受益更多，“上汽集团可能是本次调查的重点”。但一些涉及国企、央企的信息，未必能满足欧盟的披露要求。

接下来的深度调查将持续数月。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柏勇向财新指出，针对出口商的调查将主要以问卷方式进行；此外，在合作的出口商不反对的情况下，疫情前欧委会官员通常会前往抽样企业进行实地核查。考虑到如今疫情结束，不排除欧盟官员进驻企业实地核查的可能性。

“迟早要来”

对于欧盟来势汹汹的反补贴调查，中国车企并不意外。

2022年中，正是中国车企高调进军欧洲市场之时，一名上汽集团欧洲业务前高管就向财新称，中国车企需要时刻警惕“树大招风”。

在欧盟发起反补贴调查前，今年5月，法国推出电动汽车补贴新政策，只向欧洲制造的电动汽车提供补贴，意味着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将被排除在外。今年3月，土耳其对中国电动汽车开始加征40%的特别关税。

一名在华生产的欧洲车企高管向财新提到，早在2022年11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上海召开论坛时，包括上汽集团等一些国内主机厂的高层便在会上提到了欧盟可能的调查，他们还向在场中国商务部官员提出请求，希望政府出面化解这一潜在风险。

不过，冯德莱恩的出手之快还是让行业措手不及。上述欧洲车企高管表示，此前一直了解到欧盟没有确定一定要展开调查，甚至在冯德莱恩宣布的前一天，公司负责政府关系的同事还和欧盟负责汽车的部门沟通过，双方还提到要恢复每年的线下汽车行业沟通会，并未得到将启动反补贴调查的消息。这位高管认为，欧盟内部有一部分人一直在低调收集信息，最终掌握了他们认为足够的材料即发起调查。

9月13日冯德莱恩首次披露调查动议时，前述比亚迪欧洲业务人士就感叹“这是迟早的事情”。

冯德莱恩宣告启动调查后，在9月21日全球化智库主持的活动上，财新询问欧盟驻华大使庹尧诲（H.E. Jorge Toledo Albi?ana），他是否事前知晓这一反补贴调查。庹尧诲表示，他也是在冯德莱恩的演讲中得知此事，但发起调查并非冯德莱恩的个人野心，而是经过欧盟讨论达成的。不过，最后要不要发起调查，决定权还是在冯德莱恩手中。

但前述欧洲车企高管指出，冯德莱恩宣布反补贴的场合，是在对欧洲议会的年度演讲上，这可能包含展示政绩的意图。

欧委会负责调查，但最终怎么采取反制措施，仍由欧盟议会中各个国家投票决定，因此，各国立场将影响欧盟对华采取的行动。欧盟国家中，德国和法国两大汽车生产大国最受关注。多名熟悉欧洲汽车行业的分析人士向财新指出，法国带头推进本次调查，而德国显得更中立。韩博文指出，法国几乎已经没有了对华汽车出口，而在欧洲2022年所有汽车对华出口中，德国企业占比95%。

不过，法国雷诺品牌在华生产的Dacia Spring车型，也在本次反补贴调查范围内。这款车在中国生产但不在中国销售。今年前八个月，Dacia Spring在法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排行中位居第二，仅次于特斯拉Model Y。Dacia Spring的生产方易捷特是东风、日产、雷诺在中国成立的合资公司，三者分别持股50%、25%、25%，这样的合作类似于手机代工模式。

针对反补贴调查，雷诺中国称，“雷诺在全球均设有生产基地，同时对中国的长期承诺不变，Dacia Spring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雷诺中国也在不断探索全新的、多边共赢的新产业分工合作模式，并坚定执行‘in China， for global’战略”。

德国内部利益更纷繁复杂。韩博文分析，总体而言，德国政府对推进调查和关税持谨慎、怀疑态度，但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例如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总理舒尔茨曾表示反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关税，但他也认为，即使加关税，也不会导致类似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德国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是绿党成员，他们支持对华调查。交通部长和财政部长是自由民主党成员，他们则持反对意见。此外，虽然经济部长支持关税，经济部内部许多官员并不支持此观点，所以经济部的态度目前并未明朗。

即便德国全国反对，也难否决欧委会的调查结果。韩博文指出，在欧盟议会否决提案，需要至少55%的国家与占欧盟总人数65%的人口基数，而且在欧盟议事程序中，否决相对少见，通常都会在进入投票程序前由成员国达成某种妥协。

最后具体到不同企业的惩罚性关税可能存在差异。前述欧洲车企高管认为，欧盟可能区别对待不同国家的品牌，比如对中国品牌加征两位数的高关税，而对特斯拉和宝马的关税只是象征性的个位数。

欧盟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是反补贴调查的重要背景。祁雪凡认为，理解欧盟反补贴调查，应结合当前欧盟面临的困境：减排目标高悬、失业通胀麻烦、内部相互诘难、再工业化繁难，在此基础上寻找政策背后的动因。对于欧盟国家来说，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是第一优先级，而减排目标更多是为了焕新产业创造力以及满足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

祁雪凡还表示，当前大批量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车都是以货物贸易或加工贸易的方式，不仅没有帮助增强欧洲企业自身减排的能力，还给因为通胀造成成本上升的本土企业更多竞争压力，持续增加的欧中贸易逆差，可能拉长欧洲再工业化复兴之路等问题，导致政策反击也在意料之中。

进入摩擦期的国际关系是另一重要因素。对中国的先进制造业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是最近欧洲及日本、韩国等

国跟随美国贸易战的共同特点。

海外建厂非“灵药”

业内正密切沟通如何应对，以将反补贴调查的风险降到最低。

许海东表示，中汽协正在组织中国车企积极应对，进行无损害抗辩。无损害抗辩需要中国车企提出证据，证明中国出口的汽车并未对欧盟汽车产业造成损害，通常耗时较长。一旦抗辩成功，反补贴调查或将终止。

长期看，以本地化生产减弱贸易政策风险，是多家中国车企的共同思路。现阶段，中国汽车出口体量渐长，但远难称成熟。如全球销量冠军日本丰田汽车，其生产和销售重心均在海外市场，中国汽车行业海外产能布局还处在较早阶段。

汽车出口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本地化。“从国际贸易实操角度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以10%的低关税整车出口到欧洲，这样的商业模式不可能长久。”9月20日，长城汽车负责国际业务的副总裁史青科在接受财新等媒体采访时表示。

史青科认为，欧盟反补贴调查将加速长城汽车在欧洲投资当地产能投的步伐。“欧洲市场是既能塑造品牌又能冲销量的高势能市场，在这样的市场我们必须要有挑战精神和战略定力，通过投资扎根当地。”他还介绍，在大多数年销量超过100万辆的汽车市场，都必须靠当地投资才能有机会。长城汽车目前正在调研欧洲建厂可行性。

除了长城汽车，今年7月，上汽集团也透露已将欧洲建厂纳入议事日程，目前处于选址阶段。上汽集团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余德当时称，在欧洲投资建厂，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更容易获得长期稳定的营商环境。比亚迪也在今年9月的德国慕尼黑车展中透露，计划年内完成欧洲整车工厂选址。

9月16日，WTO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接受财新专访时分析称，此次调查可能会激励中国车企到欧洲设厂，效果可能类似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激励车企到美国本土化生产。但他不认为这是欧盟启动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

基于过往历史，他预测，此类磋商会最终促成最低出口价格承诺（price undertaking），即进口国不加征关税，但出口商承诺不以低于某个基准的价格出口。此前光伏等领域的反倾销、反补贴处理结果中出现过这样的先例。“所以可能的结果是中国电动车继续出口，但不是以现在的价格，而是比现在的价格高，比如10%、20%或30%。”拉米说。

9月25日，在被美国媒体问及欧盟反补贴调查会否推动中国车企在欧洲本地生产时，东布罗夫斯基斯称，欧盟并没有着眼于推动强制本地化：“因为我们有许多国家援助（state aid）方面的规则，这些规则限制了成员国向生产商提供生产端补贴的回旋余地——在电动汽车或其他行业都是如此。在此环境下，我们面临快速增长的进口、需要考虑会发生什么。”

中国企业即便到欧盟建厂或进行收购，也面临当地监管的风险。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外国法律顾问满大宇对财新指出，在欧盟投资的中企将可能面临反垄断审查、外商投资审查和外国补贴审查三种监管。他们解释称，本次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依据的是欧盟贸易法框架下的反补贴法规，该法规关注的是传统的货物贸易方面的救济。而欧盟今年还新颁布了《欧盟外国政府补贴条例》，关注外国企业在欧盟境内的业务经营、投资并购，以及参与政府采购等事项过程中有无接受外国政府补贴。

因此，满大宇提醒，在华车企仍需密切关注本次欧委会调查会否进一步扩展至其他调查领域。

柏勇则指出，欧盟还对中国出口的风力涡轮机表达了关注，因此风电行业可能成为下一个火力集中的调查领域。此外，欧盟此前在一份白皮书中还提到了外国补贴对铝、钢铁、船舶和半导体产业链的扭曲效果，因此这几个行业可能是欧盟日后的关注重点。

据路透社和《金融时报》等媒体，欧盟估计在10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会见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时，宣布对中国钢铁企业展开反补贴调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10月12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已对此表态强烈反对，称该做法将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推高下游生产成本，影响消费者利益，无益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戚展宁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李东昊

最新财新周刊｜谁是“终极电池”？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动力电池呈现多条技术路径，更高能量密度和安全性、但未经量产验证的固态电池，机会窗口何在？

文丨财新周刊 卢羽桐 余聪

动力电池可谓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护城河”，其成本迭代与技术迭代攸关下游整车产品的竞争力。

中国固态电池领域两大“独角兽”公司近年内均完成了重要融资：据财新了解，清陶能源完成 G+ 轮融资，投后估值约达 260 亿元，投资方 15 家；卫蓝新能源去年底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约 157 亿元，并计划 2025 年上市，目前投资人已挤入 29 家。

两家公司都需要拿出上车能力，来证明自己的技术路线能否成功。所谓“上车”，即把电池包与电池管理系统模块、配电模块等组装进汽车，通过相关认证、测试后，最终实现整车量产应用。在这一流程中，电池厂家与汽车厂家必须互相信任、紧密合作。

“固态电池”是指将动力电池中的电解液变为固体电解质，以将能量密度大幅提升。业内普遍预期，未来全固态电池技术的能量密度可达1000瓦时/公斤（Wh/kg）。更高的能量密度意味着更长的续航里程；与此同时，固态电池能避免电池因漏液引发的安全问题，提升汽车安全性。这两大优点，使得固态电池被理论界视为锂电池的“终极形态”。但这一路线仍有诸多技术问题待突破，预计2030年才能落地商业化。

目前，中国开始上车的只是过渡性的半固态电池，还保留了5%—10%电解液，能量密度集中在360瓦时/公斤，充电一次最高可续航1000公里。而现在占据全部市场份额的液态电池磷酸铁锂、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集中在200—300瓦时/公斤之间。

2023年以来，固态电池上车进程提速。今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显示，卫蓝新能源新增为蔚来汽车（NYSE：NIO/09866.HK）电池供应商。6月，卫蓝将360瓦时/公斤锂电池电芯交付给蔚来。成立于2016年的卫蓝，长长的股东名单集合了一众造车新势力，穿透后单一最大股东是蔚来资本，持股14.96%。

同年诞生的清陶能源则相继引入北汽、上汽、广汽等国有汽车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股东。今年5月，上汽集团（600104.SH）称将追加不超过27亿元投资，完成后间接持有清陶能源约15.29%股权，成其第二大股东。双方合资公司上汽清陶，目标在2025年固态电池汽车达到10万辆年销的规模节点。

“固态电池上车不到10万辆级，很难说是真正实现量产。”清陶能源总经理李峥向财新解释称，固态电池上车包含三个阶段：一是研发技术、搭建产能；二是与车企合作进行定性研究，尝试小批量试验上车；三是产品定量开发、上车。“清陶现在进入第三阶段，2025年将和上汽合作量产一款A级车产品。”他说。

按此标准，中国固态电池厂商大多处于第二阶段。2022年1月，东风推出E70电动车，搭载了赣锋锂业（002460.SZ）旗下赣锋锂电的半固态电池；同年12月，半固态电池车型东风岚图追光上市，其电芯和模组由孚能科技（688567.SH）提供；搭载赣锋锂电三元固液态锂电池的纯电动SUV赛力斯，计划在年内上市。

资本加码、车企簇拥之际，业内不乏对当前固态电池市场价值的争议。一名工信部熟悉汽车政策的人士称，目前上车的半固态电池与液态电池相比，尚无不可取代的优势。“论续航里程，液态电池也可以实现1000公里以上的续航。”

“电池之王”宁德时代（300750.SZ）4月推出凝聚态电池，称其单体能量密度可达500瓦时/公斤，主要针对航空电动化场景，车规级应用版本年内也将具备量产能力，成本只在原液态锂电池基础上小幅增加。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否认这是固态电池，称采用了自研电解液，即用凝聚态电解质代替传统液态电解质，以提升充放电性能和安全性能。

李峥称，清陶能源的固态电池到2025年大规模上车时，成本可降至与宁德时代的液态电池相当。但目前，成本是半固态电池上车的最大障碍，这一因素在新能源汽车深陷价格战的2023年尤为显著。

造车新势力小鹏汽车（NYSE：XPEV/09868.HK）电池技术高级总监仲亮近期公开表示，更关注能满足低成本和快充性能的新电池技术，例如磷酸锰铁锂电池。“当前半固态电池成本太高，是液态电池的2倍。”

固态电池初创企业突成“吸金”大户

清陶能源（估值约260亿元，2016年成立）

融资时间	融资轮次	投资方
2023.5	G+	上汽集团
2022.4	战略融资	上汽集团、北汽产投、国寿资本、国开制造业转型基金
2021.2	F	上海科创基金（领投）、新鼎资本、科森科技、峰瑞资本、上海博福
2020.8	E++	广汽资本
2020.7	E+	上汽集团（领投）、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淮安市淮上英才创投
2019.12	E	北汽产投（领投）、昆山国科创投、峰瑞资本
2019.7	D	北汽产投、中银投资、峰瑞资本
2017.11	C	清控银杏、首业资本、渝商投资集团
2017.3	B	峰瑞资本
2016.9	A	峰瑞资本

卫蓝新能源（估值约157亿元，2016年成立）

融资时间	融资轮次	投资方
2022.11	D	中国诚通（领投）、招商局资本、国投创益等11家机构
2022.7	股权融资	淄博景能科技、国汽智联、中科创星
2022.3	C	顺为资本、小米集团、哈珀投资、众擎基金、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投资、吉利控股
2021.11	B	华为、小米集团、蔚来资本、IDG资本
2021.6	A+	海松资本、武岳峰资本、允泰资本
2018.6	A	江苏中关村产投、三峡资本、天齐锂业、中科院创投
2017.7	天使轮	荷塘创投、海博思创、武岳峰资本

辉能科技（2006年成立）

融资时间	融资轮次	投资方
2022.6	战略融资	国新科创基金
2022.1	战略融资	奔驰汽车
2021.10	战略融资	丹丰资本、春华资本、软银中国
2020.4	D	中银资本、一汽产业基金
2019.2	战略融资	软银中国
2015.2	A	泰达科投
2012.1	天使轮	软银中国

赣锋锂电（2011年成立）

融资时间	融资轮次	投资方
2023.1	战略融资	国投招商（领投）
2021.8	战略融资	小米集团（领投）、三峡水利、两江资本、OPPO、东风资管、新余高新投资等19家机构

资料来源：财新根据采访、公开资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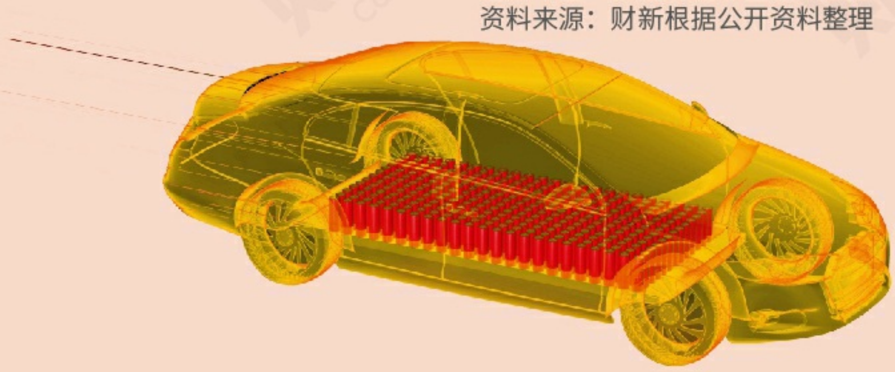
不明朗的市场前景下，车企选择固态电池的心态多出于如下考量：高端车品牌希望通过搭载续航里程更长的高密度电池增加卖点，力争在车市激战中突围；新能源车销量不佳、话语权较弱的车企，则希望通过扶持下一代技术的初创企业来保证供应链安全，打破宁德时代和比亚迪（002594.SZ）双巨头的“寡头统治”。

尽管电池市场的份额在不断离散，但宁德时代目前仍稳坐全球老大地位，截至今年8月，其全球市占率38%、国内市占率43.31%；一贯奉行垂直一体化策略的比亚迪，其电池九成自供，依赖不断增长的电动车销量，其国内动力电池市场份额从去年的23.45%增长到今年8月的29.27%。

固态电池加快交付上车

2020	
6月	清陶能源与合众新能源合作
7月	搭载清陶固态电池系统的北汽新能源纯电动样车下线
7月	哪吒U纯电动样车搭载清陶固态电池
2022	
1月	搭载赣锋锂电固态电池的东风E70电动车交付
1月	奔驰计划2025年后将辉能固态电池技术整合到多款电动车型
7月	上汽集团、清陶能源成立固态电池联合实验室
11月	卫蓝360瓦时/公斤车规级固态动力电芯下线，续航1000公里
当年	清陶上汽实验装车固态电池368瓦时/公斤，最大续航1083公里
2023	
2月	搭载赣锋锂电固液态锂电池的纯电动SUV赛力斯2023年上市
6月	卫蓝新能源360瓦时/公斤锂电池电芯交付蔚来汽车
5月	清陶能源与上汽集团推2025年固态电池上车10万辆级
8月	清陶能源与上汽集团成立合资公司

资料来源：财新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固态电池的资本市场窗口期快结束了，还没融到钱的企业之后会比较困难，但产业的窗口期还很长。”清陶能源一名主机厂背景的投资人表示，车企期望固态电池企业更多关注当下，而非执念于达到最终的全固态状态。“在电池横向对比中，它（固态电池）有比较优势，而我们用上能比别人好就行了。”

卫蓝新能源首席科学家李泓对财新称，固态电池产业化相对成熟的标志是实现10吉瓦时（GWh）以上的产能，对应搭载汽车数量超过5万辆。目前，宁德时代、比亚迪等电池巨头尚无动力大幅投入固态电池，但随时伺机在侧。在李泓看来，这正是初创企业宝贵的三到五年窗口期。“在窗口期，固态电池企业只有挤进国内前十大电池供应商名单，才有资格在2027年之后与巨头开始真正的竞争。”

车企入场

全球范围内，整车厂对固态电池的热情从2017年开始逐步升温，多家企业宣称到2025年实现固态电池汽车量产。

2017年，宝马与美国初创公司Solid Power开始在固态电池上的合作。2021年，宝马、福特等公司对Solid Power投资约1.3亿美元，并推动后者当年登陆纳斯达克。

大众汽车则在2018年向美国固态电池公司Quantum Scape投资1亿美元，成其最大的汽车股东；2020年再追加2亿美元投资，推动Quantum Scape于当年11月登陆纽交所。大众计划最早2024年推出搭载Quantum Scape固态电池的汽车。

2023年，梅赛德斯-奔驰参与了中国台湾固态电池公司辉能科技的融资。辉能科技创始人兼CEO杨思枏公开表示，2016年以来就与奔驰合作测试电池。奔驰计划2025年后将固态电池技术整合到多款电动车型中，2030年全面实现纯电动化。

上汽集团是较早关注固态电池的中国车企，率先投资布局：2016年至2018年间入股Quantum Scape和另一家美

国电池初创公司Solid Energy，同期上汽内部组建了固态电池开发团队；2020年、2022年还两轮投资了清陶能源。

北汽也较早关注固态电池。“2017年我们跟奔驰一起看了一家以色列快充公司，他们给了这家公司很大支持，回来后我们就扫描了整个电池行业。”北汽产投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贾广宏向财新表示，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专利、团队、积累等方面都不逊色，加上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刚起步，“水大鱼大”。2018年，北汽产投做了投资清陶能源的决定。

日本车企对固态电池的密集动作，刺激了中国新一轮投资。丰田在2008年成立电池研究部，开发包括固态电池在内的下一代电池技术。2020年8月，搭载丰田全固态电池的概念电动车获得牌照，并完成道路试验。今年4月，另一家日本车企本田汽车宣布投资研发半固态和固态等新一代电池，2024年启用固态电池示范生产线，希望在2025年之前推出使用固态电池的混合动力汽车。今年6月，丰田汽车宣布争取到2027年或2028年实现固态电池应用于纯电动汽车。

“丰田的动作让中国主机厂对固态电池装车更紧迫，推动车企领导层自上而下快速决策。”李峥指出。

北汽产投、广汽资本和上汽集团均投资了清陶；吉利和蔚来、华为、小米等新能源车的新势力则选择投资卫蓝；东风和长安汽车投资了赣锋锂电；一汽则选择了辉能。李泓认为，固态电池合理的发展路径是首先匹配高端车型，起量后再扩至更全面的应用场景。

上汽是国内最早宣布规模量产固态电池汽车的企业，计划从2025年上半年起，旗下子品牌智己、飞凡、荣威、MG将推出多款固态电池量产车型，整体量产目标10万辆。李峥称，上汽清陶2024年可以量产“充电十分钟续航400公里”车型；2025年将有一款A级车（价格15万元以内）量产；2025年到2027年的产品规划业已形成。在他看来，之所以选择A级车作为首款车型，是因为A级车市场大、成本压力突出，固态电池可以帮助主机厂降本，提升毛利率。

蔚来在固态电池上车方面也不遗余力。2020年末，蔚来在全球范围内筛选固态电池供应商，包括宁德时代在内诸多电池企业参与，最终卫蓝新能源在电池评测中获胜成为合作方。2021年1月，蔚来发布ET7车型，宣布后续搭载能量密度360瓦时/公斤的半固态电池。当年11月，蔚来即参与了卫蓝的B轮融资。

不过，蔚来固态电池上车一再延期。“150千瓦时电池的研发和最后论证时间的确超出预期。”蔚来联合创始人秦力洪曾对外解释。李泓解释，一个全新的电芯开发时间一般是两年，上车的话还要经过两冬一夏的测试；卫蓝电芯今年6月已经通过所有车规级的测试交付给蔚来，目前还在加速动力电池系统和应用层级的开发，以及配合蔚来升级电源管理系统。

一名熟悉蔚来的人士称，蔚来依靠自身换电体系，不需为固态电池单独开发新车型，就可实现150千瓦时固态电池快速上车。用户购买小电池版本车型后，如有长途需求即付费更换大电池，“通过换电，固态电池上车快，后续还可以快速迭代”。截至2023年10月9日，蔚来已在全国布局了1937座换电站。此外，蔚来还希望通过以租代售模式，降低固态电池汽车用户侧的短期成本。

为尽快推出固态电池汽车，蔚来150千瓦时版本已在挪威完成冬测。蔚来CEO李斌向财新强调，目标是争取2023年内交付给用户。

东风汽车已在2022年初下线固态电池运营示范车，合作方是赣锋锂电。赣锋锂电当年发布数据称，其研发的混合固液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达到260瓦时/公斤——不过这一指标尚不及最新的液态电池。

多名采访对象指出，目前固态电池还谈不上真正实现上车，同时消费者反馈缺失，市场效果待察。前述财务投资人也指出，从市场数据看，有高端续航需求的用户可能只占5%—10%，而中间段消费者可能会被快充技术提升所满足。

新能源汽车市场当前竞争灼热，价格战此起彼伏。部分业内人士认为，车企普遍的降本诉求下，固态电池这样的新技术上车前景不算明朗。蔚来资本董事总经理管宇凡则认为，行业增速放缓或产业进入饱和阶段，才是新技术的好机会。“此时大家才会追求新技术，实现产品体验提升或成本下降。否则，传统产能供不应求时，谁会去追求新技术呢？”

“独角兽”爬坡

车企选择的固态电池公司大体分为两类，一是高校产学研孵化企业，比如清陶和卫蓝；二是错过液态电池发展黄金期，希望借固态电池弯道超车、杀入赛道的产业投资者，比如上游资源公司赣锋锂业。这两类企业是过去几年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香饽饽”。

前述传统车企背景投资人直言，初创电池企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车企对清陶能源轮流支持是件好事，即便成熟的电池巨头也需要在车企扶持下发展。2017年至2019年，上汽、广汽、东风、一汽四家车企，就陆续宣布了与宁德时代共建电池厂的计划。

目前，清陶能源是固态电池市场的“吸金王”。清陶的产业投资人多为传统国有大厂：2019年北汽产投最早进

入，一年后再引入广汽资本和上汽集团。

“行业还没到形成排他性的阶段，没那么强的壁垒。”李铮表示，多家主机厂一起建立利益体系，能帮助公司在产品前期验证中跑得快一点。他表示，清陶现阶段聚焦在点的突破上，一个主机厂实现产品突破后再横向扩展。

“2014年成立之初，公司内部有一个约定，五年内不跟汽车厂打交道，不探讨任何上车问题，因为我们自身能力、产业经验和技术成熟度还不能满足汽车要求。”李峥回顾道。

到2019年，中国迎来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地方补贴大幅度退坡，市场对未来充满担忧，二级市场电池企业市盈率也跌至20倍的低点。这一年，清陶开始与主机厂接触，基本流程是：先做技术方案、产品设计探讨以及车型适配，再做基础测试、样车积累数据，在此基础上对产品进行迭代改进，最后才是批量装车。当时投资了清陶的投资人表示，一方面认为清陶当时的估值和技术都较好；二是清陶的产线覆盖隔膜、电芯、材料等全系列环节。

2018年11月，清陶年产0.1吉瓦时产线在昆山投产，成为国内首条可量产固态锂电池产线。更多融资推进之后，2020年中，江西宜春固态锂电池一期投产，年产能1吉瓦时；同期还与合众新能源达成战略合作，当年搭载清陶固态电池的北汽纯电动样车下线。

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迎来高速发展阶段，当年销量超过350万辆，市场渗透率为13.4%，次年再提升至25.6%。上述财务投资者认为，液态锂电池快速上量，市场对续航里程的持续焦虑，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固态电池的发展。

固态电池产能规划和产业化在2022年加速。清陶能源、卫蓝新能源、赣锋锂电、太蓝新能源当年均宣布了新项目，陆续有产品交付车企测试。

2022年以来，清陶能源在苏州和成都分别签约了10吉瓦时、15吉瓦时固态锂电池项目，累计投资150亿元。清陶也在2022年与上汽成立固态电池联合实验室，完成了第一代固态电池装车试验，单体能量密度368瓦时/公斤，最大续航里程1083公里。一名清陶内部人士介绍，2024年，上汽智己品牌将推搭载清陶第一代高能量密度固态锂电池车型，2025年再推第二代固态电池车型，且成本更具优势。

卫蓝新能源的股东名单里则聚集了一众造车新势力：蔚来、小米、华为。此外，天齐锂业和吉利也参与了卫蓝的早期融资。有业内人士担忧，卫蓝引入的产业投资人太多，未来追求的目标也可能过于分散。

卫蓝也在积极扩大产能，今年7月湖州电池基地二期开工，年产能20吉瓦时，投资109亿元。李泓称，固态电池需要突破的技术远不止电芯，还需要材料、装备、系统集成和数字化等生态支撑，为推动固态电池发展，完善供应链配套，公司和产业链上下游近20家初创企业、龙头企业进行配合。

现阶段固态电池产能仍有压力。卫蓝目前已投产产能仅2吉瓦时，在满产、良率全部达标情况下，可生产约1.3万块150千瓦时的电池。李泓坦承：“这样的产能，即便是蔚来每个换电站放一块都满足不了，需要加速爬坡和扩产。”

赣锋锂电则吸引了东风汽车、长安汽车等产业投资者。2022年11月，其母公司赣锋锂业宣布增资20.9亿元，进一步引入外部投资并筹划将赣锋锂电分拆上市。2023年1月，赣锋锂电完成新一轮战略融资，国投招商领投。研发固态电池的同时，赣锋锂电兼顾液态动力和储能电池，2022年出货量达到6吉瓦时，当年营收66.7亿元，净利润5.5亿元。在产能规划上，其位于重庆的20吉瓦时新型锂电池科技产业园项目正在建设中，目标打造全国最大的固态电池生产基地。但多名采访对象指出，赣锋锂电车规级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与另两家头部企业仍有差距。

承载行业终极理想的全固态电池，仍面临技术挑战和不同路线选择。如变为固态电解质，内阻会比液态电解质大；此外，对固态材料的选择，不同类型材料物理上软硬程度不同。目前，中国头部固态电池公司以氧化物材料为基础的固液混合技术路线为主；日韩企业多采用硫化物固态电解质技术路线；欧美企业选择则更多样化，如Solid Power主要走硫化物路线，Quantum Scape则选择氧化物路线。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丰田汽车等选择的硫化物路线比较激进，虽有望一步到位实现全固态电池研发，但所需时间和技术积累也更多；而中国企业选择的固液混合路线更务实，可以更快上车。

李峥表示，丰田汽车有足够的利润支撑研发，在没有终极形态的产品之前，可以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但清陶作为初创企业，需要有产品推出、有对应的市场，并构建产业链。他介绍，日本的固态电池开发规模化、产业化过程是“举国体制”，科技主导部门前瞻性地制订了固态电池产业化计划，整合日本国内大财团和整车、材料、电池等知名企业参与其中，包括丰田、本田、松下、索尼、东丽等。“日本在研发上的一大特点是严谨，论证很充分，在工作过程中提出切实可行的规模化节点。”

另一边，中国初创企业的优势在于庞大的产业规模和成熟完整的汽车产业链。虽然中国造车起步比日本晚，但能不断结合制造能力的升级、产品应用的拓展，实现迭代式发展。‘量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这样逐步上台阶的方式，对中国产业化过程是更切实可行、有效的策略。”李峥指出。

和巨头抢时间

对固态电池初创企业而言，国内成熟的液态电池公司占据着强大的优势地位。

国内第四、第五大动力电池公司国轩高科（002074.SZ）、亿纬锂能（300014.SZ）先后在2022年发布半固态电池进展。国轩高科工研院副院长张宏立表示，其研发的密度为360瓦时/公斤三元半固态电池当年量产，400瓦时/公斤的三元半固态电池在实验室已有原型样品。亿纬锂能则透露，50千瓦时的软包电池可以实现330瓦时/公斤的能量密度和超过1000次循环，目前半固态电池已完成设计定型，并装车验证中。

科尔尼全球合伙人王怿恺指出，在主流技术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动力电池也逐渐变成偏大宗、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先的市场，类似此前光伏产品面临的困境，无论是为增加产业链和技术的话语权，还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动力电池企业都在加大对下一代技术的投入。不过，电池双巨头宁德时代、比亚迪不断迭代液态电池，还没有大规模投入固态电池。

宁德时代的凝聚态电池在能量密度上直追固态电池，在液态电池也探索多个研发方向，包括钠电池、无模组动力电池包（CTP）等。宁德时代还将推出M3P电池，即优化后的磷酸铁锂电池，董事长曾毓群去年曾公开表示，与磷酸铁电池相比，该款电池能量密度可提高10%至20%。

比亚迪未在公开场合提及固态电池，专注提升其在2020年推出的刀片电池。刀片电池本质是磷酸铁锂电池，在充电速度上不及三元电池。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曾建议用“一车多枪”提高充电速度，在业内引发争议。据财新了解，比亚迪正在研究下一代磷酸铁锂电池，充电速度将较目前有所改善。

对宁德时代、比亚迪这些传统电池巨头来说，保利润、保市值更为必要，不会高强度投入固态电池这类新路线的研发，但也会时刻关注新竞争对手动态，打好防守。一名整车厂背景的投资人描绘这些先行者的心态称：“每一条技术路线好像都不能放弃，万一有一条成了呢？但创新性非常高的产品也意味着高风险成本，特别是对之前市值增长非常快的公司而言，万一没有做出来，股价怎么办？”

技术路线选择之外，人员、资源和产能配置，都是制约传统巨头大量投入固态电池的原因。当前动力电池行业正经历激烈的竞争，由于前期供应紧张，为获得下游订单，电池企业不得不疯狂扩大产能，为此均投入了百亿计的资金打造液态电池产线。在技术出现革新时，先期投入意味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现在的产线如果不能兼容新技术，那过去的投资全白费了。”前述投资人担忧。

李泓指出，固态电池产品目前尚未达到颠覆产业的临界点，巨头公司对电池技术路线转折点的判断，特别是全固态电池，大多集中在2027年至2030年间，因此在资源上没有显著倾斜到固态电池。“为了满足全球大量不同车企的定制化开发需求，龙头电池企业需要匹配大量的项目研发人员，实际能摊到尚未明确应用的全新技术上的人员、资源有限，内部资源调配不易。”他认为。

但这不意味着巨头公司不重视创新技术。一名专注投资锂电上游技术创新的投资人告诉财新，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的研究院都有三支团队，分别是“N+1”“N+3”“N+5”。“N+1”即指明年就要投资见效的方向——比如磷酸锰铁锂电池——这种技术路线初创公司没有机会，因为宁德会把60%、比亚迪会把80%的资金投到这类项目。“N+3”的项目可能是钠电池，现在能做但成本还不具竞争力。对初创企业来说，机会就来自所谓“N+3”到“N+5”的项目，比如全固态电池、新型正极材料等，学术圈研究很多年但产业落地很短、很快。“宁德时代在‘N+5’上可能只放了10%的资本和精力，比亚迪可能是3%—5%。”

基于上述种种考量，巨头的期望是2030年固态电池才可实现量产上车，这样目前液态产线基本能折旧完成。这意味着，初创企业的时间窗口只有三到五年。在此期间必须杀到前十名，才有望存活。“当你的技术真的有颠覆能力时，它们（巨头公司）会非常警觉，到时你干的事情人家也都看明白了，你所依赖的供应链人家也能采购，你的产品人家也能快速学习跟进，最后就拼包含技术、工业化、成本在内的综合实力。”李泓坦言。

前述传统主机厂背景投资人亦一针见血地指出，初创企业需要利用“大象”转身困难的时间窗口，把自己的壁垒建起来，才能顶住宁德时代、比亚迪的第一波冲击。▫

屈运栩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李东昊

最新财新周刊｜特别报道：大厂用人术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穿透降本增效看互联网公司招人：给多少钱？招什么人？用多狠？



北京一互联网公司的休息区。从2022年开始，互联网大厂不约而同地进入收缩期，试图通过裁员拉动组织效能，改善业绩增长乏力的问题。

文丨财新周刊 包云红 关聪 孙嫣然 屈运栩

9月，秋招季拉开序幕，被俗称为“大厂”的互联网科技类公司仍是应聘者热望的目标，但供需双方都一再调低预期。

从数据上看，今年互联网行业给出的秋招需求不低：京东提供供应链、技术、产品、运营等方向8000个应届生就业岗位，数量为互联网行业之最；阿里巴巴六大业务集团总计需招1.5万人，其中校招超过3000人；美团社招规模上万、校招6000多名额，均高于往年……

“整体上，主要互联网公司的人员规模没有大的降幅，甚至秋招还说在扩大招聘。”猎头公司执一咨询创始人郑楠告诉财新，互联网公司体量大，一旦减少招聘尤其校招规模，容易招致负面解读，“但从我们服务方的角度看，它们仍普遍处于较大的收缩区间。”

各大厂裁员、优化、缩编、锁编、降薪等状态已持续一年多，局势在这个秋天并未好转。刚度过暑期实习的众多高校毕业生近来领教到，“过五关斩六将”地完成大厂实习后，仍转正难、留用难，甚至有人刚入职就被裁员，不得不再投秋招大军。

收缩之外，招聘的门槛也更高了。“从推过来的简历看，现在基本是研究生起步，即使实习生也都有大公司工作经历。”一名字节跳动人士对财新称。过去数年都是招聘大户的字节跳动，今秋悄然抬高了校招门槛，只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六所国内顶尖高校宣讲。

萎缩的人才需求正向两头集中——有充分业绩验证的管理层或线下劳务人员。多名猎头公司人士对财新称，今年互联网大厂释出的招聘名额，实际只有2022年的一半或以下，招聘需求更多集中于高端岗位。郑楠指出，大厂汰换人才的目标明确，“有的公司要求走一个，就一定要招个层级更高的，以此推动人才结构升级”。

互联网公司对裁员和锁紧招聘的通用说辞是“降本增效、优化人才结构”，背后实质是业务增长乏力、市场竞争加剧，以及新技术趋势下亟须升级迭代主营业务，诸多上市公司股价屡创新低，未上市公司则面临更不确定的上市进程与财务前景。

历经十余年一路向上的互联网行业在2019年初现增长疲态，与此同时整体监管环境趋严，各大互联网公司纷纷进入裁员降本的调整状态。（详见本刊2019年第3期封面报道《互联网经济探底》）但这一波调整伴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的到来戛然而止，疫情防控导致在家办公、娱乐等需求暴增，拉动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急速扩张、抢滩线上。

财新统计了从2019年底到2021年底各互联网公司的人员规模变化：腾讯和字节跳动的员工总数都从6万扩张至11万；阿里由于并表高鑫零售，员工数从10万飙升至25万，即便除去高鑫零售也增至13万；京东包括快递员在内的整体用工数从23万猛涨至38万。二线互联网公司也大幅扩大盘面：B站从4800多人翻至1.2万人；2019年大规模裁员的知乎，一年后将员工数从1600人扩至2600人。

这一轮互联网大扩张在2022年年中止步。延宕的疫情持续打压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强力政策，逐步落实到常态化监管执法层面。

2022年秋招前，以“毕业”为名的互联网大厂裁员潮起，各公司开始了新一轮用工结构调整。“35岁门槛论”再次引起社会聚焦与争议，35岁以上员工往往占据中层管理岗，薪酬不低，却在常态化运营体系中和年轻员工相比已无明显优势，最易成为裁撤或减招目标。以快手为例，其在2023年一季度录得上市以来首次盈利，当时员工2.54万人，年内减员9.6%；今年再推“青石计划”，员工转正和晋升考核都要参考年龄。“内部做了个指数，按年龄除以职级，指数越高的被裁可能性越大，意味着先裁的往往是年龄大但职级低的人。”一名快手人士告诉财新。

2023年，宏观经济层面延自上年的各种压力有加重趋势，而进一步的挑战在于：疫情终结、社会开放之后，国内需求即所谓“内循环”修复的速度与程度均低于预期，打击了市场积极性；国际地缘政治持续冲突，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科技合作、国际贸易、货币流通等经济领域，涌动着各类结构性重组的“化学反应”。如此改革开放40余年来均未曾出现的复杂环境，令中国企业在战略决策上面临空前的挑战。

互联网行业继续压低增长预期，加快人员、业务结构调整，而穿透它们的动作，亦可见两大发展趋势：一方面，“出海”寻找新市场、挖掘“外循环”需求，势在必行。阿里、字节、拼多多等大厂都调兵遣将加快部署海外业务。另一方面，2022年底ChatGPT的横空出世，意味着美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上实现重大突破，全球迅速掀起新一轮AI（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尽管受美国层出不穷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所“钳制”，出于生存和竞争需要，中国的科技、互联网公司也必须全力跟进。这使得今年以来，AI、算法工程师、应用层、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领域高端人才需求爆火。

据猎聘数据，2023年春招，各互联网公司在AI大模型相关的校招职位同比增长172.53%。但另一边，AI的发展与应用，开始快速取代初级编程、设计和客服等岗位，并在极大地冲击传统社会对职业与就业的认知体系，对未来影响深远。

寡头急扩骤裁

“现在杭州的互联网公司基本都不缺人。”一名阿里前员工告诉财新，自己半年内投递了近千份简历，“很多公司都只想要纯垂直类人才，对半路转型的人几乎没有容忍度。”

“我有一个前阿里的朋友，原来年包（包括工资、奖金、分红等在内的年度全部税前薪酬）50万元左右；被裁员后去了滴滴，年包降到40万元；滴滴待了6个月又被裁员去了字节跳动，年包只有30多万元了。”上述阿里前员工告诉财新，目前就业行情下，大厂“毕业”后再就业大多会被降薪。同步消失的还有各类福利。一名腾讯前员工告诉财新，此前腾讯部门年会，百人左右团队的奖品有数十万元，“后来降到几万元，到我离开时已不开年会了；而团队涨薪比例也从20%降到10%左右甚至不涨薪”。

一名互联网领域猎头告诉财新，近年来，大厂人员几乎只有汰换、没有增长，共同诉求是提高组织效率：“今年虽然裁员消息比去年少很多，但整体流动性偏低，市场不好，哪家都差不多，跳槽的风险收益不成正比。”

从2022年开始，互联网大厂不约而同地进入收缩期，试图通过裁员拉动组织效能，改善业绩增长乏力的问题。

一名2022年底离职的阿里前员工回忆称，2022年4月，阿里封锁了所有部门的所有HC（Headcount，拟招聘人数），淘宝天猫、阿里国际站、Lazada随后都开始裁员；到6月底，IoT（物联网）事业部和GTS（全局事务服务）成为“重灾区”，新兴成长型业务IDC（互联网数据中心）等也未幸免，各部裁员指标在15%—30%之间。阿里主营业务电商全面“舍弃”中层，淘天集团CEO戴珊曾把管理层级M4、专业职级P9放在一起比较，判断哪些工作存在人员重叠，将其梳理出后“优化”。



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2022年， 阿里合计减少员工19576人;2023年上半年，再减少11065 人。

此外，阿里还全面剥离短期内无法盈利的业务，让其独立“谋生”，如客如云等；本地生活板块则从扩规模、抢市场，转变为缩亏。“饿了么去年以来都在强调UE（单位经济）改善。”一名外卖平台人士表示。2023年一季度起，饿了么每笔订单的单位经济效益持续录得正数。

2022年，阿里合计减少员工19576人；2023年上半年，再减少11065人。截至2023年6月30日，阿里员工总数为22.87万，较2021年底巅峰期减少了超过3万，裁员比例近12%。阿里的业务增长持续乏力，2023财年（截至2023年3月31日过去的12个月）集团营收增速仅为1.83%，而2021财年、2022财年的营收增速分别为40.72%、18.93%。

“优化”还在进行中，阿里在3月28日启动其成立24年来最大规模的组织变革，将原阿里集团拆分成“1+6+N”的数个独立公司，设立阿里云智能、淘宝天猫、本地生活、菜鸟、国际数字商业、大文娱等六大业务集团，伴随这一组织变革的是新一轮裁员，二季度员工数量又骤减6541人。

“我们刚给毕业生发了offer（录用通知书），集团就宣布拆分，很多中台的职位没有了，只能赔偿毕业生让他们再找其他工作。”一名阿里中台人士告诉财新，2023年的招聘竞争极为激烈，其刚招入的一名清华大学研究生说，同班十余人中他是当时惟一找到工作的，“结果他这工作也没了”。

在阿里巴巴体系内，中台是指相对电商、云、物流等垂直业务之外，包括技术、会员、营销、公共关系等可通用的支持业务和部门，阿里此前奉行“大中台、小前台”逻辑，是为了避免公司业务快速发展过程中“重复造轮子”。这样的组织架构，曾被诸多互联网公司效仿。但郑楠指出，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后台每接一个业务需求就会配一票人，团队变得越来越冗余，最终并没有达到高效协同。一名阿里中台员工也证实，业务线向中台提需求时，业务方面有负责人、中台部门也有相应对接人，“双方其实管的是同一摊事”。

阿里分拆后，中台被要求做薄做轻，因而成为裁员“重地”。虽然中台员工可以选择去拆分后的业务公司，但并不会被无条件接受。“考虑到业务集团不需要那么多职能人员，阿里也提前告知，计划在半年内裁掉大量转岗人员，只有能为业务创造价值的人会被留下。”一名熟悉阿里的人士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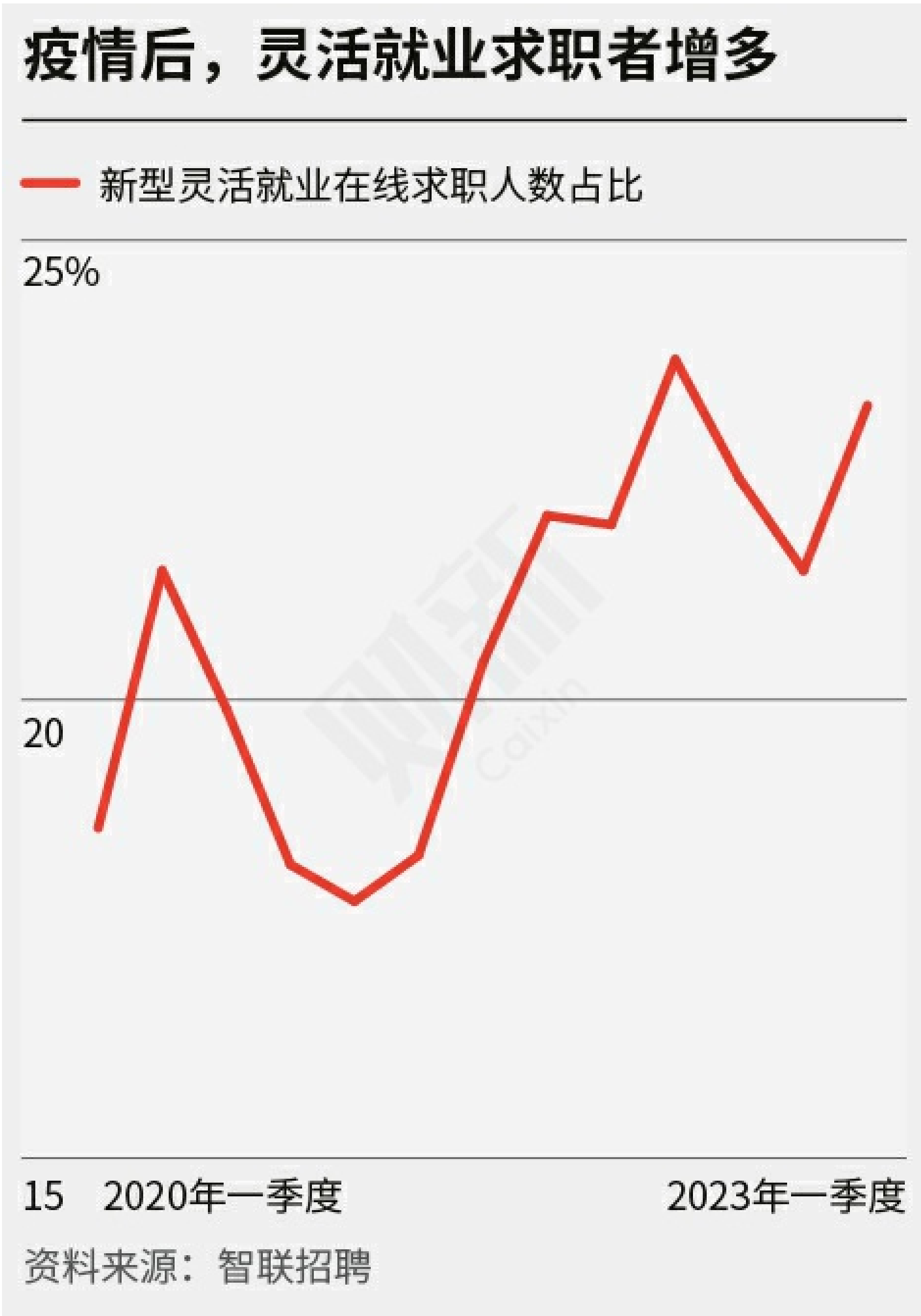
阿里独立后的业务集团人事自主权增加，也选择继续精简人力。5月，一季度首现收入负增长的阿里云，给出

了裁员7%的指标；主要负责芯片和新技术的达摩院，则将自动驾驶业务转入菜鸟集团，并放弃了部分业务和人员。

组织重整带来人事动荡、上升路径被打乱，不少员工因此主动离职。一名淘天集团员工称，其所在部门今年以来换血80%，一半是裁员，另一半则是不认可部门业务方向，主动离开。"阿里'小山头主义'很重，现在圈子不稳定，看不出谁是谁的人，很多人因此就走了。"一名熟悉阿里的人士称，目前阿里主要中层员工——此前职级中的P7和P8都很迷茫。

为刺激组织效能，阿里将原来内部专业职级中的P4—P8五个管理层级，调整为14—28级15个层级，以增加基层员工晋升机会。调整后员工奖金和层级分开，与业绩挂钩。"职级的意义已不大，现在市场情况下，互联网公司升职级要比之前难得多。"上述阿里前员工认为，尤其是阿里"1+6+N"组织变革后，部分职级重新计算，员工对职级重视程度已相对低了。

团队年轻化是阿里人员调整的另一逻辑。阿里集团新任CEO吴泳铭在上任后的第一封全员信中表示，将实行团队年轻化，四年内要让"85后""90后"作为主力管理者来刷新团队。2022财年，阿里低于35岁的员工占总员工的50.69%。



今年二季度，阿里集团的业绩有所起色，收入2341.56亿元，同比增长14%，增速重回两位数；归母净利润343.32亿元，同比增长50.98%。六大业务集团中，核心业务淘天集团重回增长；国际电商业务营收增速领先，为41%；正式开启IPO的菜鸟集团则扭亏为盈；本地生活集团经调整EBITA亏损19.82亿元，较去年同期收窄8.52亿元；大文娱集团首次实现季度盈利；营收增速最慢的阿里云，亦从一季度的负增长中逆转。

另一家互联网大厂腾讯的人员峰值也在2022年年中，此前两年员工数量从6万增至11万。从2022年一季度开启裁员后，腾讯至今都在"优化"中，所有部门都背着人员收缩指标。财新了解到，2023年以来，从游戏业务IEG（互动娱乐事业群）、PCG（平台与内容事业群）到TEG（技术工程事业群），腾讯均在持续推进裁员。2023年二季度末，腾讯有104503名雇员，同比减少6212人。

2023年，腾讯取消依据市场情况的薪资普调，员工每年只剩一次与绩效表现直接挂钩的调薪机会，绩效太差则

会被劝退，绩效考核标准从原来的“五星五档”削减到只有五星、三星、一星三个档位，被打一星相当于让直接走人。

在一个架构庞大、层级纵深的公司，动手减员并非易事，浓重的嫡系文化、上下信息互通壁垒，都为决策带来困难。一名接近腾讯的游戏业者告诉财新：“腾讯的架构臃肿，比如游戏业务内部竞争很激烈，大家都在争渠道资源，对上线产品的数据要求又很高。所以制作人是没法自己拍板决策的，还要做‘向上管理’，因此在产品、团队上改变很难。”



2023年9月28日，武汉，华中首家、全国第9座京东MALL试营业。

但“向上管理”也保不住工作。“砍完一拨高层后发现人力成本还是没下去，只能继续砍，裁员范围从边缘基层员工延伸到年限久、薪资高的那群人。”一名腾讯游戏前员工告诉财新。

部分业务裁员后就不再替补新人。“招聘要求提高、难度更大，无形中延缓了人才加入的节奏，这也是降低人力成本的一种策略。”郑楠观察。据财新了解，2023年，一个外联岗位基层员工入职，最终都需要总裁刘炽平批准。

长期贡献腾讯一半收入的游戏部门全面缩编。继长达一年没有拿到新版号之后，腾讯今年已经拿到4个国产游戏版号、2个进口游戏版号，但均少于2021年版号停发前的水平。“腾讯的自研游戏砍掉了一批项目，现在一个工作室手里项目基本只有一两个了，新项目原则上要用腾讯主体去申请版号，在版号这么稀缺的情况下，如果立项过多会造成资源浪费。”上述接近腾讯游戏的人士告诉财新。

7月底，腾讯游戏最大的工作室——曾经出品《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的天美工作室，其非主力项目被“连锅端”。上述腾讯前员工告诉财新，近1000人的事业群经过数轮裁员、团队调整后，目前离职人数已过半。天美工作室从2022年起重点研发一系列被称为“登月计划”的创新项目，腾讯特批数亿元资金扶持，其中包括对标二次元游戏《原神》的游戏和元宇宙等项目，但在今年3月底中止研发，此前100人左右的团队目前只剩下10个人。

游戏之外，曾被称为“造就另一个腾讯”的战略投资部早已低调行事。“以前腾讯的战投部门非常激进，一年投几百个项目，但（2021年之后）意识到风险，开始‘猫着过冬’，虽没明说不招人，但确实在控制节奏、慢踩刹车。”郑楠说。

人员、机构等各类成本的压缩初显成效，2023年上半年，腾讯营收同比增长11%至2991.94亿元，归母净利润700.86亿元，同比增长31%。三大业务板块毛利率提升，营收上，增值服务和广告逆转了2022年的负增长趋势；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增速从5%提升至14.55%；游戏业务在一季度扭转连续三个季度的同比负增长局面；6月，腾讯视频对外称已连续四个季度实现盈利，成为继爱奇艺之后第二家盈利的长视频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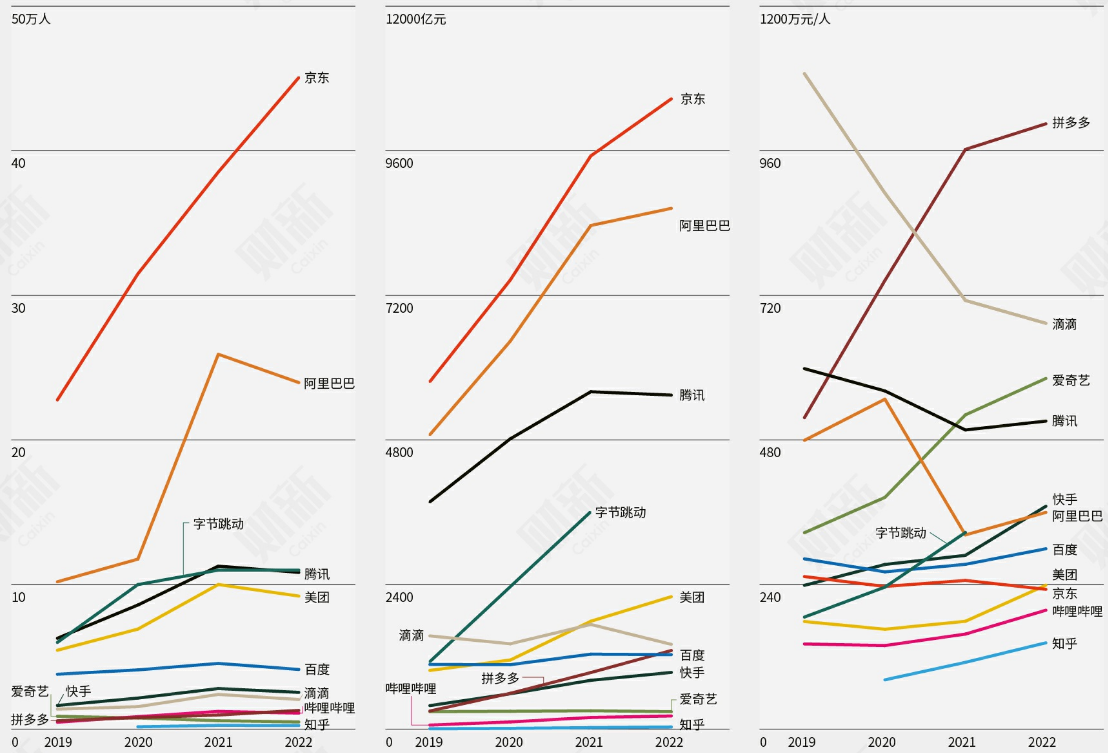
多名腾讯员工对财新称，对裁员已习以为常。其中一名刚离职腾讯的15年老员工直言，裁员对腾讯和阿里这样的老互联网公司来说还相对谨慎一些，但经历这两年的“大换血”，也可能改变公司过去彰显的员工归属感、以人为本等用人文化。“现在的年轻人不再相信‘画饼’，工作最好及时兑付，像字节跳动、拼多多这些新兴大厂，工资给得高，员工上班就是为了挣钱，也不讲什么期权愿景，入职、离职都更加无痛。”她说。

谁是“内卷”之王？

最让员工“无爱无痛”的字节跳动和拼多多，恰是目前中国互联网行业增长最强劲的两家公司。2019年至2021年，字节跳动整体营收从1100亿元暴增至3600亿元。据市场调研机构Insider Intelligence测算，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平台抖音2022年广告收入191.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00亿元。拼多多的营收从2019年的301.4亿元猛涨至2022年的1305.6亿元。

此外，内容社区小红书的增长也颇为亮眼。根据QuestMobile统计，2023年8月，小红书的MAU（月活用户数量）已达2.03亿，DAU（月均日活用户数量）超过8600万——2019年11月这一数字仅为2500万。

互联网公司扩张后持续收缩 人效比提升



注：1.图中阿里巴巴营收已由财年数据（即每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转换为自然年数据，其2020年由于并表高鑫，员工总人数增长13万人；其余公司皆为自然年数据；2.美团员工人数不包括外包的物流快递人员；而京东属于自建物流，员工包括快递人员。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公司官方公众号

和高速发展匹配，公司对人才的需求也逆势增长，字节跳动从2019年的6万员工增至目前的12万；拼多多同期从5800人增至1.3万人；体量较小的小红书，正式员工也从2000人翻倍至4000多人，还有5000余名外部内容审核人员。

这三家公司的流动性也远超老牌互联网企业。招聘市场形容字节跳动和拼多多的用工文化是“用完即弃”，但这两家因为工资高，业绩增长快，在招聘市场仍极有竞争力。小红书则因其持续的招聘需求，开始引起诸多大厂员工的注意。

“快进快出”，是成立11年的字节跳动固定下来的传统，每上一条新业务线，就快速扩张到位并维持稳定增长，一旦增速不达预期就会迅速缩减人员。“字节是一个信息驱动管理的公司，在数字化工具面前，人只是一个个信息节点。”郑楠形容，很多人待三年都没见过“老板”（上级领导），在飞书上沟通，只要把活干好就行；新人加入公司也有完善的文档可以参考，不需要“老带新”，靠的就是数据信息驱动。“有人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有人就觉得缺少人文关怀。”

在一些商业化部门，字节每年都按比例塞进一部分校招生，管理层发现，在自己的体系内，即使应届生拿到大客户也能接得住。高效的机器，让字节跳动似乎越来越不需要中层，只需最高层决策业务方向，基层员工根据模型和数据执行任务即可。

一名字节广告业务员工告诉财新，他入职时刚好赶上架构变动，武汉TSO（人力交付）中心整个一层楼的员工全部被裁，“入职后半年，跟我之前沟通的招聘助理、HR（人力资源）和直系管理层都已经离开了”。

这样的情况在字节内部毫不鲜见，即便最挣钱的抖音也在时刻调整人员。今年初，抖音内部复盘2022年的广告营收，同比增速下降，在得出2023年增速继续放缓的预期后，部分商业化广告团队在缩紧社招的同时出手裁员。

除信息分发外，抖音另一大主干业务电商，2022年实现了近80%的GMV（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长。为继续做大交易规模，抖音电商今年上半年又大动架构，成立了电商A组和B组，一组负责大品牌，一组负责非品牌商家组成的产业带，并缩减原有人员规模，提升招聘门槛。“抖音电商现在只要淘天或京东深耕某个行业数年以上的‘店小二’。”一名熟悉抖音电商的字节人士称。

“快速调整”的用人逻辑也被应用于2B（企业级）业务。字节跳动的云服务平台火山引擎为了快速夺取市场份

额，对销售的考核周期只有6个月，优胜劣汰。最终结果是，人员流动和整体布局、项目周期脱节。“比如某个行业客户年底立项，第二年才能出项目，公司半年就要考核和预期项目结果，这样很难深耕行业。”一名接近火山引擎的人士说。

高速奔跑的字节试图建立企业文化，提出了公司价值观——“追求极致、务实敢为、开放谦逊、坦诚清晰、始终创业、多元兼容”。但到2022年6月，这24字“字节范”价值观被调换了词组顺序，其中“始终创业、多元兼容、坦诚清晰”被提到了最前面。

字节内部一直强调的模糊级别、以“同学”互称的平等风气，正在被“内卷”和工作压力消磨。“午休时间，全是在讨论去什么团队活水（内部转岗）最有前途、哪个组的‘老板’最讲道理。”一名TikTok电商早期员工对财新说，由于上市遥遥无期，每到发年终奖时，字节员工都纠结于选择现金还是期权。

相比之下，拼多多要更“务实”，它的员工也堪称各大厂中最“物化”的人群——“只为挣钱”几乎是整个招聘市场对拼多多员工的一致印象。拼多多内部几乎全员使用花名，同事间匿名；部门间协作主要通过管理人员沟通，普通职员不能直接联系；很多员工从入职到离职都没人知道。“这样的公司文化下，很难真正认识什么人，没有同事概念。”一名拼多多前员工对财新称。

拼多多以这样的企业文化，创造了全网最高“人效”（单位员工创造的收入）。近三年，拼多多员工人数分别增长了1776、2158和3230人，2022年底总数达到12992人。人效比（人均产出）从517万元/人上升至1005万元/人。与之相较，同期阿里的人效比则从548万元/人降至349万元/人。2023年前两个季度，拼多多的营收增速继续保持高位，分别为58%和66%，而同期员工规模并无太大扩张。

超长工作时长和超高工作强度，是拼多多员工的常态。其他互联网大厂纷纷切割被恶评的“996”（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天工作10小时以上，一周工作6天）制度，但拼多多不以为意。一名拼多多内部人士告诉财新，拼多多招聘时会重点考察应聘者的承压能力，并明确告知六天工作制。一名互联网猎头称，入职拼多多要做好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的心理准备；多名拼多多员工也证实，“干这份工作几乎没有生活”。

一名在拼多多早期阶段加入公司的前员工向财新表示，最初认为超长工作时间只是拼多多创业阶段的需要，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个公司的文化就是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导致员工高流动性。“拼多多本身就是一个大筛选机制，把不能适应的人直接筛掉。”上述互联网猎头表示。另一方面，拼多多的“271绩效打分制度”，即将绩效评分标准整体按“271”分配——20%绩效优秀、70%绩效中等、10%绩效差，“1”评分员工将面临裁退。

一名熟悉拼多多的人士认为，与其他互联网公司不同，拼多多并不批量裁员，而是随时“零砍”。“271”打分按月度、半年度和年度进行，打分对象既包括员工也包括部门，部门拿到1的评级，也将面临被砍，或被安排到别的业务线。

“薪资”是拼多多吸引应聘者的主要工具。上述互联网猎头告诉财新，拼多多招人主要靠砸钱。一名以翻倍薪资跳槽进拼多多的员工，不到两年就离职了，甚至放弃了股票。“累到心率过快，保命要紧。”他说。

一名曾在阿里、字节等多家公司任职的人士对财新称，自己认识的互联网从业人员最排斥去拼多多，“感觉去拼多多都是年轻、想赚快钱的”。她最新的选择是小红书，这家公司也是目前市场上为数不多仍在加大招聘的互联网公司。根据脉脉发布的《2023泛互联网行业人才流动报告》，小红书的招聘指数从2021年行业第15名提升到2022年第二名，且在2023年保持第二的位置。招聘指数越靠前，说明用工需求越高。

但很多应聘者接到小红书的offer后会犹豫，因为这家公司的业务线只有三条，而中高层职位又多被占据，因此上升和轮动的空间都小。“小红书称其用户群体中‘90后’的占比70%，更想要更懂年轻人的员工；另一方面，小红书的业务薄，招一些中层或执行层即可。”上述人士分析。

而她在小红书试用期结束前又离职了，“真的很累，病了两周”。目前，小红书执行“大小周”工作制，即不按双休日作息，而是单休、双休双周轮替。另一名小红书商业化部门前员工告诉财新，2021年，小红书从阿里、腾讯、字节、快手等大厂挖了很多人做商业化，“但大家过来之后都非常不习惯，待的时间都不长”。

这名人士还透露，小红书每年招聘30岁以上员工的名额很有限，需要达到一定级别且需要CEO批准才能加入公司。“因为小红书的工作时长很长，需要员工身体好。”他说。

回防主业

仍在高速奔跑的字节跳动、拼多多等新兴大厂，令垂直行业巨头心悸。滴滴、美团和京东等，都在逐步放弃不盈利的新业务和市场，回防加码主营业务，希望稳住地盘。

8月28日，造车新势力小鹏宣布接手滴滴的新能源造车项目——这个内部代号“达芬奇”的项目整体对价仅58亿港元。财新了解到，滴滴年后对“达芬奇”项目已全面收紧投入、团队裁员。滴滴研发新能源汽车逾六年，成果寥寥：2017年，与理想汽车合作研发定制化车型；2020年11月，与比亚迪联合推出D1车型，面向网约车市场，但销量不高。

据交易公告，2021年和2022年，滴滴造车项目分别亏损7.63亿和26.38亿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净资产仅为9.37亿元。一名刚离职滴滴的人士告诉财新，当前汽车市场竞争激烈，滴滴造车一直拿不到生产资质，不得不“断臂求生”。

“滴滴在造车上投入巨大，除了‘达芬奇’，还有自动驾驶和自动驾驶卡车项目。”一名滴滴投资人告诉财新，由于App长时间下架无法拉新，滴滴的市场份额被高德等新兴网约车聚合平台蚕食。滴滴从2022年初开始全线裁员，除了国际业务和自动驾驶业务，裁员率达到20%，社区团购业务橙心优选也被关停。“社区团购是此前为了上市冲单量、讲故事的业务，留下就是负担，停掉是应该的。造车今年的势头也不好，趁现在还有人要赶紧出手。”该投资人说。

滴滴员工规模高点在2021年底，全职员工2.44万名；2022年这一数字减少3526人至2.08万人；到2023年年中，进一步减至不足2万人。



一辆滴滴网约车行驶在杭州市区的道路上。2023年1月，滴滴App恢复上架，持续投入主营业务。

一名在2021年滴滴赴美上市前入职的人士指出，入职后很快发现滴滴高层存在明显的“选边站队”等治理问题，包括“达芬奇”项目负责人杨峻在内的诸多高管，都很难在滴滴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程维与总裁柳青之间保持中立、获取信任。所有的新业务看似由程维带队突破，但人事、财权则在柳青的掌控之下。

2023年1月，滴滴App恢复上架，持续投入主营业务。从最新财报看，二季度滴滴营收成本414亿元，占总收入的84.8%，而2022年同期为260亿元，总收入占比81.2%。滴滴称营收成本占比增加，主要是网约车成本增加，即上架后的拉新等成本。但投入效果也立竿见影，恢复上架两个多月，滴滴平台日均单量就达2820万单；二季度增长到2940万单，6月日均单量突破3000万单。6月22日端午节假期首日，有超40万用户下载滴滴出行App。2023年上半年，滴滴整体营收达到915亿元，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速19%，二季度飙升至53%。二季度，滴滴的净亏损仅为2.67亿元，同比和环比均大幅收窄。

和滴滴一样回归主营业务的还有美团。2022年，美团人员减少8101人至9.2万人。一名美团员工对财新称，去年二季度、四季度分别有一轮整体集中裁员，“重灾区”是“快买优”三个非核心业务——餐厅团购平台快驴、到家生鲜配送美团买菜、社区团购业务优选，美团打车也在上半年终止自营、改为聚合，团队大幅减员。



北京西二旗附近，一辆外卖骑手电动车上同时载有美团和饿了么的送餐箱。

“快买优”在财报中被归入“新业务”，二季度占同期营收四分之一，经营亏损大幅收窄后仍高达51.93亿元。其中，美团优选因补贴增多，收入环比下滑、亏损扩大。相比之下，包含到店到家主业的核心本地商业板块收入大增近四成，经营利润111.39亿元，带动公司整体同比扭亏。

相比其他互联网企业，美团零售气质更重，内部参照美国零售巨头亚马逊的领导力准则，提出“力求正确”“极度关注客户”“节俭”等原则全员推行。用人上格外强调“活水”，更注重实际业务成绩，以此提升人效。“干了七八年的老员工，每两年换一次岗位能避免厌倦。”一名美团员工表示自己也接受了这种“非稳定状态”的文化，“有的部门把原本一年两次的述职改为一次，可能是想省下年中考评的时间，让业务人员少花精力在职能性工作上。”

面对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全面杀入本地生活市场，美团全力回归到店和外卖主业打防守战。2022年底，抖音成立近两年的生活服务部门被升格为一级部门，2023年1月到8月，其支付GMV超1700亿元，月度增速在10%左右。有了字节“打样”，快手、小红书、微信等玩家也加速推进本地生活业务。快手今年9月也将本地生活业务设为一级部门，年内团队规模扩容超过两成。微信在年初入局外卖，5月视频号上线本地生活组件，直播售卖餐饮团购券。

“本地生活的竞争就是销售的竞争。”一名合作过多家平台的本地生活服务商对财新称，美团今年扩充直营团队以留住商家。地推（BD）能力强是美团众所周知的优势。多名受访人士指出，美团的BD团队长期规模达数万人，部分城市地推员工占比近半。

美团告诉财新，今年外卖、到店、酒旅等业务均加大了对前线业务人员的招募力度，2023年第一拨社招中客服、销售类岗位需求占七成。据财新了解，美团去年底对比往年更多的下沉市场收回代理权，把当地BD从外包转为直营，这在普遍采取代理模式的同行中颇为异类。

不过，快手、小红书、抖音等外包BD的效果确实远不及美团。5月，抖音生活服务的下单GMV环比下滑，原因在于酒旅BD与供应商谈判按期日预订、锁定供给的“日历房”分身乏术，高星酒店拓展业绩大幅不达标。一名零售业人士认为，新平台在扩充直营销售队伍上的顾虑，部分缘于互联网平台管控不好低端销售岗位的腐败风险；而美团已搭建起颗粒度很高的对终端地推的分级管理体系。

一名抖音服务商人士告诉财新，目前抖音正以1.5倍的平均薪酬从美团挖管理服务商的渠道经理。“美团网格化管理地推的方法论，最初也是由阿甘（花名）从阿里带过来的，自然也能复制到别的平台。”一名美团员工认为。

另一个砍掉亏损业务、回归电商和物流主营业务的公司是京东。除去快递人员，京东线上业务人员经历了“扩张—收缩—再扩张”的过程，从2020年底的5.6万人增加到2021年底的6.9万人后，又回落至2022年底的6.1万人——数字波动的背后，是京东对社区团购业务及国际业务的扩张与收缩。社区团购业务京喜拼拼试水仅半年，2021年年中起便迅速退出多个省份；2021年以来，京东在国际业务上密集落子，但2023年1月关闭了东南亚电商业务，只保留海外仓储业务。

2023年上半年，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回归全面接管业务，期内物流板块以外的员工合计增加约5000人，京东降本增效的主要手段是降薪而非裁员。刘强东在2022年四季度宣布，集团自2023年起，9级以上全部高级管理人员现金薪酬降低10%—20%不等，职位越高降得越多。另一方面，一名接近京东的人士透露，京东今年设置了员工薪资涨幅线，最多上涨10%—15%，不过AI大模型人才有可能涨到30%。（详见本刊2023年第32期《京东突围》）

另一边，京东校招大幅缩水，2022年号称招聘2万应届生，但2023年秋招释放的校招名额只有8000个。一名京东科技前员工称，在京东内部，老员工很少带应届生，独自背绩效的应届生前期上手慢、无法迅速拿出成果，基本绩效打分都不高，而根据内部不成文的规定，绩效垫底累计3次就面临被裁：“2021年下半年至2022年上半年，京东裁了不少应届生。”

“零工”潮汐震荡

疫情三年，京东的员工人数增加超过1倍，主要增量来自快递小哥。截至2023年年中，京东物流员工约43.2万，其中包括仓储、分拣、配送、客服等一线运营人员占比95.2%，较2020年底的25.87万人增加了17.33万人。一名京东集团人士表示，京东物流员工增长，主要是因为向下沉市场渗透、站点增加与扩招；此外，2022年并购德邦物流，也让京东增加了超过6万名员工。

京东一直坚持为包括一线运营人员在内的物流员工缴纳五险一金等社保福利，新收购的德邦物流也自2023年起逐步缴齐，其中还包括德邦外包员工。

一名京东内部员工称，给一线运营人员交社保的初衷源于公司创始人刘强东的个人情怀，“他在内部一直强调在这个上面省钱是可耻的”。不过，一名对冲基金人士认为，为一线运营人员交社保、解决就业，符合国家政策大方向，京东此举的确博到了“名”；但从市场角度理解，京东最初这么做是为保障服务质量，以建立竞争壁垒，而到后面服务性壁垒效用不高，但公司很难掉头不做。

京东物流变得越来越重，这种“重成本模式”影响了一些投资者对其盈利能力的信心。摩根士丹利就在一份研报中指出，京东物流的商业模式缺乏结构性优势，面临其他供应链管理同行和物流供应商的激烈竞争。而在全球范围内，供应链管理都是一项低利润和周期性的业务。2023年上半年，京东物流的营业成本同比增加32.3%至727亿元，毛利率为6.5%。其中一线运营人员的员工薪酬福利开支为260亿元，同比增加26.1%。



对物流、本地生活等互联网平台的劳务业者如何管理，始终是政策与市场博弈的难点。这部分人员规模庞大，社会覆盖面广，动辄牵涉社会舆情与稳定。他们被归入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员"，或被新近政策文件称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增长乏力，就业市场紧缩，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在2023年都在加速扩容。

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截至8月末，全国网约车司机数量增长到605.9万人，同比增加28.53%。今年以来，每月平均增加超过12万人；但8月出行市场订单量为8.24亿单，只同比上升了17.21%。美团和饿了么的骑手规模，目前合计已超千万人。据美团配送发布的报告，2022年有624万骑手通过美团获得收入；而饿了么2019年已有380多万骑手，去年平台稳定的骑手是114万人。

随着供给急剧增多，部分城市对外卖、骑手等劳务人员的需求已趋饱和。今年以来，三亚、长沙、上海等城市暂停网约车运输证办理，还有多个城市发布市场饱和预警，或对网约车运营加强检查。

供求失衡之下，平台竞争加剧，司机、骑手收入减少。一些网约车平台在派单中向拼车、一口价倾斜。"工作五年，一年比一年钱少。"一名一线城市的饿了么骑手对财新称，配送费的时段补贴从0.5元降至0.2元，以前每天收入曾超过1000元，现在只能赚到300多元。一名达达配送骑手也称，自己的单日收入在300元左右，"主要是干活的人多了，超过了订单增加的速度"。

不过，有外卖平台对财新进一步透露，全国范围内，过去一年新注册骑手大约为200万，其中65%为兼职。整体而言，外卖平台稳定的注册骑手基本不超过400万的规模，这意味着同时还有大量骑手离职。零工经济给紧缩的就业市场提供了"蓄水池"。但劳务供给侧像潮汐般动荡，超大流动性导致互联网平台的人效提升困难。此外，骑手地区间分布不均，供求错配。一名美团外卖加盟商对财新表示，缺乏经验的新骑手工作效率偏低，导致北京部分区域运力供应不足，"再来500个骑手，也能立刻消化掉"。

灵活就业群体的合规问题一直是监管关注重点，也多次引发社会的大范围讨论与关注。

4月26日，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做好网约车聚合平台规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聚合平台既要落实其对相关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核验责任，也要承担对驾驶员和乘客的责任。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聚合平台上聚集了提供出租汽车服务的个人和公司，对网约车驾驶员证和网约车运输证很难完全掌握。

一名滴滴司机告诉财新，自己被公司裁员，在找到下一份工作前，先开网约车过渡。很多像他这样的网约车司机并不申请相关证件或资质。“申请了营运证，运营网约车的年限就只有8年。很多人都是租车开网约车，不会去办证。”

对外卖骑手的争议则更多聚焦于薪资保障。9月初，临沂大学文学院教授邢斌体验骑手生活的文章爆火，再度引发社会对骑手生存情况的关注。当前多数骑手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即使有意外险或医疗险等商业保险，也是跑单才有的模式——比如有的是每天跑第一单时扣款2.5—3元，不跑单不扣；而骑手多为大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出于短期利益，他们普遍宁可将社保变成到手的现钱。

“政府监管部门鼓励平台为骑手提供商业保险，但并未强制，强制执行的试点区域会有新职业伤害保险。”一家外卖平台内部人士指出。

2021年7月以来，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多份文件希望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提供保障。其中，《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提出，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平台企业为重点，组织开展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试点实践即采取按单缴费方式，但保费应由就业人员所在平台承担，对就业人员免费。

9月4日，人社部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自2022年7月1日试点以来，在七个省市覆盖615万人，平台包括曹操出行、美团、饿了么、达达、闪送、货拉拉、快狗打车七家企业。

人才新方向

全球范围内，科技互联网公司都开始了新一轮洗牌。根据领英人才大数据，截至2023年10月10日，领英全球会员中互联网行业从业总人数超881万，但近一年人才呈负增长（-0.3%）。经历数轮硅谷裁员的美国市场人才减少1.6%，印度市场则增加1.3%，中国市场在一轮轮优化中更多体现了人才的结构性调整，就业规模并未改变。但就招聘市场而言，中国显示出较低的需求量。

今年以来，与业务结构调整同步，互联网行业对人力资源最大的调增方向是海外和AI两大板块。

阿里集团一拆六后，包含国际电商业务的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AIDC）收入增速达到41%，领跑阿里其他业务线。用工需求也转向海外，目前阿里在东南亚、欧美地区都有几百到千人不等的招聘计划。

字节跳动旗下海外短视频平台TikTok，其电商业务上半年在东南亚实现90亿美元GMV，9月初在北美打通交易闭环。业务进展旋即带来架构重组。伴随着在海外多地形成自己的方法论，7月底，TikTok砍掉此前推进抖音电商经验复用海外的中台辅助部门，相关人员转到海外本地化团队。领英提供的数据显示，TikTok在美国和英国市场都进入热门雇主的前三名。

不过，TikTok在东南亚第一大市场印尼的电商业务遭遇政策突变。10月4日，因印尼政府通过新法规限制社交媒体平台的电商交易，导致TikTok无奈关停印尼TikTok Shop，放弃在自有平台闭环电商交易。“出海”业务蕴藏的各种地缘政治经济风险，也意味着人力资本投入的巨大不确定性。

2022年9月，拼多多在美国上线跨境电商平台Temu，迅速在全球扩张，目前已进入47个国家，Temu也成为继多多买菜之后，拼多多内部员工“活水”的主要去向。“去年很多员工从主站转到Temu。”上述拼多多内部人士告诉财新。2023年5月，面临海外监管压力的Temu推进与拼多多的拆分，国内外IM（内部办公）系统已完全切割，办公室也分开。如果Temu有需要，主站又有能满足需求的人，还可以继续转岗。“不过按多多买菜的经验，业务稳定后，Temu会独立招人。”这名拼多多人士称。

“新业务钱多、发展更好，但也更辛苦。”他指出。目前Temu团队工作压力比拼多多还大，经常要凌晨一两点下班，一名TikTok前员工告诉财新，身边很多人拿到Temu的offer后不敢前往。一名入驻Temu的商家也告诉财新：“Temu买手半夜三更还在干活，半年换了一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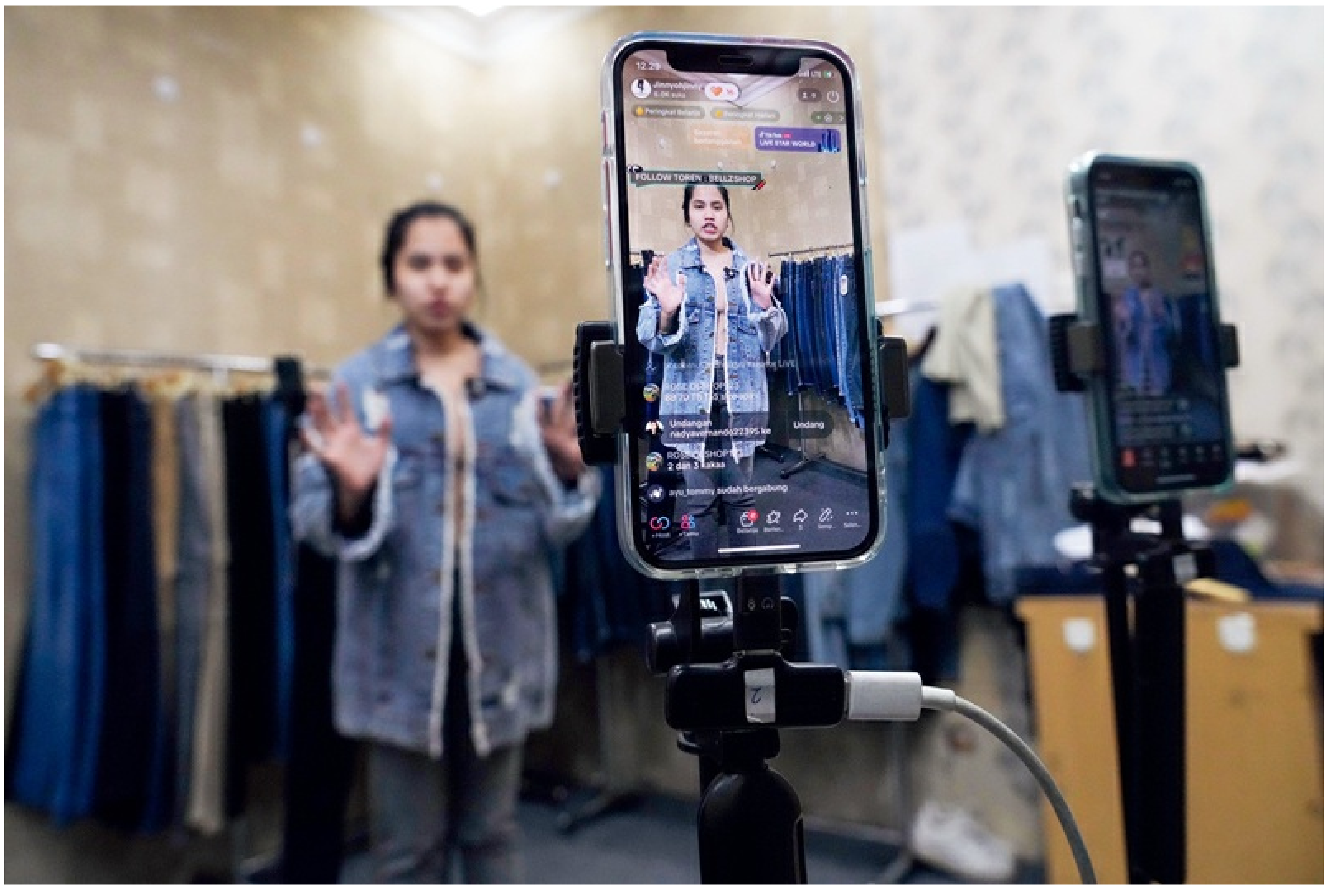
滴滴也在关闭了俄罗斯和南非两个市场后，在南美实现了业务增长。2023年二季度财报中，滴滴国际业务单量6.26亿，同比增长35.2%，GTV（总交易额）164亿元，同比增长34.9%。在增长最快的拉美市场，巴西滴滴旗下巴西出行99平台目前用户超2000万，司机近百万。在墨西哥，滴滴覆盖了70多个城市，拥有超过1000万活跃用户，是墨西哥最受欢迎的出行平台之一。据Measurable AI 2022年8月的报告，滴滴在墨西哥的市场份额达到56%，排名第一。

“出海”之外，直播内容和AI是互联网另两大用工方向。8月，阿里启动2024届校园招聘，旗下各集团公司都将技术类岗位作为今年校招的重点。一名阿里大文娱员工表示，附近工位都是新招的AI方向的年轻同事；淘天集团则称，技术类岗位占比超过50%，人工智能类岗位增多。

淘天集团还表示，将以远超之前的投入推进全面内容化，因此，运营、产品类岗位也相应大幅增加，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甚至“00后”都能加入进来。郑楠也表示，能看到淘天在短视频、直播等内容上发力，今年增加了招聘。

在内容侧发力的还有美团。郑楠称，2013年美团刚开始孵化直播，团队人数不多，今年加速扩招运营等岗位，也为直播业务新招了地推拓展团队。一名美团零售业务员工称：“今年各条零售业务线都在引入活水，9月中旬，短视频产品等岗位还特意发了面向全员的活水需求。”

“年初，剪映（抖音官方剪辑工具）团队还在裁员，年中互联网大厂都在发力AIGC，剪映又开始拼命从竞对挖人，我和朋友们都收到过投递邀约。”一名AI“独角兽”公司产品经理告诉财新。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4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Tanah Abang纺织品市场， 卖家在商店里通过直播销售商品。10月4日，因印尼政府通过新法规限制社交媒体平台的电商交易，TikTok关停印尼TikTok Shop。

2023年4月，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AIDC）设立AI Business业务部门，专注于AI技术能力建设和AI产品能力输出。在最新的社招中，AI商业化部门开放对话智能算法研发、机器翻译算法工程师、大模型推理计算专家、AI场景运营等10类岗位。

上述京东集团人士告诉财新，相对往年，京东今年校招也多了一些AI训练师、碳中和规划师等新职位。

近期，字节跳动的机器学习平台和负责AI、特效和音视频创作技术和业务中台都释放了社招和校招岗位。字节产品众多、架构庞大，由中台输出AI技术能力，但一名字节智能创作团队员工告诉财新：“技术中台并没有自己的产品，想去落地一个功能，中间涉及多个沟通层级，对前端产品线的参与度其实很低，也就做一些技术优化和对接。”

腾讯发布混元大模型后，也放出大模型应用算法工程师、AIGC高级算法研究员、大模型安全高级工程师等多个技术岗位。腾讯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汇集了资讯、视频和浏览器、输入法等业务和产品，校招和社招都专设了AIGC方向的岗位。

不过，无论海外还是AI，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在这两大领域的人才储备仍远远不够，原因在于这是全新的方向、长期的挑战。

赵丹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李东昊

最新财新周刊｜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半边天”的女侦探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戈尔丁发现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关键驱动因素，为改变现状提供了事实基础，其研究对全球女性和政策制定者都有指导意义



当地时间10月9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照片显示在大屏幕上。

文丨财新周刊 王力为

在过去一两个世纪，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提高，但在各国，职场性别歧视都是热门话题。劳动市场中的女性为何越来越多？什么原因导致了男女工资差距？怎样才能消除这种差距？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

北京时间2023年10月9日傍晚，因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继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2019年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之后第三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女性，同时她也是首位独享这一经济学最高荣誉的女性，将获得11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较2022年增加100万瑞典克朗。此前2018—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均为三位或两位得主分享。

生于1946年的克劳迪娅·戈尔丁，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戈尔丁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史、劳动经济学、性别经济学等领域。她关于女性追求事业的历史、避孕药对女性职业和婚姻决策的影响等研究，在经济学界广为人所知。

2020年，由于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尤其对女性就业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分析，戈尔丁获得经济学领域年度“引文桂冠奖”，这一奖项被视为诺奖风向标。此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称，戈尔丁“发现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关键驱动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历史以及当代角色全新的、常常是令人惊讶的洞见”。

同样从事劳动经济学和性别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倩，与戈尔丁多有交往。在颁奖次日的直播中，刘倩表示，戈尔丁在性别平等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全球最高的荣耀，是女性在追求性别平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这一角度上来讲，她的获奖比此前两位女性获奖更有意义。

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的李华芳看来，戈尔丁的贡献，一方面是提供了统一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在于夯实数据质量，将经济理论与史实结合，回应了那些显而易见但又让人困惑的事实，包括都说“女性顶半边天”，但为什么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

戈尔丁曾写过一篇题为《作为侦探的经济学家》的文章，她回忆称，小时候曾梦想成为一名细菌学家，通过显微镜做侦探工作，不过最终成为了挖掘档案和大量数据的侦探。“对侦探来说，最重要的是你面临一个谜题，它非常重要，以至于你会为之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找到答案。”

戈尔丁的研究往往结合大量的经济史数据，并探索当前关注问题的根源。在一系列研究中，戈尔丁逐渐勾勒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过去百年间，由于技术发展、工作性质变化，女性劳动参与率逐渐提高，选择也逐渐增多，从最初的成家和立业只能二选一，到先工作再成家，再到先成家后工作，最后逐渐可以事业与家庭兼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今女性对事业的追求明显增强，但女性在职场中频频遭遇性别歧视：已婚未育女性求职难、同工不同酬、晋升机会少等情况频频出现，一些女性为了事业选择减少生育，加之养育成本提升，生育率低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些女性放弃了生育孩子，其罪魁祸首不仅在于就业歧视，引发事业和家庭相互权衡的另一个原因与工作日益变得‘贪婪’（greedy）密不可分。”戈尔丁发现，在工作中，男女收入差距并非是因为职业不同，更多存在于同一职业内部，愿意“996”（意指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并愿意牺牲休息日加班）的员工往往获得更高的报酬，而传统观念中女性被设定为更顾家，导致她们很难获得“贪婪回报”。

戈尔丁的诸多研究凝结为2021年出版的《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一书。在该书的中文版序中，她写道：“本书所传达的主题思想，既适用于美国女性，也适用于中国女性。”

她提出，实现性别公平，既需要职场性别平等，也需要家庭夫妻公平。技术层面，信息系统的使用、灵活居家办公都提供了改善的可能；制度层面，完善托育体系、重视发展护理行业也必不可少；观念层面，需要消除夫妻分工的不平等。戈尔丁尤为强调矫正工作制度，加强团队协作、提高员工间可替代性，减少“贪婪工作”（greedy job）。

女性就业百年变迁

戈尔丁的求学和职业生涯辗转于多所名校：1967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明尼苏达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

戈尔丁最初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史，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奴隶制在南北战争前南方城市和工业发展中的角色。在研究美国南方经济史的过程中，她涉足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日益壮大的定量社会历史和家庭经济学。到1980年左右，她意识到历史资料中忽视了经历最深刻变革的家庭成员——妻子和母亲。此后，戈尔丁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女性劳动力演变。

经过对诸多资料的梳理，戈尔丁发现，不同时代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和表现是不同的。她按照出生时间，将出生于1878—1978年这100年间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分为五组，每组时间跨度在20年左右。对出生于1878—1897年、在1900—1920年毕业的女性而言，成家和立业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出生于1898—1923年、在1920—1945年毕业的女大学生，多选择短暂工作，很快组建家庭，然后退出就业市场；出生于1924—1943年、在1956—1965年大学毕业的女性则相反，往往结婚很早，在子女长大后会重返就业市场；出生于1944—1957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毕业的女性，比此前的女性更重视职业发展，结婚年龄明显推迟，离婚的概率也提高，可以概括为“先立业后成家”；出生于1958—1978年、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的女性则汲取了第四组女性过于重视事业而错失家庭的教训，更好地兼顾了事业和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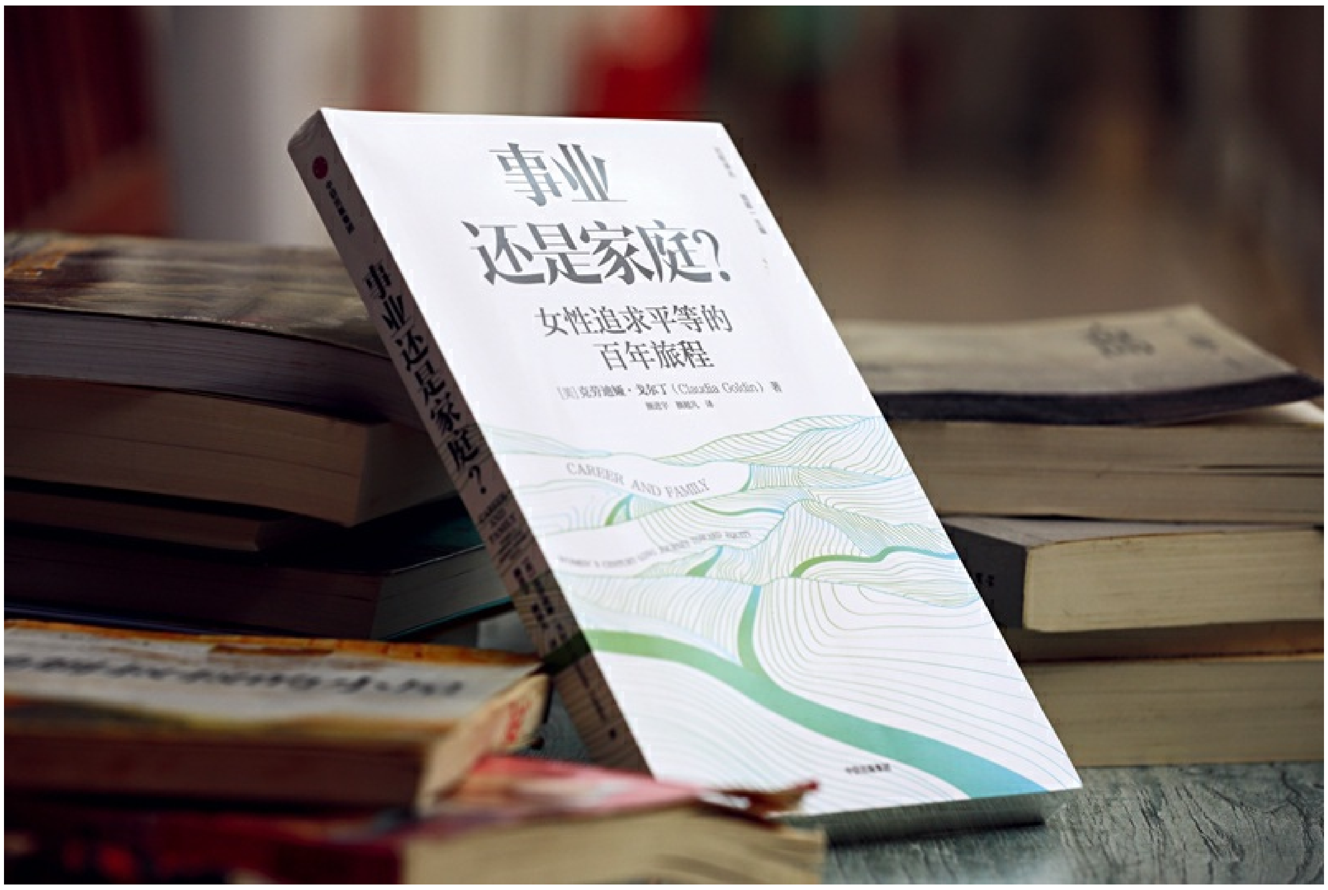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不同时代的女性在事业与家庭的选择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在戈尔丁1990年出版开创性著作《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的经济史》之前，研究者通常认为，经济增长与女性就业人数明显成正相关。

戈尔丁则发现，劳动参与率并不必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而是呈U形。在最贫穷的国家，成年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作岗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很难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这使得女性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更多回归照顾家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生育率下降、孩子变少、儿童看护机构更充裕、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参与率又会提高。虽然“二战”一度带来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但“二战”结束后，这些女性就很快回归了家庭。

经济发展无法解释劳动参与率的提高，那么是什么影响了女性的劳动参与度？戈尔丁的答案是技术。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技术变革改变了工作的性质，电力机械、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工作对体力的需求下降，洗衣机等家电的发明让女性从琐碎的家务当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避孕药的出现和使用合法化作用不容小觑。

她利用美国不同州和不同年份出生的女性受到避孕药合法化政策的影响所做的定量分析发现，1970年进入大学的女性，由于当时避孕药使用的要求还较为严格，因此她们中的一半在23岁前已经结婚；而1980年进入大学的女性，由于避孕药已经合法化，在23岁前结婚的比例下降到了三分之一左右。使用避孕药降低了女毕业生早婚的可能，提高选择成为职业女性的比例，整体降低了离婚率，并提升了婚姻质量。《经济学人》日后将避孕药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进步，认为其对人类的贡献超过相对论和核反应堆，对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变革。



戈尔丁所著《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文版。

除了技术，戈尔丁还认为，制度和法律也是影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20世纪40年代，美国很多州出于保护女性权益的考虑，出台了对女性最长劳动时间的限制。戈尔丁用数据证明，这种规定看似维护了女性的利益，但从长期看，对女性职业发展不利。因为这种安排固化了女性在就业市场的弱势地位，减少了她们参与“贪婪工作”的机会。

性别歧视何来

尽管过去百年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提高，但在戈尔丁看来，这一数据并未体现女性工作时间，也没有告诉我们女性工作的种类。她认为，关注性别工资差距更重要。尽管不少人注意到职场性别歧视现象，但如何度量？

在戈尔丁之前，也有经济学家关注这一现象，并提出定量分析的方法，而戈尔丁的研究更加直观。

在与同为经济学家的丈夫卡茨（Lawrence Katz）合作的一篇论文中，两人研究了一项有意思的职业招聘场景：20世纪80年代，美国交响乐团开始采用类似《中国好声音》式的盲选方式，在面试时拉上幕布，仅根据听到的演奏来招聘。通过对是否采用以及采用这一方式后女性招聘数量变化的定量分析，他们发现盲选后女性的最终录取率提高了60%。这段时期，全美交响乐团中的女性比例上升了约四分之一，而增量中的三分之一可以由“盲演”制度的普及来解释。

评委会指出，尽管许多国家已制定了同工同酬立法，而且女性往往比男性受教育程度更高，但高收入国家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约为10%到20%。

对性别工资差距，知名劳动经济学家雅各布·明瑟（Jacob Mincer）曾归因于“职业隔离”，认为女性和男性都在自我选择或被迫投身某些带性别偏向的职业（如护士与医生、教工与教授），而这些职业的报酬恰巧不同。

但基于美国人口普查涵盖的近500种职业的数据，戈尔丁发现，三分之二的性别收入差异源于各职业内部的因素。即便女性从事的职业遵循男性的分布，比如女性做医生，男性做护士，最多也就能消除三分之一的收入差距。

戈尔丁与卡茨等三位经济学家设计了一项针对MBA（工商管理硕士）的研究，运用纵向数据追踪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1990—2006年男女MBA毕业生的职业生涯。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他们发现，在MBA学员毕业并接受第一份工作后，女性的收入达到男性的95%。然而到第13年，这一比率降至仅为64%。变化通常始于孩子出生后，与孩子出生伴随而来的照护责任，让女性MBA相对男性工作经验减少、职业中断更久。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9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戈尔丁在哈佛大学接受媒体采访。

“此后其他国家的研究也证实了戈尔丁的结论。”评委会指出，“为人父母几乎完全解释了高收入国家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异。”

在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配合与资助下，戈尔丁还设计并完成了一项名为“哈佛及以后”的调查项目，针对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哈佛大学毕业生，研究与就业中断有关的职业“惩罚”（即薪资削减）。

研究发现，休假造成的年收入惩罚随学位而异，且差别较大。自获得学士学位15年后，医学博士的收入惩罚最低，MBA的惩罚最高，法学博士介于两者之间。MBA的惩罚是医学博士的1.4倍，法学博士的惩罚是医学博士的1.2倍。

什么导致了职业中断和工作时间减少在不同职业中如此显著的差异？戈尔丁用“贪婪工作”来描述法律、金融、咨询这些行业的工作，因为与高收入相伴的往往是长时间、需时刻待命的工作，而且工作时间越长，薪酬的上升幅度越大，而且是非线性的，比如工作15年后，每周工作60小时的律师平均收入，是每周工作30小时的2.5倍以上。随时回应客户或老板的要求，通常需要牺牲掉出席家长会、照顾孩子生病等时间。许多家庭的理性选择是，一人从事高薪工作，另一人从事灵活工作，在兼顾家庭的同时最大化家庭收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现实中大量女性转向时间更可控、更灵活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明显加剧恶化了这一趋势，因为这让“贪婪工作”的价值大幅飙升。“大学毕业生开启收割模式，男性大学毕业生是最大的赢家。”戈尔丁认为，过去数十年里最挣钱的工作，恰恰成了对女性来说最难进入的工作，向高层晋升更是难上加难。

这也导致类似的变化出现在新冠疫情后。戈尔丁在《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在新冠时期和后新冠兼新冠混合时代，样本家庭的女性花在照顾孩子及其远程教育上的总时间大约是前新冠时代的1.7倍。紧随新冠疫情而来的经济灾难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而经济衰退本来不致如此。女性的工作主要在服务行业，一直免受离岸外包、贸易冲击和自动化的影响。可如今，酒店业、旅游业、个人服务业、餐饮业、零售业的服务岗位均遭到沉重打击。

戈尔丁与卡茨的研究还溯及20世纪美国经济增长与不平等状况的演变。在前70多年中，伴随着经济增长，不平等出现下降；在后20多年中，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平等却出现了上升。

戈尔丁用“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做出解释，在20世纪前期，增长会削减不平等，是教育的普及足以赶上技术增长的步伐，让多数人从新技术中受益；而在20世纪后期，与增长同时出现的不平等上升则是由于教育没能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使得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从技术的发展中受益。

如何降低职场性别歧视

在宣布戈尔丁获奖的发布会上，评委会成员、性别经济学领域专家Randi Hjalmarsson在被问及戈尔丁提出的解决之道时特别指出："戈尔丁并不专门研究政策，而是描述问题和变化。理解其根源，是我们做出改变的第一步。"

戈尔丁认为，专业人员之间可替代性高，工作时间可控，是降低长时间和随叫随到的"贪婪工作"过高时薪的关键。

这在药剂师、兽医身上得到验证。20世纪中叶，药剂师曾需要在深夜被叫醒，为熟悉的病人开紧急处方，但随着药品标准化、信息技术的引入和企业部门崛起，不再需要紧急配方。CVS等大型连锁店的出现，也为药剂师提供了新的工作场所。如今药剂师工资与工作时间接近线性关系，女药剂师的收入中位数是男药剂师的94%，是少数没有显著兼职惩罚的职业之一，相对于律师和金融家，女药剂师鲜少出现职业中断。

类似的情况也常出现在兽医行业领域。由于引入周末和晚上轮流代班制度，兽医的工作时间变得可控，也成为性别平等方面的典范职业。

在银行业和金融部门，变化也开始发生。近年一些大型银行不再为高净值客户提供私人理财顾问，而是启动私人银行家团队。

值得注意的是，男女双方在"996"式的工作环境下都有牺牲，"女性牺牲了事业，男性牺牲了包括与孩子在内的亲情"。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半数父亲表示他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太少，"许多年长男性非常享受当祖父的时光，就是因为错过了陪伴自己子女蹒跚学步的岁月。"

新冠疫情导致许多家长被迫居家工作，这让人们发现居家办公有望降低灵活工作的成本，让灵活工作成为更多人的可选项。同时疫情促使人们更迫切地思考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权衡取舍，重新审视"996"及"贪婪工作"。

"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戈尔丁称，让男性参与照顾孩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鼓励男同事们休育婴假，投票支持补贴儿童保育的公共政策，让公司改变贪婪的工作方式，使公司明白家庭比工作更有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需要有所作为，比如增强托育服务、发展护理部门，减少照顾孩子、老人的成本，让女性更多地从家庭中解脱出来。

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是包括中国在内不少国家面临的挑战，一些研究者开出的药方是鼓励生育，用更多出生人口来对冲老龄化。戈尔丁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她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采访时称，靠提高生育率来迅速解决老龄化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抚养比的上升速度会快过老龄化降低的速度，只会让女性被更多地束缚在家庭中，从而让劳动力市场上的男女不平等表现得更厉害。

她更倾向于消除男女在退休年龄的差异。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完全有能力并且有意愿工作更长的时间，但退休制度却限制了她们。如果可以放开对劳动力市场上这"半边天"的退休限制，老龄化问题将可能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刘倩在直播中回忆起她与戈尔丁的多次交流，一个重点就是分享讨论这一领域的其他研究，比如瑞典经济学家关于男性和女性在职业成功后婚姻状况变化的研究等。

戈尔丁的研究也启发了中国学者。刘倩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张晓波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要提高生育率，除了要探讨直接成本以及与之相关的奶粉价格、教育费用、房地产支出等，更需要关注间接和不确定性成本。

他们研究称，仅由于女性要放弃的职业机会，就相当于57万元的生育惩罚，这一数字比《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计算的直接成本48.8万元还要高。此外，还有其他的后顾之忧，包括丧偶式带娃带来的职场、家庭双重压力，离婚率上升导致的单亲风险，法律和权益保障不完善等综合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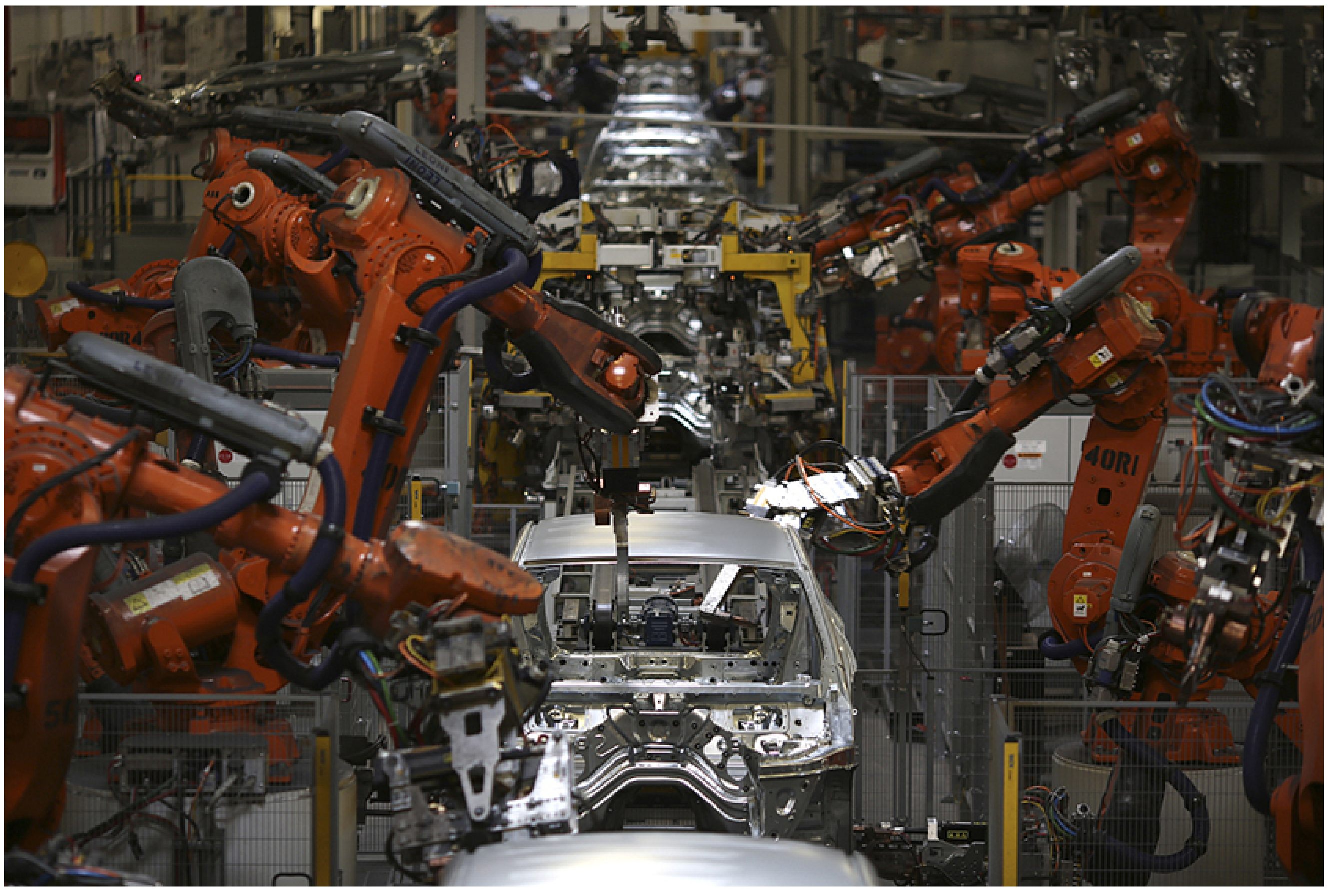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聚焦2023年诺贝尔奖]

版面编辑：李东昊

专栏丨产业政策回潮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即使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经济理由，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意见仍然存在，如何确保产业政策能够针对正确的行业？



资料图：美国，宝马汽车生产组装工厂。图：视觉中国

文丨巴里·艾肯格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

产业政策正在回潮。过去几十年来，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认知和政策都是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最小化，但近年来出台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都包含了重要的产业政策内容。

这一倾向不仅出现在美国。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措施，以保护和加强本国工业基础。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受到欢迎？

产业政策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美国，可以追溯到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向国会做的关于发展美国制造工业的报告；在欧洲，17世纪60年代，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通过产业政策提升了法国工业和贸易能力。但到20世纪末，产业政策已经被各国抛弃，市场经济模式没有为政府有选择地干预、促进特定地区发展特定产业提供任何理由，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一些观察显示，税收和关税减免为寻租提供空间，导致资源浪费，补贴了效率低下的生产者。

然而，最近一些学术研究正在重新审视这些观点。新的理论为产业政策推动工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认为仅靠市场的自发作用，无法实现配套产业的协调发展，若没有配套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并不可行。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暂时性保护可以使幼稚产业站稳脚跟的理解，表明即使在设计良好的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平衡好激励创新与技术传播关系的情况下，新技术开发者也可能无法获得所有回报。

在实证方面，最近的经济史研究为产业政策在19世纪促进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叙述。严谨的研究发现，在美国联邦拨款取消后，地方机构比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推出政策，继续鼓励受影响地区增加制造业就业。另一项研究展示了“二战”时期美国国防投资如何带动地区就业永久性增加和高薪酬制造业的持续扩张。还有研究追踪了20世纪70年代韩国针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产业政策，促进了目标行业及供应商的发展和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升，即使在项目结束后仍在发挥作用。

这些研究既有美国案例，也有其他国家的实践。市场自发的力量不会让所有人同等受益这一基本经济学常识，在一定时期内被遗忘了。美国将经济发展的控制权交给市场，阿巴拉契亚等地区贫困集中，人口持续减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政治精英允许这些情况持续存在，现在遭到民粹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即使出于继续执政的考虑，他们也有理由选择政府更多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

国际层面，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让后者更有理由选择“在岸化”，将一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迁回本国。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法中早有自由贸易国家安全例外规则。

即使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经济理由，比如可以驱动工业发展、减轻贫困和满足国家安全需要，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意见仍然存在：寻租现象普遍存在，哪些部门和企业会因公共资金投入而提高效率尚不确定，哪些行业应该获得国家安全例外也很有争议。换言之，如何确保产业政策能够针对正确的行业？

关于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研究，需要辅之以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能否借鉴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模式，将补贴哪个行业、企业的决定权委托给一个独立委员会？如果像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那样，授权给企业界或学术界支持的项目负责人，那么如何选择负责人？怎样才能确保其与受资助者充分协商，并密切监测受资助者的行为？

政治竞选策略师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有句名言：“It's the economy，stupid。”（这是经济问题，笨蛋。）这句话对赢得总统大选可能很有用，但讨论成功的产业政策则是个政治问题。

版面编辑：李东昊

最新财新周刊｜mRNA技术明星企业跌落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作为新冠最大技术遗产的mRNA疫苗，在国内的研发上市之路几经坎坷，前景几何？

文丨财新周刊 赵今朝

在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两位mRNA疫苗研究者的辉煌时刻，国内mRNA疫苗企业斯微生物创始人李航文却处于舆论漩涡之中。9月15日，斯微生物及李航文本人被限制高消费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之间，业界哗然，曾经的明星企业从神坛重重跌落。

面对此后铺天盖地的质疑，斯微生物一直保持缄默。国庆节期间，李航文陪家人看了一遍《奥本海默》。这部讲述"原子弹之父"胜利和悲剧的电影让他心生感慨：奥本海默确实为原子弹研发立下汗马功劳，但也遭到很多人非议，最终（世界）给了他客观的评价。

10月8日，李航文接受财新采访时说："我要向奥本海默学习，还是要把mRNA事业给坚持下去。"此时，他回国创办的斯微生物已暂停旗下一家工厂的运行，大幅度缩小人员规模，由于拖欠货款等原因被多家供应商起诉。李航文自身也成为同行业和媒体眼中的争议人物。

斯微生物成立于2016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mRNA技术平台企业之一，也是疫情开始后最早投入新冠疫苗研发的企业之一。

这家原本从事个性化肿瘤疫苗研发的企业在疫情暴发后，快速扎入新冠疫苗赛道，一度受到资方"热捧"，而后研发过程历经数次波折：2020年6月，西藏药业与斯微生物曾就包括新冠疫苗在内的多款传染病疫苗达成全球独家战略合作关系，但合作在2021年8月生变。这项合作中涵盖的新冠疫苗，也是斯微生物第一款进入临床试验的新冠mRNA疫苗，在研发中途被放弃，斯微生物转而推进迭代产品，最终在老挝获批。

与海外大放异彩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国内mRNA新冠疫苗的结局不如人意——目前仅石药集团一家的mRNA疫苗于2023年3月在中国获得紧急使用授权，5月开展接种。然而，国内首款mRNA疫苗获批之时，民众接种需求已大幅滑落。有疫苗企业人士坦言，从融资角度，新冠疫苗的故事如今已无人问津。

开展海外临床研究、打通供应链上下游、建设20亿剂原液产能，虽已砸下真金白银，但斯微生物至今仍未拿到国内新冠疫苗市场的"入场券"。

"虚火"之后，危局就在眼前。危机何来？如何纾困？

新冠"虚火"

周文（化名）是斯微生物原材料的供应商之一，比外界更早一步察觉斯微生物已深陷困局。去年下半年，他前后向斯微生物供应了累计价值80万元的试剂和耗材。截至今年9月中旬，斯微生物仍拖欠40余万元。

周文与斯微生物达成合作是在2021年12月。这一年，随着海外mRNA疫苗获批、接种后效果初显，国内以斯微生物为代表的mRNA疫苗企业风光无限。在2021年3月宣布新冠mRNA疫苗进入一期临床仅仅三个月后，斯微生物完成近2亿美元新一轮融资。这轮融资由招商健康、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景林投资、药明康德共同领投，奥博资本、尚珹投资、中信证券投资等医疗健康投资机构跟投。艾博生物在2021年8月和11月分别获得了7.2亿美元的C轮融资和3亿美元的C+轮融资，合计超过70亿元人民币。

"当时这一类（新冠mRNA疫苗研发）企业的估值，可以达到它们正常估值的2—4倍。"一名行业分析师曾向财新表示。据李航文回忆，当时国内、国际很多投资人找他沟通。

周文提到，最初，公司放心地与斯微生物合作，并愿意冒着风险供应大批产品，就是看到斯微生物有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坐镇董事会，且受近30家投资机构押注，"要资源有资源，要钱有钱"。今年5月19日，斯微生物发生主要人员变更：红杉资本杜磊代替沈南鹏出任董事。对此，李航文解释，红杉中国没有退出，董事变更与红杉中国内部调整有关。

短短两年过去，这家明星企业的光环逐渐黯淡。周文注意到，斯微生物支付账款的时间不断拖延，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起诉。

起诉斯微公司的情况大多是买卖合同纠纷，原告方包括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此外，还有与昆山恒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初晨物流有限公司等的服务合同纠纷，与明度智云（浙江）科技有限公司、天俱时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施工合同纠纷，与上海天慈国际药业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以及与前高管的部分劳务合同纠纷。据财新不完全统计，40余起案件中，发生在2023年的案件占比最大。

2023年6月，周文决定将斯微生物告上法庭，7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根据庭前协商内容，斯微生物需要分四次归还账款，其中第一笔支付时间在9月。

9月1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称，因在与上海多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斯微生物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对斯微生物及其法定代表人李航文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限制消费令"曝光后，周文开始担忧自己公司能否如期收到账款。

"斯微生物突然这样，我们也感到很意外。"一名斯微生物前研究员表示。从资方簇拥，到拖欠供应商账款，短短两年，斯微生物为何深陷危机？钱到底花在何处了？为什么这样花？

这不是斯微生物第一次陷入财务危机。"一旦全力以赴开始做新冠疫苗，2020年我们就觉得钱不够了。"据李航文回忆，当时国内mRNA供应链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合成mRNA所需要的原料、磷脂和实验猴价格高昂，"到2020年下半年，研发已经花了接近五六千万元"。

2020年6月，西藏药业与斯微生物达成全球独家战略合作关系，将根据新冠、结核及流感疫苗的研发进度，分阶段向斯微生物投资3.51亿元，获得后者前述3款疫苗的全球独家开发、生产、使用及商业化权利。

之所以接受西藏药业合作，有公司内部人士提到，因为当时西藏药业立刻就可以给到3500万元预付款。然而2021年8月，西藏药业忽然宣布与斯微生物的疫苗合作开发协议生变，不再投资其mRNA疫苗开发，前期投资的7000万元转变为股权投资。

李航文将这一合作的中断定义为"友好分手"。西藏药业给出的理由是：mRNA疫苗产品上市周期较长，且预计未来将持续产生较大的临床、产业化费用及风险；斯微生物目前已开展多轮融资，已基本具备独立开展临床试验和规模化生产的资金储备。

"分手"前两个月，斯微生物确已宣布完成上述单笔金额2亿美元的大额融资，并在2021年6月发布的消息中提到，这笔融资将用于三个方向：加快新冠疫苗临床研究、GMP生产车间的建设及扩充研发管线。

"支出大头是新冠疫苗工厂的建设，即生产能力的建设。"据李航文透露，工厂耗资近10亿元。在疫苗未获批的情况下，2021年，斯微生物先后在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奉贤区东方美谷产业园建立了近5万平方米的mRNA疫苗生产基地，号称可以实现20亿剂原液产能及4亿支灌装产能。前一家工厂已拿到生产许可证，2023年7月暂停试运行，后一家工厂建好但尚未投入使用。

李航文表示："建工厂是必经之路。"根据《疫苗管理法》，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具备疫苗生产能力，这意味着国内企业想要生产、销售新冠疫苗，必须自建工厂。另外，当时斯微生物想尽快把生产打通，"做过一次大生产，才能打通规模生产工艺，突破产业化瓶颈"。斯微生物一名高管曾表示，国内此前缺少微流控仪器等量产mRNA疫苗所需的关键设备，斯微投入大量资金与设备商合作研发并取得进展。

李航文坦言，做建厂决定之时，国内疫苗接种需求仍在，且对获批有一定底气，"斯微生物是mRNA赛道的领头羊，也是疫苗专班牵头的单位，大家都觉得获批可能性很大"。

对比融资额度更高，但自建产能不过4000万剂的艾博生物，有行业人士质疑斯微生物"迈步太大"。李航文认为，横向对比，斯微生物产能扩幅并不突出。艾博生物与沃森生物合作，生产不是前者重点考虑的环节，后者产能储备同样破亿。

另外一项大笔支出是临床试验。有疫苗企业人士向财新介绍，一款疫苗走完III期临床花费一般在2亿—5亿元左右。李航文举了一例子，就海外III期临床，当时有CRO（合同研究组织）企业向斯微生物报价10亿元。他进一步解释道，与肿瘤药物III期临床受试只需要几百人不同，传染病疫苗海外III期临床至少需要1万到3万人，"人数多，花费就大"。

此外，在周文看来，人员的盲目扩张或加剧了斯微生物后期运行的压力，"招聘过多不必要的人员，承诺过高的薪资"。2019年底以前，斯微生物员工规模不足百人，而到2022年已经接近600人。就在2021年3月底到4月初，斯微生物连续发布11天的招聘信息，招聘不同岗位人才，包括注册部、质量部、人力资源部、医学部、采购仓储部等。

一份斯微生物与猎头公司的服务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显示，2022年斯微生物聘请"企业传播高级总监"一职开出的年薪高达234.5万元。一名斯微生物前员工个人认为，公司管理不善，难留住人，"高管换了一茬，内部派系很多"。

李航文则认为，斯微生物主要依据需求设岗，当初人员扩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生产做准备。

另有斯微生物前研究员表示，公司在推进相关管线研发时，反复横跳，缺乏计划性和连续性，"项目很散乱，没有集中资源打通一个项目"。财新在斯微生物官网上看到，公司目前在研产品共15个，横跨传染病、肿瘤免疫、罕见病等多领域，不乏带状疱疹、流感、RSV等热门品种。除新冠疫苗外，进展最靠前的产品是个性化肿瘤疫苗，正在澳大利亚开展I期临床。但斯微生物方面表示，管线研发投入相对少，耗资规模与建设工厂或者海外临床不是一个数量级。

斯微生物目前股权较为分散，有约50个股东，其中李航文是最大股东，直接持股18.25%，通过得微康生物、微斯浩等企业最终受益股份19.57%。领承创投关联的嘉兴领峥和嘉兴领峰合计持股10.76%，龙磐投资持股5.86%，招商健康持股5.08%。

在李航文看来，高额投入在新冠疫苗研发竞赛中并不特殊。例如综合业绩报告，康希诺新冠疫苗管线累计研发投入超13亿元。“斯微（生物）最大的问题是市场给高估值的时候，我们没有开放更多份额，融足够多的钱。”李航文称，自己一直主张尽可能多地融资，但当时处境复杂，意见不同，“历史没有假设”。

起家于肿瘤疫苗

与海外头部企业数十年的厚积薄发相比，国内专攻mRNA技术的企业要“年轻”得多，成立七年的斯微生物在国内算得上“老牌”企业。

斯微生物起家于mRNA肿瘤疫苗，创始人李航文硕士毕业于中国疾控中心，2003年进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微量元素营养学博士，并于2010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获得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罗斯维尔癌症中心药理及临床治疗系助理教授，长期关注肿瘤免疫赛道。在中国疾控中心的读书经历，让李航文积累了疾控体系的人脉，为后续新冠疫苗研发合作埋下伏笔。

李航文在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导师唐定国是美国资深肿瘤学专家，现为美国罗斯维尔帕克癌症中心药理及临床治疗系主任。唐定国曾任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转化医学中心癌症干细胞研究所所长，与东方医院渊源深厚，回国后的李航文也在东方医院转化医学平台担任研究员至今。

在美国期间，李航文还结识了沈海法。他是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休斯敦卫理会医院纳米医学系教授，擅长药物递送领域，其发明的LPP纳米递送系统2015年在动物实验中取得良好结果。三人后来成为斯微生物创始团队的重要成员，唐定国现已回美国，仍持股1.52%，沈海法在斯微生物上海总部，持股3.04%。

在美国期间，李航文见证了mRNA技术的前一个风潮。mRNA全称为信使核糖核酸。顾名思义，mRNA在人体中扮演“信使”的角色，将DNA（脱氧核糖核酸），即人体遗传信息储存库中的遗传信息传递给核糖体，使后者合成蛋白质。mRNA药物，即是通过体外合成的mRNA分子，在人体内实现特定蛋白的翻译，达到治疗或预防疾病的目的。

2015年以后，基于脂质纳米颗粒（LNP）的mRNA递送技术逐渐成熟，使得mRNA药物领域在美国蓬勃发展，以“mRNA三巨子”（Moderna、BioNTech和CureVac）为代表的mRNA企业更是成为生物医药行业的新晋宠儿，合作对象不乏药企巨头。例如2015年11月，BioNTech与赛诺菲签订早期产品引入协议，基于mRNA研发平台发现和开发5种mRNA肿瘤免疫疗法。BioNTech在每一款研发产品中可以获得3亿美元的研发、监管和销售里程碑款项。同年，Moderna先后与武田制药、默沙东签订价值了3亿美元、1亿美元的RNA药物研发协议。

据李航文回忆，2016年前后，很多科研工作者归国投身生物医药行业，他当时看到了mRNA技术在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领域广阔的应用前景以及国内这一平台技术发展的空白，决心从休斯顿回国创业。

创业初期，李航文按照美国创办科技公司的“3P（platform，patent，publication）思路”，决定先做基础准备再融资，最主要的一步就是与沈海法就职的单位协商，获得mRNA递送技术相关专利的授权。专利到手后，2017年9月，斯微生物获得龙磐投资和京工弘元的天使轮融资，共计1800多万元。而后，李航文等人着手公司重新选址、扩建团队、搭建供应链。

“当时国内mRNA合成、递送包裹专业的公司都没有。”2018年，李航文意识到，由CRO代工的“轻资产”模式在国内很难实现，开始建设实验室及配套设施，“钱很快就烧没了”。

在生产设施建设同一年，2018年11月，斯微生物个性化肿瘤疫苗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实现了首例病人给药。李航文将此视作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他提到，当时想借此尽快完成一轮融资，继续推进项目研发。一番波折后，2019年7月斯微生物完成近亿元A轮融资。投资方包括张江火炬创投、珠海隆门叁号、久友智慧、伊泰久友和芳华投资，天使轮投资方龙磐投资追加投资，探针资本担任本轮财务顾问。

李航文称，到2019年底，斯微生物账上仍有数千万元人民币，几乎是国内mRNA赛道最有钱的公司，正常运行两至三年不成问题。对于具体数额，斯微生物不愿透露。财新注意到，2020年2月斯微又进行了A+轮融资，君实生物出资1000万元，另一位投资方为领承创投。

转折发生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了。

新冠疫苗成败

从新冠疫苗的研发起点看，斯微生物属于国内“第一梯队”。

新冠疫苗研发在公司内部立项是2020年1月中旬，当时只是当作一个普通项目，由一队传染病小组推进。直到1月底，李航文接到电话，科技部通知他参加新冠疫苗研发的第一次讨论会。会上，基于前期肿瘤疫苗研发经验以及国家期待，李航文做出“可以做（新冠疫苗）”的表态。当天，与会企业还包括国药集团、科兴生物、康希诺、智飞生物等。

会开完后，李航文立即号召员工返岗开始攻坚。2020年2月，斯微生物与中国疾控中心、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共同设计开发的新冠疫苗已开启动物实验，在100多只健康小鼠身上注射。同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曾到公司调研、了解疫苗研制进展和难题。

“国家也重视，上海市也重视。”据李航文回忆，当时斯微生物还拿到了国家应急专项拨款。

然而，李航文提到，斯微生物创始团队本身是肿瘤疫苗出身，传染病疫苗研发处于建设初期，一定程度上拖累了进度，在2020年6月CDE技术申报会上准备不充分。直到2021年1月，斯微一代mRNA疫苗才获得Ⅰ期临床试验批件，比艾博生物mRNA新冠疫苗获批临床时间晚了近半年。彼时，国药集团和科兴生物研发的灭活疫苗已经授权紧急使用数月。

与西藏药业的疫苗合作开发协议生变后，斯微生物再没有披露过第一代疫苗研发进展，转而推进迭代产品。2021年9月，其宣布开启迭代产品临床试验，首席科学家沈海法曾介绍，迭代疫苗加入新的突变点位D614G，并更新了配方比例和mRNA分子结构。

2022年12月，斯微生物宣布，其迭代mRNA疫苗在老挝获得紧急使用授权，但未直接公布安全性和保护效力的数据，仅披露了概况：受试者中未出现与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和特别关注的不良事件，总体安全性良好；“二免”后14天对原型株、德尔塔株的血清阳转率均达到100%，对奥密克戎株的血清阳转率达到95.8%。

目前，迭代苗疫苗在国内完成Ⅰ期临床，但尚未拿到国内市场的入场券。李航文介绍，该疫苗已经申报紧急使用授权，也递交了新药生产上市申请。“我们希望国家能够认可平台工艺，为后续快速切换毒株、推进研发做准备。”

复盘整个研发过程，一名斯微生物前研究员认为，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在疫情回落时，出现“研发摇摆”。李航文也反思称，新冠疫苗及其他产品的研发再快一点，也许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收获。

最终，海外一战成名的新冠mRNA疫苗在国内的结局并不如人意。2023年3月，中国首款针对新冠的mRNA疫苗获批紧急使用，但目前仍未有国产mRNA疫苗获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

首个也是惟一一个摘得国产新冠mRNA疫苗桂冠的企业是石药集团。据其公告，加强接种1剂其新冠疫苗SYS6006后，14天的针对奥密克戎BA.5中和抗体的几何平均滴度（GMT）为236，是加强接种前的83倍；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且程度较轻。

2020年3月，复星医药从BioNTech处获得在大中华地区独家开发和商业化其新冠mRNA疫苗的权益，不久向国家药监局递交了上市申请，但至今未获批。除斯微生物外，部分企业国外审批也取得一定进展，2022年7月，沃森/艾博生物的新冠mRNA疫苗在印尼获批。其他赛道内的企业，如艾美疫苗、瑞科生物、康希诺生物等，离“撞线”更为遥远。

一名斯微生物内部研发人士2022年向财新坦言，国产新冠mRNA疫苗“包括我们在内，各家技术都有瑕疵，‘起跑线’与海外有差距”。

李航文自称，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斯微生物与目前国内惟一获批的mRNA新冠疫苗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线”，但后者的优势在于脂质体研发有一定技术积累，或更受监管方信任。“石药集团使用的是成熟的递送系统，而斯微递送系统有几个分子是自己（研发）的。”有疫苗领域研究专家提到。

递送系统的制备是mRNA药物研发的难点之一。由于直接注入体内的mRNA会迅速降解，且难以穿过细胞膜，进入翻译过程的发生场所细胞质，mRNA需在递送系统的帮助下进入人体。现在国内外使用最广泛的递送系统是脂质纳米颗粒（LNP），石药集团也是采用的这一工艺。LNP专利目前由两家加拿大公司持有，该技术被Moderna和BioNTech用于开发新冠疫苗，后者已经间接取得了专利授权。而Moderna后续可能需支付高额专利赔偿。

沈海法称，如果使用LNP平台，虽然可以在技术细节上创新，规避部分“子专利”，但很难逃脱LNP“母专利”的涵盖范围。斯微生物使用自主研发的LPP（脂质多聚复合物）平台递送mRNA更定向，安全性上更有优势。

不过，LPP平台还没有成熟产品面世。有医药投资人表示：“不管从结果上，还是从评价来看，斯微生物使用的LPP都不是一个主流的方法。”

“国产新冠mRNA疫苗最终很少能成功上市，有很多方面原因。”鼎晖投资创新成长投资高级合伙人柳丹曾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前，中国没有任何mRNA的产品上市过，监管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少数几家mRNA企业，哪怕之前没接触过传染病疫苗，也动用了几乎所有的财力和人力投入进去，当时也是政府和投资人所鼓励的。但最终由于技术积累不足、新冠流行毒株变化、监管逐步趋严等多方面原因，很多企业没有取得理想成果，的确十分遗憾。”

虽然“撞线者”寥寥，但有疫苗研究领域专家认为，新冠最大的遗产确实是mRNA疫苗。以修饰和递送两个mRNA研发的关键环节为例，李航文提到，此次拿诺奖的“修饰”技术目前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平台化，国内外差距已不明显。

前述专家提到，疫情过后，国内mRNA疫苗产业链上下游基本已经打通，基本无需担心“卡脖子”，但“落后还是落后的”。例如在递送系统方面，国内尚未有一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产品受到药监系统认可，而任何递送系统从合成材料，到证明安全可靠，再到运用于动物和人体以及生产设施齐全，整个周期很长，这段时间差是跨越不过去的。

“时间太短也会造成差距，一些经验教训可能需要时间积累。”李航文说。

如何纾困？

斯微生物仍在艰难自救。李航文不愿意透露财务现状，只是叹息：“我们实打实推进了很多工作，但现在融的钱也不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据一位疫苗企业人士观察，当下资金紧张的新兴疫苗企业想要自救，只能通过砍管线、砍人来降本增效，放慢步骤。

在新冠疫情不再被世卫组织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两个月后，今年7月，斯微生物确认，旗下天慈工厂暂停试运行，相关人员待岗，只保留少量必要人员维持工厂的基本运营、现场看护等工作。当时斯微生物解释，由于外部客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且考虑到近期没有生产需求，避免高温对工厂能源过度消耗，同时进行设备保养检修，故暂停天慈工厂试运营，后续有新的生产需求将继续恢复生产。

斯微生物现员工提到：“缩小了一定（人员）规模，工资发了部分。”据了解，公司人员规模已从巅峰时期的600余人，缩减至现在的100多人。

节流之外，斯微生物也在寻求“开源”的机会。“我们在积极融资、积极做CDMO（合同开发及生产组织）业务，积极地寻求BD（商务拓展）的交易，也在寻找整合的机会。”李航文说。

在成为被执行人之前，5月25日，斯微生物发布消息称，正式完成数亿元的Pre-D轮融资，该笔融资主要用于加快肿瘤治疗疫苗及传染病疫苗管线的开发，并持续布局人工智能算法及mRNA序列设计优化等技术。由于斯微生物始终不愿公布具体投资方，外界质疑该消息是公司放出的“烟雾弹”。李航文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公司2022年及2023年融资进账约3亿元，5月公开宣布主要是为了配合宣传进度。

李航文提到，融资的进展受到大环境“寒冬”的影响，公司目前估值暂不便透露。

由于新冠疫苗审批进度不及预期且需求滑落，资本对疫苗企业的整体态度进入调整期。有投资机构人士表示，现在虽不回避疫苗企业，但肯定会精挑细选，“上半年，基本上没有看到新的大笔资金进入疫苗行业”。另有一名投资人表示：“以mRNA为代表的疫苗新技术依然值得布局和投资，只不过大部分基金已经投过，且砸在里面了。”在斯微生物危机显露之后，相关投资方皆对外表现沉默。

8月24日，斯微生物宣布，公司将打造CDMO服务平台。对这一“提升自我造血能力”举措，斯微生物前员工并不看好：“并不是放弃上游研发，下游生产就会活过来，这条线上的客户基本是不存在的。”首先，疫苗行业目前的订单就很少；其次，mRNA工艺和LPP递送的专属性很强，斯微生物可以承接的订单种类极其有限，基本仅限于代工mRNA疫苗体系。

而斯微生物针对的客户多数没有进入需要CDMO服务的阶段。李航文提到，国内mRNA行业尚未完全进入产业化阶段，真正的CMO（合同生产组织）、CDMO业务订单出现会相对晚一点，早期以CRO为主。

李航文表示，已经有了一些初步订单，订单规模只能说“还处于起步阶段，（靠CDMO业务）完全支撑起企业研发还有差距”。公开信息显示，9月12日和13日，斯微生物发生股权出质，质权人均为李某。这与一些债权和银行贷款相关。

李航文当下的目标就是，寻求更多的钱进来，支撑企业长期健康的发展。“就mRNA赛道而言，国内企业在新冠竞赛中已经掉队了，希望可以在个性化肿瘤方面缩小差距。”

在只考虑研发进度的情况下，李航文预计，斯微生物的mRNA个性化肿瘤疫苗最快3到5年可以上市。2022年1月，公司宣布该疫苗在澳大利亚获得I期临床试验批件，成为首个获批临床的国产mRNA肿瘤疫苗。李航文此前回复财新称，目前I期试验进展顺利，已有多例患者入组，预计2024年会有试验结果。而全球新冠疫苗销售中收回高额利润的Moderna和BioNTech，目前分别有两款个性化肿瘤mRNA疫苗在研。两家企业均宣布，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披露III期临床试验的核心数据。

在mRNA技术平台不断被推至更广阔领域的同时，一则振奋行业的好消息传来。10月2日，诺奖委员会宣布，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制药公司BioNTech的高级副总裁卡塔琳·考里科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教授德鲁·韦斯曼，以表彰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从而能够开发出有效的新冠肺炎mRNA疫苗”。

“实至名归。”李航文对此表现平静：“我不是因为诺奖或新冠带来的商机，选择这一赛道，我（过去）是看到了它巨大的应用前景。”

面对国内外mRNA企业冰火两重天的处境，李航文乐观地认为，疫情后，国内监管体系和研发环境已有所改变，这对未来创新是有意义的。他表示，mRNA是一个新技术，中国疫苗技术在mRNA前与海外脱节就比较大，在基础悬殊的情况下，不能指望“一口气吃一个胖子”。

谭晨（实习）、蒋模婷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李东昊

最新财新周刊｜肿瘤基因检测断臂求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销售费用畸高，院外业务不可持续；而监管收紧，也成为大势所趋，医院主导权增加意味着什么？

文丨财新周刊 崔笑天

2023年10月12日，NGS（高通量测序）肿瘤基因检测行业的头部公司泛生子正式启动退市，宣布签署私有化协议，成为母公司（New Genetron Holding Limited）的全资子公司，这笔交易估值约1.26亿美元。

参与此次交易的买方包括中金康瑞医疗基金、Wealth Strategy Holding Limited、无锡国联集团、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无锡惠宏赢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每股普通股收购价格为0.272美元，每股美国存托股票（“ADS”，每股ADS代表5股普通股）收购价格为1.36美元。

泛生子在约一年前谋求退市，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思振于2022年8月发出私有化要约，如今迎来新进展。这个收购价比泛生子宣布收到私有化要约的前30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溢价21%，比公告发布前最后一个交易日（10月11日）溢价42%。私有化交易预计于2024年一季度完成。

王思振曾在内部信中表示这是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中追求确定性”，私有化更有利于多元化融资，并可以更灵活地激励员工、实现业务创新。

这家昔日的明星企业度日艰难，其2020年6月登陆纳斯达克，发行价为16美元，2021年2月股价达到历史高点30.64美元，如今跌落至1美元左右。最新财报显示，2022年，泛生子账上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不足2亿元，而当年的净亏损就超过8亿元。

相比私有化更受行业关注的是，9月中旬，泛生子发出一封内部信，几乎裁撤了肿瘤诊断事业群在全国的绝大部分院外销售团队。本次裁员被其员工与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解读为“断臂求生”。据知情人士透露，裁撤的销售或将原地转为代理。此举被认为有节省成本和规避风险两重考量：一方面可以降低销售和管理费用，增加净利润；另一方面，院外业务普遍的高额销售费用背后难免存在灰色地带，通过将员工转为代理，可以让公司更合规。

院外业务也叫“飞单”，指患者的样本外送至检测公司，销售代表或代理对接医生、患者等C端渠道，患者直接付钱给检测公司。与此相对的模式是院内业务，患者的样本在院内实验室检测，纳入医院收费目录，患者付钱给医院。

中晚期癌症患者使用靶向药或采用免疫治疗等较新治疗方案之前需要做基因检测，而院外业务一直是检测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患者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就诊中，医生递来一个小纸条，写着某检测公司销售代表的电话号码，拨打这个电话，借出样本送到第三方检验所，再交费给检测公司出报告，医生会基于报告来确定用药方案。

推荐一款院外NGS肿瘤基因检测，医生可能拿到占终端价20%—50%不等的回扣，部分小公司甚至可以给到60%以上。各家检测公司的产品同质化程度高，回扣和销量挂钩，直接导致检测公司的利润被蚕食，形成恶性循环。“行业是个好行业，但现有的商业模式下，想赚钱非常难。”一位销售主管感慨。

泛生子的考量折射了行业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省钱与合规。一边是找钱越来越难，上市公司股价长期低迷，一级市场融资无人接盘，在检测公司普遍亏损的现实下，各家公司急迫要储备充足的现金流过冬。

监管层也在推动行业合规发展。院外业务的灰色地带、高昂的销售费用都让后续公司上市之路举步维艰，叠加医药反腐的大环境，国家药监局、国家卫健委已经在年初出台试点文件，将NGS肿瘤基因检测导向院内，由试点医院对院内患者开展，医院承担主体责任。未来检测公司不再直接对患者提供服务，而是更多扮演医院共建实验室的合作者或者试剂盒供应商的B端角色。

寒风乍起，行业内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场变化正在迫近。这种转型能否帮助检测公司扭亏为盈？能否让患者真实获益？

从盛夏到寒冬

NGS肿瘤基因检测已成中晚期癌症患者使用靶向药前的标配。NGS即高通量测序，此前肿瘤基因检测最常用的是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已在各大医院病理科铺开，其优势是准确率高、技术成熟、简单便捷，但仅能用于检测单基因变异。而NGS技术能够同时对上百万甚至数十亿个DNA分子进行测序，有助于寻找新靶点及联合治疗方案，但要提高灵敏度和可重复性挑战更大，质控难度也更高（详见本刊2020年第32期《肿瘤基因检测公司上市潮背后》）。

相关检测公司第一梯队包括泛生子、燃石医学，第二梯队包括臻和科技、世和基因、元码基因、吉因加、至本医疗等。

2014年至2017年，资本对NGS肿瘤基因检测行业的热情达到高点。检测公司的融资较为顺利。据财新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100多家肿瘤基因检测公司中，半数以上都有外部融资，涉及150余家投资机构（详见本刊2019年第11期《肿瘤用药基因检测乱象》）。

高光时刻停留在2020年燃石医学与泛生子成功赴美上市。自此之后，行业仿佛按下暂停键——上市公司股价低迷，拟IPO公司上市无进展，在医药领域遭遇资本寒冬的大环境下，检测公司想在一级市场找钱更为艰难。

典型代表是臻和科技，这家检测公司成立至今共经历7轮融资，投后估值从2500万元涨至52.3亿元。最后一轮融资在2020年，由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领投，泰康资产、建信股权、高瓴创投、苏州中盟信、华兴资本等跟投，老股东中金资本旗下基金、经纬中国等追加投资，投资者以12.3亿元总对价认购23.55%的股份。

2022年，臻和科技再次启动融资，但此时有意者甚少，只能转向二级市场寻找出路。公司2022年9月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2023年2月更新招股书，但如今该IPO申请已失效。不少医药领域投资人对财新直言，现已不太看好NGS肿瘤基因检测行业，相关企业的投融资交易少了很多。

一位员工对财新感慨："（公司）曾经的目标是要好好活，现在的目标是活下去。"据财新了解，近两年已有多家检测公司调整业务、收缩岗位、裁撤员工。

元码基因创始人、CEO田埂判断，由于此前融资较顺利，检测公司在初期阶段不缺钱，但看烧钱的速度，未来一两年可能会出问题。

检测公司难以扭亏为盈，现金流受关注。上市公司中，泛生子2022年收入6.5亿元，归母净亏损8.1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1.8亿元。其在2022年报中强调，需要大量额外的融资维持经营，如果无法以可接受的条件或根本无法获得融资，可能会推迟、限制、减少或终止产品研发、商业化进程或其他经营活动。燃石医学2022年收入5.6亿元，净亏损9.7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9.3亿元。

两家公司股价表现同样惨淡。泛生子股价高点在2021年初，约为31美元/股；燃石医学股价高点在2021年初，约为40美元/股，现两家公司每股股价均为约1美元/股，市值1亿美元左右。

拟IPO公司中，臻和科技2021年收入3.9亿元，净亏损4.1亿元，截至2022年6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为4.4亿元。其假设，未来平均现金燃烧率约为2021年水平的1.3倍，估计该现金流能够维持约20—36个月的经营。世和基因2021年收入5.2亿元，扣非归母净亏损1亿元，报告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为1.4亿元。

商业模式待梳理

资本狂飙突进之后，余下一地鸡毛。业内至今仍公认NGS肿瘤基因检测还没有找到顺畅的商业模式。

"大家都很难受，都赚不到钱，都在思考。"田埂说，资本进入太多，行业其实并没有成熟到那个程度，产品在初期又高度同质化，创新能力体现不出来，现在估值立不住了，加上监管趋于规范严格，导致现在局面混乱。

肿瘤慢病化成为趋势，基因检测市场乍看起来空间广阔。每一名需要用靶向药的癌症患者，几乎都会做基因检测，以精准预判用药效果。后续随着靶向药耐药，还会再做基因检测调整用药方案。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数据，中国每年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约为406万，每年死亡病例约241万。

"与癌共舞"抗癌论坛的版主林诚（化名）告诉财新，在母亲确诊非小细胞肺癌的十年间，他带着她做了五次基因检测，换了七次治疗方案。最早在2011年做的是PCR技术的EGFR基因突变检测，后来做了NGS技术的一次小Panel基因检测，两次大Panel基因检测。渐渐地，林诚身边选择NGS的病友也多起来。

PCR与NGS技术在准确率上差异不大，NGS的优势在于在检测主要基因的基础上一次性集中扩大筛查范围，得到全面的肿瘤基因突变信息，检测出匹配药物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这对患者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求生机会，以及获得药物在适应证内的医保报销。

Panel则是NGS肿瘤基因检测的专有名词，类似"套餐"的概念，以覆盖基因多寡加以区分。9个基因的小Panel，定价约在5000元；56个基因的中Panel，定价约在6000—8000元；300多个基因的大Panel，定价约在1万元以上。

市场潜力大，客单价不低，检测公司为什么赚不到钱？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大部分流向了中间环节。

在肿瘤基因检测过程中，医院与医生的话语权极大。检测公司向医院、医生或患者提供检测服务并收取费用，按照渠道细分为院内业务与院外业务。院内业务是检测公司与医院等机构合作，样本在院内实验室检测，患者付费给医院，医院再与检测公司分成。院外业务是销售代表直接与医生、患者等个人对接，样本外送至检测公司旗下的第三方检验所，患者付费给检测公司。

"早期行业人士的理解都是医生是主体，而'绕过'了真正的主体医院，因为跟医院打交道监管会更加严格，难度更大。时间也证明了主打院外业务的公司发展更快，更早融资，更早上市。"田埂说，"但长期来看，飞单是没有门槛的，谁补贴多，谁就能占有更大的市场，所以融资能力而非业务和研发能力变成了主要能力，本末倒置。"

院外业务常见“带金销售”的灰色地带。财新向多位业内人士了解，推荐一款NGS肿瘤基因检测，医生能拿到占终端价20%—50%不等的回扣。头部公司可能在30%—45%，部分小公司甚至给到60%以上。

由于医药行业对渠道的依赖严重，行业中还存在着大量代理，他们手握当地医院和医生的资源，检测公司给到他们一个较低的底价，在此之上代理有一定的定价空间，他们可以给出的回扣比例会更高。

一位北方省会城市的销售经理告诉财新，在头部公司销售和代理的比例大概是一半一半，但行业内还有很多二三梯队的公司基本上仅靠代理。甚至会出现层层分包的情况，“还有公司只有实验室的资质，但不做检测，只是以它的名义把样本收过来，给头部公司检测”。检测行业的乱象也多因此而生。

NGS的底层技术基本相同，各家检测公司的产品同质化严重，技术壁垒不高，销售费用支撑业绩增长，检测公司的利润逐渐被蚕食，形成恶性循环。检测公司披露的销售费用率约在50%—70%。2022年，泛生子销售费用3.6亿元，占收入比重55.4%；燃石医学销售费用2.5亿元，占收入比重66.1%。

权责变迁

畸高的销售费用下，院外业务不可持续。与此同时，监管风向逐渐调整，也成为大势所趋。

2023年初，国家药监局、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医疗机构自行研制使用体外诊断试剂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这一文件是对三年前《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第53条的探索与完善。

第53条规定，对国内尚无同品种产品上市的体外诊断试剂，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根据本单位的临床需要，可以自行研制，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本单位内使用。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定。

绝大部分NGS肿瘤基因检测都难以通过国家药监局的审批获得注册证，因此均落入此范畴。这种实验室自制试剂又叫LDT（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

《通知》指定了六家北京的试点医院，可以使用自制的体外诊断试剂，包括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中国医科院阜外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后续又补充了上海的四家医院作为试点。

这些试点医院的任务是“形成可复制的管理路径和具体要求，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相关制度奠定基础”，并要承担试剂质量安全和临床使用安全的主体责任。一位从业者的感受是，这与基于NGS技术的无创产前筛查（NIPT）合规发展的管理路径很像——从最早的野蛮生长，到试点探索，最后全国普及。

这给检测公司带来不小震动。NGS肿瘤基因检测业务需要与医院合作，由医院主导，面向院内患者开展，院外业务不可持续，不受重视的院内业务成为重点，行业需要彻底转型。

“之前（院外业务）的灰色地带已影响到很多检测公司A股IPO，大家只能去纳斯达克或香港上市。未来行业内公司的商业模式一定会发生巨大变化。”田埂说。

对实验室自制试剂的新监管需要两部门联动。药监部门为医院开展哪些具体的试剂项目把关，卫健部门则负责筛选医院，并监督医院使用试剂。

具体来看，医院的试点方案需要所在地省级药监和卫健部门审核同意，报送国家药监局和卫健委备案，医院在使用自制试剂前也需要省级药监部门备案，报送国家药监局，并通报同级卫健部门。这意味着检测公司与前述十家试点医院合作门槛不低，时间周期也较长，需要卫健与药监部门批复后才可签署合作协议。

当国内监管尺度调整时，美国也在考虑收紧对实验室自制试剂的监管。长期以来，美国的监管模式较宽松，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对其给予一定的执法自由裁量权，实验室只要通过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下属的医疗保障服务中心（CMS）的认证，拿到CLIA证书，就可以以自我管理、自主负责的模式在实验室内使用自制试剂，无需经过FDA批准。

如今，随着实验室自制试剂被更广泛使用，其有效性对公众健康有重大影响。在收到多起投诉、不良事件报告和公众与媒体表达担忧之后，FDA希望将这些未上市的实验室自制试剂纳入体外诊断产品（IVD）类别，与已上市产品一并监管。

10月3日，FDA发布拟议规章，对体外诊断产品的定义（用于诊断疾病或其他状况以治愈、减轻、治疗或预防疾病或其后遗症的试剂、仪器和系统）补充了“包括当这些产品的制造商是实验室的情况”。FDA还计划在四年内分五阶段逐步取消对大部分LDT的执法自由裁量权。

这一拟议规章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截至今年12月4日，最终能否通过仍未可知。实际上，FDA在2014年起就多次组织对LDT监管的讨论并形成草案，但由于来自行业组织及临床的阻力较大，没有下文。

对比来看，中国与美国对LDT监管收紧的趋势相同，但路径不同。美国拟由FDA管理，使用场景是实验室，企

业按照医疗器械标准申报及审批；中国由药监与卫健联合管理，使用场景限于医院内的实验室，缩减了企业的空间，让渡给医院更多的责任与权利，卫健部门的角色也变得更重要，这与此前对干细胞等新技术、新疗法的监管路径相似。

轰轰烈烈的医药反腐又为监管新政添了一把柴。2023年5月，14部门联合发布《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基因检测业务被点名，要求治理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强推基因检测或院外购药等第三方服务”。随后，陆续有患者告诉财新，在北京、山东等地医院，院外检测受到限制，借不出样本，只能在院内实验室做检测。

一名患者家属表示，此前自家患者都可以在山东省内其他医院借出样本，但今年8月，山东省肿瘤医院病理科告诉他，外借样本做院外基因检测需要主治医生签申请书，并强调“在院内做质量才有保障”。主治医生则表示原则上不外借样本，拒绝了他的请求。

地方已有政策可循。今年8月，湖南印发《湖南省医疗机构样本外送检测管理规范》，明确禁止医院将本院能开展的检测项目外送至第三方检验所，禁止医院人员有偿介绍患者及家属到指定检测公司，严禁医院人员私自接受检测公司任何名义、形式给予回扣。

“（院内业务）是趋势。在监管的指挥棒下，企业要为生存、为发展转型。”业内人士张信合（化名）说。

断臂求生

监管格局变化，行业如何应对？今年9月，泛生子开始对NGS肿瘤基因检测业务做大幅的组织架构和人员调整。这一举动被其员工与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解读为“断臂求生”。

泛生子几乎撤销了LDT直销部在全国的大部分岗位。据内部信，其撤销LDT直销部在昆明、天津、苏州、徐州、太原、长沙、南宁、深圳、郑州的所有岗位；在青岛和武汉的所有一线销售岗位；以及华北大区北京区域2023年度上半年月均销量在50万以下的地区团队设置及相应的地区经理岗位。LDT直销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岗位缩编。

所谓LDT直销部，就是公司做院外业务的销售。一位知情人士向财新透露，本次调整涉及的人员规模约为几十人，这些人或将从公司的销售原地转为代理。

这对泛生子来说，不仅压缩了成本，降低了销售和管理费用，增加了净利润，更规避了院外业务为公司带来的合规性风险。



泛生子与基石药业联合开发的“人PDGFRA基因D842V突变检测试剂盒”。图：泛生子官方公众号

但也有负面影响。张信合分析，销售转代理不是行业的主流趋势。“如果公司的野心是要成为市场龙头，怎么可能让销售网络这么不受自己控制？通过代理做进院，掌控权在代理手上，他们今天能代理你，明天就能代理别人。”

一位业内人士对财新分析，部分企业对接医生、蹲在医院里的销售人员工资很高，提成很高，给医生的回扣也很高，所以仅销售这一个环节的成本就占到了终端收费的70%—75%，“再加上10个点的管理费用，10到20个点的研发费用，公司是不可能赚钱的，这个商业模式无法持续”。

这些销售人员原地转代理后，只能拿到提成，大部分人很难保持原来的收入水平。“销售如果接受了这个状态的话，其实也就是接受了离职，就是改行了，不可能做很长时间的代理。”该业内人士说。据他判断，泛生子此举或代表企业压缩临床领域NGS肿瘤基因检测服务这一块业务，转而卖PCR试剂盒、数字PCR仪，这些都可以交给代理做。此外，还将侧重在大健康领域发力，与体检机构合作。泛生子在体检机构布局销售人员已有数年，相比医院，体检机构对销售人员的要求相对低，成本低，销售方式也不同。

更多行业内的公司也需要转型，压缩院外业务，发展院内业务。

检测公司与医院合作的主流模式是共建实验室，即医院申请实验室资质，确定收费标准，检测公司通过卖给医院未上市的试剂、协助医院生产试剂来赚钱，而不再是提供检测服务。

在此过程中，检测公司为医院配备技术支持的团队以及测序仪等设备，团队可以入驻院内，也可以远程协助。“如果检测通量大，需要的人员会很多，并且覆盖上下游，比如实验员、操作机器的人员、生物信息分析员、出报告的人员、懂病理的人员，这些是一个链条。”某头部NGS检测公司高管刘畅（化名）说。

医院与检测公司是双向选择。医院会综合考量企业的资质和能力，资质齐全是硬条件，还要看企业的团队规模、管理能力、科研能力，很多医院希望通过实验室积累数据，发表高水平论文。检测公司也要看医院的规模、患者基数以及是否可以排他性合作。“越是大医院，他在做共建实验室的供应商的选择上越谨慎。”刘畅说。

不同公司对合作医院有不同考量。元码基因侧重布局二、三线城市，目前已经与约30家医院合作，意在建立排他性紧密合作关系；头部企业看中的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医院，患者多，品牌效应明显，但医院往往不会签独家的紧密合作协议，而是同时与多家检测公司合作，合作不稳固。

与医院合作成本高、周期长，是否会进一步影响检测公司的盈利能力？张信合表示，在这种模式下，大部分检测公司提供的不是检测服务，而是试剂，因此每一单检测的利润空间降低了。不过，并非不赚钱，有一些医院不需要公司投入设备，有专门的预算购置，因此公司的投入也会小很多。

卖试剂的生意远没有卖检测服务前景广阔。试剂的成本低、毛利率高，市场规模随之缩水。前述业内人士举例，“比如，卖服务是100块钱，卖试剂就是20块钱、30块钱。”此外，公司还要支付一部分成本给符合GMP（良好生产规范）标准的厂房生产试剂。

不过，这挤出了原来销售的灰色地带，院内业务避免了给医生回扣，检测公司有望逐步盈利。

田埂表示，从元码基因的实践看，入院后只需按照协议分工合作，医院负责给医生激励，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成本。

也有声音担忧这些实验室在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收回成本，无法像此前的第三方检验所形成规模效应。

除去部分一线城市的大三甲，普通市医院做检测的患者数量有限，检测通量很小。刘畅表示，院内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检测量，开一次机只做少数几次检测，成本会比第三方检验所跑满通量的成本要高很多。

据田埂计算，一般实验室约需要20人做后台支持，加上设备的费用，公司的初期投入按照医院规模从百万到千万元不等，当实验室月检测费用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达到盈亏平衡点，进入良性发展。

测序龙头出身的国投创业投资总监、博士钟靖对财新分析，如果和核心医院合作共建实验室，检测公司的业务量有保障。“另一方面，随着国产测序仪更好更多，设备试剂成本会下降。人工成本随着自动化建库，自动化分析的加强也会下降。在主要的三甲医院运营NGS的模式是越来越可行的。”

总体来看，现有监管将引导基因检测向市场空间更小但更合规的方向，医院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多位业内人士认可这种转型，但仍期盼行业良性发展后，未来能够对第三方检验所和医院一视同仁——监管层可以对第三方检验所提出一些资质上的硬指标要求，而不要将LDT的主体限制在院内，“因为真正的创新主体是企业”。

价格待规范

当应用NGS肿瘤基因检测的责任主体变为医院，监管将如何演变？

据前述《通知》，试点医院除备案外，还应当建立患者权益保障制度、风险管理机制和不良事件处理机制，医院每半年将自制试剂研究、制备和临床使用数量、有效性分析等数据向省级药监和卫健部门报告。国家药监局和卫健委则对试点医院适时做评估检查，违反试点方案或有重大安全隐患的，应当暂停或取消试点资格。

当下的监管框架内，对十家试点医院之外的院内实验室未有提及，对实验室自制试剂的定价也缺少指导。患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入院之后，基因检测会变得更贵吗？各家医院情况不一，有的患者表示，在院内检测与医生推荐的院外检测价格相仿；也有患者表示，院内检测与自己寻找检测公司的价格相差较大。

刘畅表示，如果医院自己购买了设备，这部分成本需要分摊到检测服务上，或者医院做检测的患者少，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都会导致定价更高。

正常的医疗服务项目或药械的定价受国家医保局管理。但刘畅坦言，NGS检测的最大特性，是它的基因不固定。随着肿瘤相关的研究更新，可以往里面灵活加入或减少基因位点，验证周期短、升级速度快，价格也会随之调整。这是监管难点，导致难以获注册证、难以进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更难以纳入医保。

因此，一直以来NGS肿瘤基因检测的定价缺乏监管，没有市场指导价，医院有非常大的自主权。

前述北方省会城市的销售经理告诉财新，一款中Panel检测，公司底价是3000元，院外给到患者的价格是5000—7000元；在一些医院内则会涨到8000—9000元。大Panel检测价格更高，涨价会更严重，同一款产品在河南某医院9800元，山东某医院就能定1.7万元。

前述患者家属也表示，山东省肿瘤医院的检测价格相比检测公司相差一半，50多个基因的中Panel检测，院内收费1万元，检测公司则只需要5000元左右。但他没办法借出样本去检测公司做，“这个病不能等，不能差这几千块钱不看病，只能先在医院做了”。

也有业内人士担忧过度医疗问题。选择哪款基因检测，患者往往缺乏判断能力，从PCR到NGS，从几个基因的小Panel到几百个基因的大Panel，价格也水涨船高，从千元到数万元。但NGS检测并非Panel越大越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杨帆曾对财新介绍，Panel越大，技术难度也更大。因为高通量测序读长越长，引入的突变越多，越容易产生误差。

林诚则表示，不同Panel基因数量差距拉得特别大，让患者倾向于选择多的，但实际上，肺癌9基因的小Panel基本覆盖了有药可治的靶点，没有必要盲目求大。

大Panel的一大卖点在于，检测结果除了可以指导靶向用药，也可以检测肿瘤突变负荷（TMB），进而指导免疫治疗。10月12日，已有首款大Panel试剂盒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肺癌患者的TMB检测，预测免疫治疗效果。“但到治疗后期，对患者来说，没有化疗药可用，没有靶向药可用，都或多或少会去尝试免疫治疗，所以从患者家属角度讲，大Panel意义有限。”林诚说。

钟靖认为，NGS技术在过去十年飞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NGS临床应用的先锋，但仍存在一些过度医疗的情况，比如一部分NGS肿瘤基因检测，实际上更简单的PCR可在成本低得多的前提下解决大部分伴随诊断。他也看好并投资了PCR肿瘤伴随诊断多联检。

总体来看，虽然NGS肿瘤基因检测纳入院内实验室便于监管，但现有的监管体系仍需完善，变得更全面、更透明，以确保准确度，并避免价格虚高与过度医疗。

新业务预期

临床检测业务尚在摸索前行，检测公司意欲开拓新战场——与药企合作，助力新药研发，布局伴随诊断试剂盒（CDx）。

相比一次可以配套多个靶向药的大Panel检测，伴随诊断试剂盒与药物的对应性更强、更合规、更容易获批，费用也更低。

伴随诊断试剂盒一般与一款或几款药物强绑定，通过检测患者样本，为患者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重要的信息，包括确定最有可能从药物中受益的患者、相关严重不良反应风险较大的患者等。

研发已有路径可循。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2021年12月发布《抗肿瘤药物的非原研伴随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注册审查指导原则》；2022年6月发布《抗肿瘤药物同步研发的原研伴随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注册审查指导原则》，指导伴随诊断试剂盒研发。

早在新药研发阶段，药企就开始重视伴随诊断，因为可以筛选目标人群及适应证。燃石医学告诉财新，当新药的药效与对比药物差别不够大时，伴随诊断的协助对提高临床成功率会非常关键。

这样，得到的临床试验数据也可以支持伴随诊断试剂盒上市获批。药品审评部门与医疗器械审评部门可以协同审评，促成药物与试剂同期上市。试剂盒获批后可以与一款或几款药物一起推广，也有望降低检测公司的销售费用。

今年9月，泛生子与基石药业联合开发的“人PDGFRA基因D842V突变检测试剂盒”获国家药监局批准，可检测胃肠间质瘤患者的PDGFRA基因突变，用于阿伐替尼（商品名：泰吉华）的伴随诊断。

此外，检测公司还可以与药企合作在药物研发早期提供NGS检测，挖掘新药靶点，探索耐药机制，或者进行患者精准招募。检测公司可以向药企收取一笔服务费，也可以轻服务费或不收服务费，以风险绑定的形式，等到新药上市后进行销售分成。具体采用哪种模式，要看公司对药物未来商业化的判断，要不要与药企做长远的利益共享。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临检业务上各公司陷入激烈竞争，也存在不合规风险，药企合作业务更具合规性。伴随诊断的市场是院内市场，一款试剂盒能和多少款药物建立伴随诊断关系，这是入院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源头。某检测公司高层高欣（化名）告诉财新，药企合作业务占公司的营收比重约三成，资金量级约在千万级别，公司的投资人

更看重此类“壁垒高、差异化强”的业务。

由于刚起步，药企合作在检测公司营收中占比不高，但增长较快。据燃石医学年报，2021—2022年，药企合作分别实现收入2339.3万元、7317.2万元，2023年上半年，药企合作收入5534.5万元，增长迅速。药企合作的毛利率约在70%左右浮动，低于院外业务，与院内业务相差不大。

随着创新药、新靶点越来越多，以及肿瘤发病人数增加，NGS肿瘤基因检测是刚需。不过，行业正面临残酷淘汰赛。田埂表示：“下半场的序幕已拉起，玩法要改变了。”这个诞生于临床需求，成为资本宠儿，如今又坠入寒冬的行业，开始回归冷静、理性与合规。

钟靖表示，NGS肿瘤基因检测存在一部分过度医疗，一部分临床证据不足，最大的问题是销售费用。“但这本身并不是NGS技术的问题，过去几年NGS过热造成一些弊端，中国也掌握了自主的NGS设备，在摒除弊端后行业会更好地前进。”

受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对行业仍保持谨慎乐观——只要需求还在，行业就不会消失。“未来比拼的是谁技术更好，被更多的医院看上，被资本方看上，能够续命。”刘畅说。

版面编辑：李东昊

回溯｜一周回溯（《财新周刊》2023年第40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一周回溯

10月12日，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江西南昌召开，习近平强调，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这是近八年召开的第四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10月9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代表团。





10月8日，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闭幕，各国运动员累计15次打破世界纪录、37次打破亚洲纪录、170次打破亚运会纪录；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201金111银71铜，共383枚奖牌，取得亚运会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10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23年年会在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开幕。这是该年会1973年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后，50年来首次重返非洲举行。



10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和《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

10月10日，二十届中央第二轮巡视对象公布，将对科学技术部等31家单位党委（党组）开展常规巡视；对国家铁路局党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开展巡视“回头看”。

10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测荷兰、德国、奥地利等几个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接近停滞。

10月5日至6日，第三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以及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召开，就安全、移民、扩盟等议题展开讨论。

10月8日，为期12天的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5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4.7万人次。

10月9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延期的公告，将调查期限延长3个月，截止日期为2024年1月12日。

10月10日，针对菲律宾海军一艘炮艇侵闯中国黄岩岛邻近海域，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船依法对菲船采取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10月5日，叙利亚中部霍姆斯省一所军事学院举行毕业典礼时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89人死亡、277人受伤。目前尚无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10月9日，有不明身份人员驾车暴力冲撞闯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证件大厅，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击毙。

10月8日，湖南省道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唐慧、唐世科寻衅滋事案，被告人唐慧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人唐世科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对被告人唐慧、唐世科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万元予以追缴。

10月10日，就网友“北极鲶鱼”发布言论引发关注一事，相关部门决定给予深圳市原交通局货运管理分局局长钟庚赐开除党籍处分。

10月4日，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举行视频会议，建议“欧佩克+”成员维持当前石油减产政策不变。

10月10日，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85元和80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L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3.5元。

10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籍前议长南希·佩洛西被逐出国会办公室，此举“推手”是其共和党籍继任者凯文·麦卡锡，以报复民主党人站在共和党极端保守派一边共同把麦卡锡赶下台。

10月4日，国际足联宣布，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同时获得2030年世界杯主办权，举办城市横跨欧洲与非洲。



10月3日，一辆大客车从意大利北部城市威尼斯附近的一座高架桥坠落后起火，造成至少21人丧生。

10月8日，德国执政联盟三党在黑森州、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遭受惨痛失利，主要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以及德国选择党成为赢家。

10月9日，苏丹外交部宣布，在断交7年多后，苏丹与伊朗决定恢复外交关系。

10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调查人员在8月发生在特维尔州的坠机事故遇难人员遗体内发现手榴弹碎片。俄私营军事实体瓦格纳组织创始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在这起坠机事故中遇难。

版面编辑：李东昊

前瞻丨日本召开临时国会讨论经济对策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当地时间2023年6月6日，日本东京，一名员工(右)在超市里切水果。图：视觉中国

文丨财新周刊 陈立雄 （发自日本东京）

日本政府拟于10月20日召集临时国会，应对物价上涨等经济话题将成焦点。预计首相岸田将于当日到场发表施政演说，并于10月23日至25日接受朝野政党代表质询。目前，执政党内还出现了将国会会期定为12月上旬结束的方案。

岸田政府计划10月底前出台一套经济政策，包括五项核心内容：应对物价上涨；持续性涨薪和地方经济增长；促进国内投资；应对人口减少；国民安心和安全。岸田称，政府将向受物价上涨困扰的国民“妥善回馈经济增长的成果”。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则透露，政府可能通过减税措施将税收增加部分直接返还给国民。

据日媒报道，在本届临时国会期间，岸田政府将优先编制为本次经济对策提供支撑的2023年度补充预算案。由于编制工作需要三周，该补充预算案计划于11月中旬提交国会，并有望于11月下旬通过。

围绕经济对策，自民党内有意见认为，政府有必要实施消费税和所得税减税等积极财政政策。他们坚称财政破产的可能性“毫无根据”，并呼吁制定规模为2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万亿元）的补充预算。但也有分析认为，若预算持续膨胀，岸田政府的财政健全化举措或大幅倒退。接下来，预计自民党内财政积极派与财政纪律派之间的争论将升级。

在临时国会上，各政党还将讨论内阁成员的政治资金问题，以及福岛核废水排海等议题。除了补充预算案，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与公明党还计划通过国家公务员薪水改正案等十项法案和条约案。

日本朝野关注，岸田会不会在本届临时国会结束之际，宣布解散众议院并举行大选。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此前暗示，减税或构成解散众议院的由头，引发外界猜测。时事通讯社援引一名自民党干部说法称，“早期解散派和解散阻止派正在相互博弈”。另有政府官员对富士电视网（FNN）称，“看上去要解散但不解散，这种做法最有效果”。

日本共同社的分析则认为，鉴于下半年日程安排，岸田政府年内解散众议院的可能性下降，大选可能要等到明年以后。12月中旬，日本与东盟将在东京举行特别首脑会谈。

岸田刚在9月中旬改组内阁，但支持率仍然低迷。据日本朝日电视新闻网（ANN）9月23日至24日实施的调查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连续五个月下降，已跌至30.7%。岸田作为自民党总裁的任期将于明年秋季结束，因此他能解散众议院的时间窗口在缩小。10月22日，日本还将举行国会众议院长崎4区、参议院德岛与高知选区的两场补选，其结果料将左右岸田是否解散众议院的政治判断。

版面编辑：李东昊

国风丨艺拍市场遇冷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的肖像画《宝利特·茹丹肖像》在拍卖中。图：苏富比官博

文丨财新周刊 王小青（发自香港）

国际拍卖行苏富比（Sotheby's）在中国香港秋拍期间为收藏家刘益谦与妻子王薇举办的专场拍卖会遇冷，39件藏品中多达10件流拍，成交的拍品中有5件低于公开估价。

苏富比香港于2023年10月5日18时举办了上述名为"龙途：刘益谦与王薇伉俪收藏"的专场拍卖会，拍出的29件藏品总成交额为5.45亿港元，约合7000万美元，远低于苏富比起初9440万美元的预估额。

其中，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的肖像画《宝利特·茹丹肖像》作为领衔拍品，以2.72905亿港元成交，也是整场唯一上亿元的拍品。然而，该拍品虽未提供公开估价，本次成交价较刘益谦于2015年11月在苏富比纽约4281万美元（约合3.34亿港元）的上一手成交价跌幅达18%。

总体而言，本场39件拍卖品，总成交率74.4%，其中25.6%拍品超估价成交、36%拍品在估价范围内成交，12.8%拍品低于估价，25.6%流拍。

流拍作品包括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估值达4200万—5500万港元的《狮子的图像》、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估值4000万—6000万港元的《裸女与猫》、赵无极估值3200万—5000万港元的《10.03.78》和草间弥生（Yayoi Kusama）估值2200万—2800万港元的《献给天空诉述我心声的花朵》等，均是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纽约机构Artvest的艺术金融顾问Michael Plummer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称，此次拍卖结果让人们对中国竞拍者在今年秋季晚些时候的纽约拍卖会上的活跃程度产生疑虑。他坦言，在此次拍卖前就担心，拍卖结果加重了忧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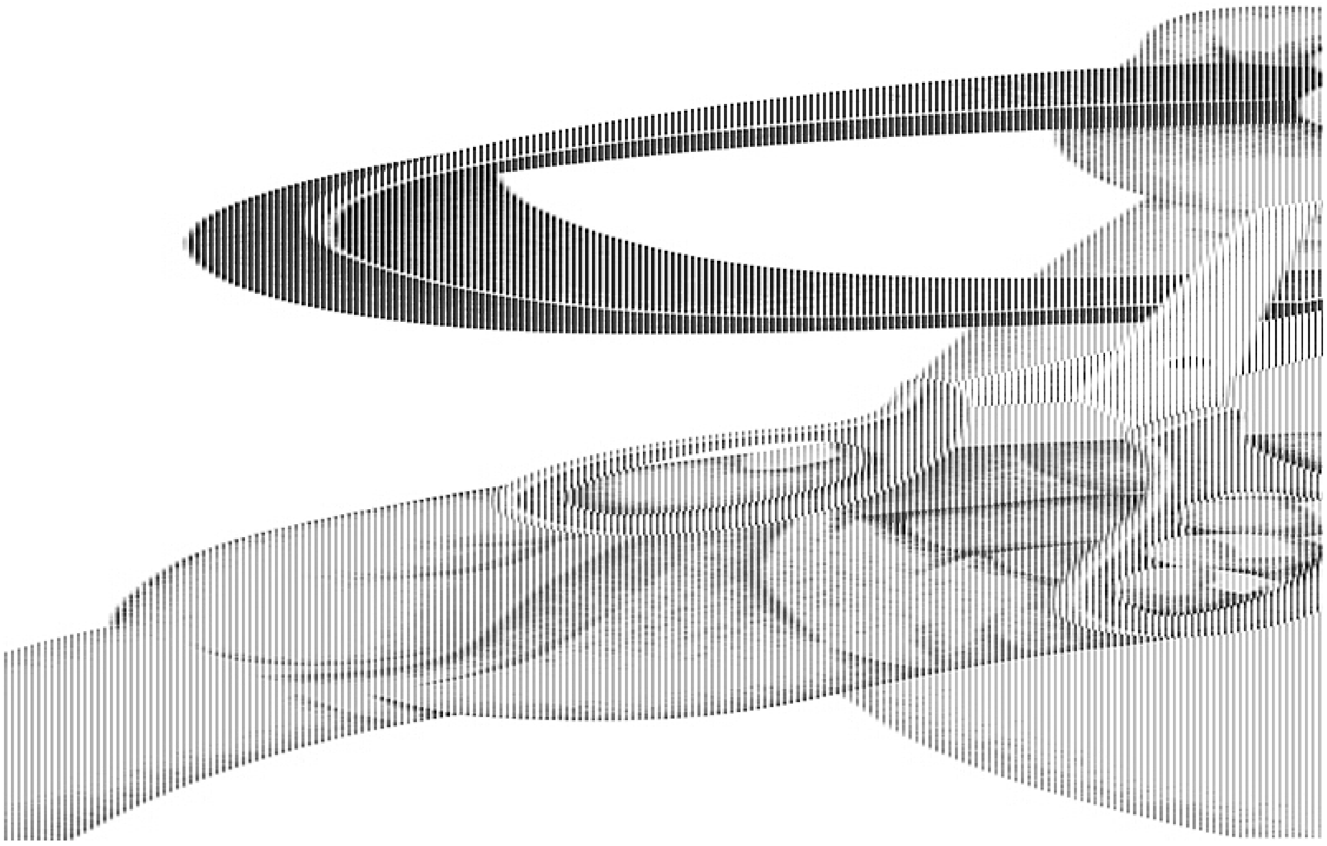
2014年，刘益谦在香港苏富比以2.8亿港元天价拿下成化斗彩鸡缸杯，一战国际知名；2015年，他以1.704亿美元的价格在另一国际拍卖行佳士得（Christie's）拍下莫迪利亚尼的作品《侧卧的裸女》，高调涉足西方艺术品，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知名度。刘益谦与王薇在业界更为知名的是在2012年创办龙美术馆，在上海和重庆均设场馆，展示他们对传统亚洲和国际艺术品的收藏。

如今这对备受瞩目的中国藏家夫妇一次性拍卖39件藏品，且拍卖结果令人失望，使人担心中国富豪未来在艺拍市场上的购买力。也有分析指出，在全球高息环境维持更长时间的市场共识之下，不仅风险资产感受到压力，对全球艺术品市场亦不利。此外，中国经济复苏未如预期、房地产行业仍未能摆脱困境，亦令业界担心作为新兴动力的中国藏家也难以在艺拍市场一掷千金。

版面编辑：李东昊

心智丨人为什么要嫉妒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插画丨董必奇

文丨蓝玲

不仅大人会嫉妒，6个月大的婴儿，就会表现出嫉妒。研究中，一个婴儿会因为自己的母亲被其他婴儿抢走关注而愤怒，以至于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不得不用人偶代替真正的婴儿。

婴儿没有很好的自我调节能力，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自然无法控制因嫉妒引发的复杂情绪和行为。在这一阶段，如果大人能及时安抚，帮助他们平复情绪，让难过的感受得到控制和调节，就能逐渐学会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形成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那么，他们长大后即使还会嫉妒，也能自我控制和调节。

社会心理学将嫉妒分为两类：怀疑性嫉妒和反应性嫉妒。

怀疑性嫉妒是指由个人主观猜测而产生的嫉妒。它并非基于真实的事件，只是因为对他人的行为怀疑、不信任，感到焦虑、害怕、担忧、不安，所以会体验到怀疑性嫉妒。这种嫉妒常常源于个人的不安全感、自卑或自我负面评价。例如，在二孩家庭，当一个孩子认为父母对资源、精力和关爱分配不均时，感觉不公平，就会产生怀疑性嫉妒。

反应性嫉妒是由真实事件唤起的嫉妒。它是因现实的威胁而产生的，这种威胁不一定是当前的事件，它可能发生在过去，也可能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例如，父母对一个孩子说，你没有妹妹听话，爸爸妈妈以后不爱你了。

反应性嫉妒和怀疑性嫉妒的主要区别在于，嫉妒情境有没有真实发生。但是，这种区别有时也界限模糊，不管大人或者小孩，都会因为一些真实的事件过度怀疑、猜忌，又会因此表现出无理取闹、挑剔偏执等行为，这样，怀疑性嫉妒最终就会导致反应性嫉妒。

从嫉妒的定义可以看出，嫉妒产生于社会比较的情境。社会比较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我们总会无意识地比较自己与别人。向下的社会比较会让人感觉良好，体验到积极情绪，而向上的社会比较，就容易让人感觉自己处处不如别人，产生嫉妒等消极情绪。嫉妒容易受到一些社会比较相关的因素影响：

第一，相似性。被嫉妒者与自己越相似，个人体验到的嫉妒感就越强烈。我们说有些人见不得人好，往往就是见不得身边的人比自己好，比如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一些极端社会事件，就是因为嫉妒身边的人比自己优秀，心里不平衡，从而做出违法行为。

第二，自我相关。比较的领域与自己强相关，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个人在不利比较时体验到的嫉妒感就越强烈。有研究发现，那些与个人相关程度较低的，虽有相似性，但也只会引起羡慕或为他人自豪这些与嫉妒相反的情感。

第三，控制感。人在嫉妒时，通常会伴有低控制感。当发现自己没法像别人一样优秀时，可能会嫉妒，但是，如果觉得自己也能够通过努力变得优秀，则更可能会产生积极奋斗这样的正面情绪。

第四，不公平感。社会心理学的嫉妒理论对由不公平感引发的嫉妒极为关注，在大量的分析中，不公平感都与嫉妒有关。不公平感可以分为主观不公平感和客观不公平感。

主观不公平感是个人的不公平感觉。例如，为什么同学从不努力学习，成绩却总是比我好；为什么同事总是上班摸鱼，工资还要比我高。这些认为他人的优势来源不公平的主观不公平判断，就是主观不公平感。

客观不公平感是由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引起的。例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男尊女卑”等不公平的文化习俗，或者人为制造出的不公平现象。

客观不公平感是一种消极情绪，它不仅是个体体验，也是群体体验，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可称之为“公妒”，不能简单地和嫉妒相提并论。培根在《论嫉妒》中认为公妒是有好处的：“是在有些人变得太位高权重的时候压抑他们的。因此，公妒对于大人物们是一种控制物，可以使他们不至超越范围。”

社会心理学家从社会比较的角度研究嫉妒，进化心理学家则从进化环境资源竞争的角度研究，让我们更明白嫉妒的起因。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嫉妒是有社会适应功能的，是为了解决进化环境中反复出现的资源竞争问题。人类进化以生存和繁衍为核心动力，但是，环境中用以生存和繁衍的资源有限，例如食物、领地、配偶，为了获取足够资源，人必须竞争。嫉妒，就是人在竞争资源处于下风时体验到的一种负面情绪，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获得竞争优势或瓦解对手的竞争优势。这样做有用吗？

嫉妒通常含有敌意，敌意就会促使人们采用手段降低他人获得资源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比如通过造谣或诋毁破坏他人的社会名声或人际关系。这就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类在婴儿时期就会表现出嫉妒，因为它就是与生俱来的；为什么说高相似性与强自我相关会让人体验到更强烈的嫉妒，因为他们更有可能与自己竞争相同的资源，影响自己获得资源。

我们习惯认为嫉妒是一种负面情绪，它确实也会影响幸福感，但它既然具有社会适应功能，就有积极的意义，比如，合理利用它刺激竞争意识，让它成为提升自我的动力。

嫉妒也是一种自我防御，帮助我们维持积极的自我评价。我们在社会比较中感觉比别人差时，就威胁到了个人对自我的积极评价，就需要去整合。或者抬高自己，认为自己并没有那么差；或者贬低他人，认为他们没那么好，使自己始终能维持积极的自我意象。当然，如果你不想过多地体验到嫉妒，那就尽量减少社会比较吧。

更多精彩请阅读：【专题】心智

版面编辑：李东昊

天眼丨印度特快列车脱轨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图丨Aftab Alam Siddiqui/视觉中国

据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1日晚，一列特快列车在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一个车站附近脱轨，造成至少4人死亡、70多人受伤。印度东部中央铁路公司总经理塔伦·普拉卡什表示，受伤乘客已被送往附近医院。由于铁路线路陈旧、年久失修，印度列车脱轨及相撞事故高发。印度东部奥迪沙邦今年6月曾发生一起严重的列车脱轨相撞事故，造成288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

版面编辑：李东昊

回声（《财新周刊》2023年第39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石沉溪洞猪妖：去缅北的人不少就是奔着干诈骗的。同情那些被抓去的同胞，也希望甄别一下回来的人，不放过一个坏人。

《围剿跨境电诈》

ghostday：如果国内就业环境好，这些年轻人不一定要出国搞电信诈骗。犯罪问题一般与社会问题相关，治标的同时别忘了治本。

《围剿跨境电诈》

沧浪纪：立法全过程公开可以从法律共同体（检察院、法院、律师）以及执行该法的执法者开始，逐步扩大全过程公开范围。

《开门立法须更进一步》

元景阳：信心不是喊出来的，甚至不是发文给些政策支持出来的。一个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凸显无遗，需要更大决心、更多勇气、更强手腕，我们拭目以待。

《企业信心仍待提振》

版面编辑：李东昊

读周刊看视频（《财新周刊》2023年第40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电诈犯罪窝点在境外逐渐发展成以工业园区、科技园区为幌子的超大犯罪集团，衍生的人口贩运犯罪危害性与日俱增。一场多方合作的跨国执法行动正在展开——@《财新周刊》《围剿跨境电诈》，相关视频：中柬警方合作17名电信诈骗嫌疑人被押回国

生成式AI落地银行业，短期靠创新能力，中期靠独有的数据将大模型调节得更加精准可靠，长期则需要依靠人才培养——@《财新周刊》《生成式AI如何改变银行》，相关视频：金融巨鳄德鲁肯米勒：AI影响力或堪比互联网

英特尔重拾钟摆战略，发力AI应对英伟达，加码制造追赶台积电，中国市场迂回中进取——@《财新周刊》《英特尔重整旗鼓》，相关视频：分析人士：英特尔业绩低迷或波及其他大宗商品

“投资印尼虽然危险，但令人上瘾”——@《财新周刊》《印尼引力》，相关视频：2017年9月，来自中国成都的大熊猫“彩陶”和“湖春”抵达印尼

版面编辑：李东昊

财新视听内容精选（《财新周刊》2023年第40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华尔街原声】

美国劳动力短缺和通胀风险将持续存在/美国信用卡拖欠率上升 或影响零售业收入

【商旅对话】 西门子CTO： Xcelerator平台能做什么

西门子股份公司首席技术官兼首席战略官谈西门子Xcelerator平台如何帮助企业释放数字化转型潜力

版面编辑：李东昊

答疑（《财新周刊》2023年第40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联系编辑部：邮箱newsroom@caixin.com或电话（010）8590 5000

北京读者 阳鼎：

10月10日，欧盟决定《联合体集体豁免条例（CBER）》于2024年4月25日到期中止，这将对集装箱航运业带来哪些影响？

本刊产业新闻部：

CBER是针对往返欧洲航线的船舶共享协议（VSA）实施的立法，允许不同航运公司之间建立联盟或联营，共同运营航线服务，以促进竞争和降低运输成本。集装箱航运业作为较为特殊的垄断行业，总是被赋予垄断豁免的特权。欧盟对豁免始终持谨慎态度，CBER每次到期前都会被审查。

在2022年8月启动新一轮审查程序后，欧盟最终决定中止CBER。欧盟公布的审查结果称，从利益相关者那里收集的证据表明，疫情期间，CBER的有效性和效率很低或有限。

航运咨询机构Alphaliner数据显示，因并购和头部公司不断购入运力，全球十大航运公司的运力份额已经从2014年的61%增长到当前的85%。三大航运联盟在亚欧航线的运力份额超过95%。

一位业界资深人士认为，CBER到期并不能绝对阻止船舶舱位共享协议和联盟，但会使它们更难运作，对市场也将产生复杂影响。价格波动将更显著，缺少稳定合作的航运公司可能通过打价格战吸引客户并争抢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目前的航运联盟格局也在动摇。与当下三大联盟内部紧密结构相比，未来航运公司可能接受的新组合是一种相对非正式的关系，部分原因是监管审查力度加大。

版面编辑：李东昊

显影｜当修缮长城的人老了

摄影/撰稿 | 郑新洽（特约）

长城的保护观念和修缮技术在更新，但手艺传承却后继乏人

赶着骡子修长城

8月，北京连日的大雨让长城修缮工期暂缓了一周。雨过天晴后的清晨五点半，白雾在山林和屋舍间浸润。长城脚下距施工点两公里处，工人们吃完早餐，整理装备上山，重新投入到长城修缮的工作中。

同工人们随行的还有4头骡子，每头骡子都驮着300斤修缮用的物料，包括白灰、城砖、施工用具等。工人们用麻绳将整袋白灰捆在骡子的驮架两侧，并在骡子腹部用绳子拴个结，防止货物滑落。4头骡子前后列队，背上满满当当。



2023年7月，北京怀柔西栅子村，箭扣段长城修缮队的工人将白灰搬至骡子背上。每头骡子驮着300斤修缮用的物料，包括白灰、城砖、施工用具等。



即便是科技发达的现代，位于山脊的长城修缮依然得像古代一样，骡驮人扛、输送物料。



在虫鸣鸟啼的密林里爬坡约一小时后，工人们抵达长城修缮工程地，卸下物料稍事歇息。

“嘚嘿……喔嘿……走走走……等啥呢……走了嘿……”赶骡子的声音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飘荡。骡子认路，沿着既定路线爬坡前行，偶尔顿足从道旁扯一撮嫩叶进嘴，边走边嚼。即便是科技发达的现代，位于山脊的长城修缮依然得像古代一样，骡驮人扛，输送物料。在虫鸣鸟啼的密林里爬坡约一小时后，坡势放缓，长城出现在眼前。

这是著名的箭扣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西北的八道河乡境内，海拔1141米，全长近10公里，因形如满弓扣箭而得名。其修建于明代中期，在古代占据险要的军事地位。



2023年，箭扣段长城修缮队的工人站在敌台上。崇山峻岭中，长城依然保持着险峻而沧桑的风貌，初来乍到的人们很难察觉这里刚经历了修缮工程。

长城这样的石造巨物，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坚固恒久，但随着斗转星移，仍面临严重的自然风化，逐渐变得脆弱。作为未经开发的野长城，箭扣长城在驴友圈闻名已久，却也是事故多发的地段。历年来，驴友迷路、求救、失踪，甚至伤亡事故时有发生。

2016年，箭扣长城启动修缮工程，至今已完成4个工期，共计修缮5004米。67岁的程永茂是箭扣长城修缮的技术负责人。已修了近20年长城，也参与过天安门城台、红螺寺、太庙、鲁迅故居等重点工程维修保护的他坦言修长城与其他工程有很大的不同：“长城在山上经历风吹日晒，草木生长，很难把其像故宫一样保护起来。我们能做的，是延缓它遭受侵蚀的过程。我们保护好了，它能留给人类的时间就更长。”



2023年8月，北京延庆，土长城——双营古城城墙。该段长城保存相对完整，与新建的村庄相交融。



村民在城墙边种植玉米。



村民在城墙下自由通行。



有倾倒危险的部分则用铁架防护。

加入考古 修旧如旧

近些年，曾在争论中处于下风的“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理念，今天已基本成为长城修缮工作者的共识。2019年，《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2018年至2035年）》公布，“预防为主、原状保护”是《长城保护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原则。这意味着，现在长城修缮，都要求最小干预，保持“野味”。

在完成一期修缮工程后，2018—2019年，程永茂负责的工程二期箭扣南段长城保护修缮转而开始多用旧城砖，同时引入了考古环节，这也是长城修缮项目中首次介入考古清理。此外，按照以前的修缮要求，为保证长城的完整，在城墙上扎了根的树都是要被清理的。现在经评估对城墙健康没有影响的树，在修缮过程中都会尽量保留。



2022年，箭扣段长城上的苔藓在修缮中被保留。



箭扣段长城上的树木在修缮中被保留。

2022年8月，箭扣长城考古发现首次对外公布，考古学家首次在敌台顶部的铺房内发现明代火炕和灶台这类生活设施遗迹，不仅与明代传世文献《皇明世法录》的记载相吻合，而且复原了明代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

箭扣长城考古项目负责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尚珩介绍，考古发掘最直接的目的是为长城保护方案的制定提供全面、系统的科学依据，“长城虽然是古建筑，但更多是以遗址的方式存在，很多部位没有显现出来，做保护的前提是要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知”。



2022年8月17日，北京怀柔，箭扣段长城考古发现首次对外公布，现场展出了长城建筑构件、士兵生活物件、武器等文物。不仅与明代传世文献《皇明世法录》的记载相吻合，而且复原了明代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



现场展出的武器。



现场展出的长城建筑构件。

“没有年轻人愿干这么辛苦的活儿了”

如今，长城的生命周期在保护下不断延续，修缮长城的人却面临着断档。中国国家统计局2023年4月28日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9562亿人，比上年增加311万人。但其中从事建筑业的比重为17.7%，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在农民工的六个主要就业行业中降幅最大。有长城修缮知识技术又善走山路的建筑业农民工则更为稀缺。危险、辛苦，加上跟普通建筑业工人并无差别的工资（3000—5000/月），已少有新人愿意加入进来。

8月，连日的阴雨天气给施工增加了难度。大雾中，工人们需要绑上安全绳，从80度陡坡向下滑行，直至100米深山沟的石块掉落处，用牵引绳固定好500斤重的石块，配合牵引机器，将石块往上拖回原处，加以固定。另一拨人搬运整理归位的砖石，相互补配，用黏稠的灰浆将裂缝嵌实。

“这些岗位看不到年轻人。”程永茂工程队的50人中，年纪50岁往上的占绝大部分，工人们多来自河北丰宁、滦平山村，能吃苦耐劳，善走山路，“没有年轻人愿意坚持干这么苦的活儿了”。



程永茂到箭扣段长城查看工程进度，费力爬上敌台。如今已67岁的他仍然每周往长城跑两三趟。



被骡子背上山的白灰，通过绳索牵引至坡度更陡的修缮处。



大雾弥漫，工人们站在脚手架上，将掉落的城墙砖石重新配补嵌实。



由于上下山时间太长，工人们都在长城上吃午餐，一般为面和馒头。

相比普通瓦匠，长城修缮需“粗活细作”，工艺较为考究。长城修缮所用白灰为泼灰，要求焖至20天以上才可使用，严格控制熟化时间；常用的五种城砖，也由专门制作长城城砖的工厂生产。程永茂从多年施工经验出发，结合史料和传统瓦作技艺，对设备材料、施工流程、操作技巧等作出总结，如“五随”法：随层（修复处与相邻旧墙相同砖层、灰缝厚度一致）、随坡（与相邻旧墙同坡度）、随弯（与相邻旧墙同弯度）、随旧（新旧颜色一致）、随残（地面、墙体在安全前提下尽可能保留残状）。“这些技术，一线瓦工需要跟着学上两个月才能熟练，而工长、管理、质检等全能型技术人员，培养期需要5年。”程永茂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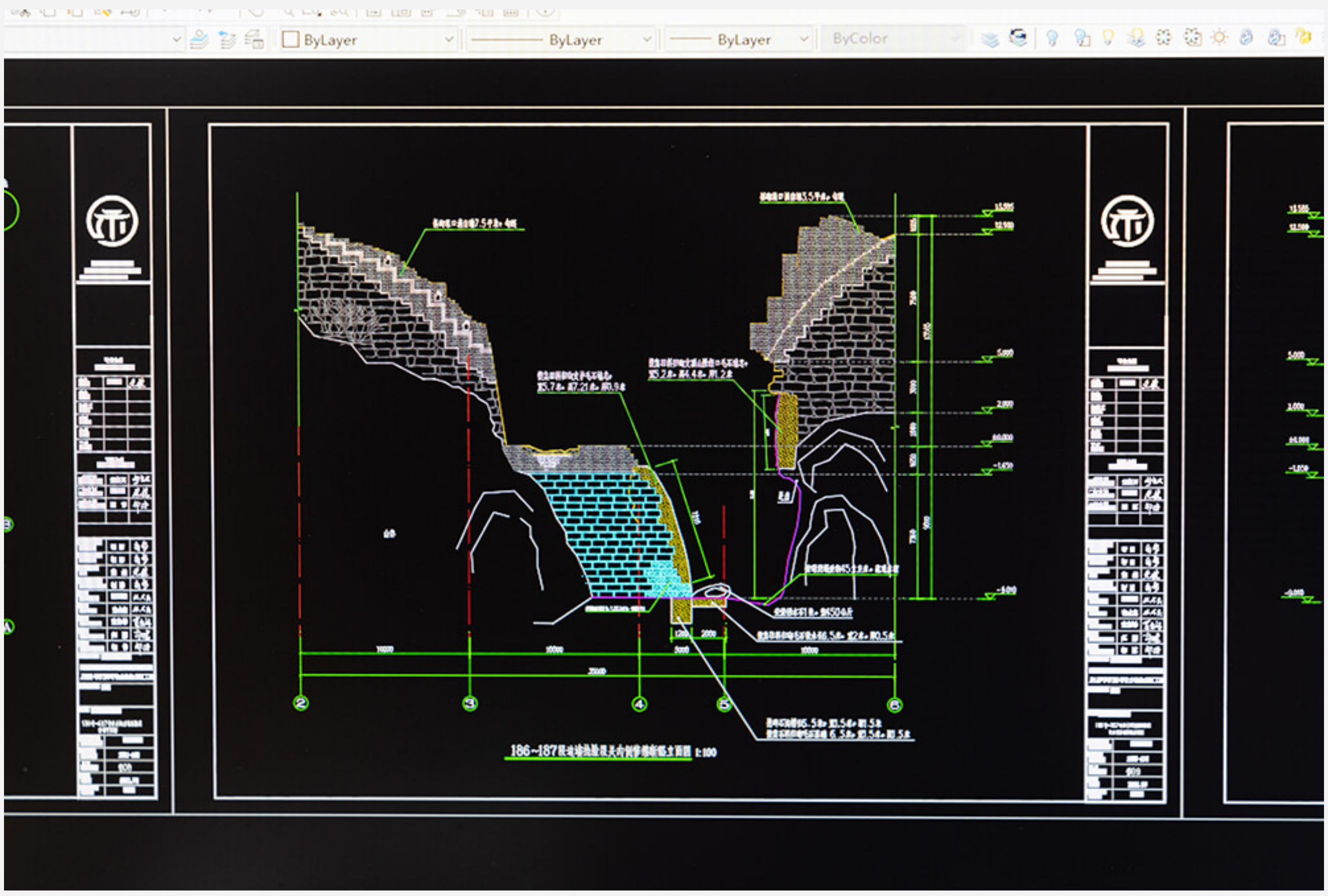
北京延庆八达岭段长城修缮工程队负责人张富林也遇到了相同状况，他所带的60人平均年龄超过55岁。身为延庆人的张富林在“家门前”修长城已有10年，10年来他手下的工人几乎没有变过，但他心里清楚，再过几年，一半的工人就干不动了。

比起程永茂和张富林，考古研究员尚珩面临的情况也令人担忧。今年39岁的他，年纪倒还算较轻，但北京考古研究院里负责长城考古的只有他一人，“全国参与长城考古的人合起来不超过50人，而考古专业的学生们对长城考古普遍兴趣不高。相比于宫殿、古墓等考古项目，长城考古挖掘出的文物较为常规，成就感不高，而且长期需要爬山，还是太辛苦了。”尚珩见证了这些年长城保护修缮理念的更新和进步，但长城保护的历史欠债很多，保护长城的人员依然非常紧缺。过去20多年他徒步考察全国各地的长城，部分已经塌陷、损毁，一部分长城上的文物也遗失了。在尚珩看来，长城研究和保护已经是一个多学科甚至全学科的范畴，需要古建、材料、植物学等多领域的人才。

天色渐暗，箭扣段长城几十名工人带着一身疲倦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们要步行半个多小时才能下山回到宿舍。与此同时，北京市怀柔区程永茂的小办公室里仍然亮着灯，年逾花甲的他坐在电脑前，添加施工节点的CAD绘图，鼠标旁的烟灰缸里堆着十几个烟头。



2023年7月，北京怀柔，程永茂坐在电脑前，用CAD绘制施工节点详图，协调布置施工任务。



施工节点详图。

本次箭扣段长城敌台抢险修缮即将完工，第五期修缮工程正在筹备之中。崇山峻岭中，长城依然保持着险峻而沧桑的风貌，初来乍到的人们很难察觉这里刚经历了修缮工程。

已过退休年龄的程永茂很多事务依然得亲力亲为，每周往返长城两三趟。电脑前，他取下老花镜放在键盘边，“希望有更多对修长城有热情、能吃苦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程永茂的办公室里放着许多拐杖，是他爬长城路上随手捡的木条做成的。

图片编辑 | 董德

开篇图说：2023年8月，北京延庆，八达岭段长城修缮队对 60—64号敌台段修缮。修缮队负责人张富林介绍，他所带的60人平均年龄超过55岁，10年来他手下的工人几乎没有变过。

财新

随笔｜福瑟的文学之旅：无法言说的，即在寻求表达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他的作品已经尽量地剥离了外在的属性，只剩那些最本质的、最存在主义的——平静与不安、死与生、对孤独的渴望或焦虑、对不孤独（或者一起孤独）的渴望或焦虑



2023年10月5日下午，挪威作家、诗人、戏剧家约恩·福瑟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随后在挪威西部小岛弗雷豪于格接受采访。图:Eirik Hagesaeter

文｜李澍波
作者、译者、媒体研究者、挪威非虚构作家协会成员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5日午后1点，斯德哥尔摩一扇镶着金边的白门打开，代表瑞典学院全员18人的常务秘书，宣布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现年64岁的挪威作家、诗人和戏剧家约恩·福瑟（Jon Fosse）——因其“以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体作品为不可言说之物发声”。

约半小时后，挪威西部小岛弗雷豪于格的码头上，穿着皮夹克的福瑟双手抱肘，接受诸媒体采访。挪威国家电视台记者问获奖对他今后写作会有什么影响，福瑟说：“不大，我12岁开始写作，第一本书在40年前1983年出版，写作已成为我的存在方式。”当被问到，你平时住奥斯陆，今天却在弗雷豪于格，是特意躲过来的吗？福瑟说：“差不多，不过我也喜欢这里。得这个奖，我为自己高兴，更觉得这是给新挪威语的奖，新挪威语值得拥有诺奖，而这个任务落到了我身上。”

新挪威语的音色

福瑟在弗雷豪于格买下一间度假屋时，算是在新挪威语土地上给自己找了个定居点。从这往东开105公里，车程1小时左右就到了他长大的地方，哈当厄尔峡湾之侧的福瑟-斯特朗德巴姆。

12岁的约恩·乌拉夫·福瑟每天练吉他可长达10个小时，像疯了似的。别说镇上的人，假使今天的我穿越回1970年的这个小镇，也看不出这孩子会和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联系——挪威语和英语成绩在班上垫底，喜欢和朋友踢球甚于读书，交不少女朋友。

但细究起来，这个圆脸男孩与64岁的福瑟之内在已经相当一致：他在7岁时经历过一场意外，他记得那离死亡很近时平静、喜悦的状态，并认为这是他童年最重要的经验，它塑造了作为艺术家的自己，这个认识迄今不变；他从12岁开始自学弹吉他，夜以继日，水平提高有限但乐此不疲，这和后来敲打字机时的投入是一样的；他组乐队、写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排练上，毫不介意有没有演出机会，因为对他来说，搞摇滚和写作一样，主要都为了自己。

福瑟在2022年9月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谈道，就在十二三岁写那些歌时，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也是“通往未知世界的通道。我得走到我思想的边界，穿过那个边界”。在这个空间里，他不再是男孩约恩·乌拉夫，也不是作家约恩·福瑟，而是一个在写作着的无名的我。这个空间扩展成了其作品中一个个新的宇宙，构建了福瑟恢宏的文学之旅。



Novellekonkurransen

Novellekonkurransen

Juryen:

Vinneren:

Jon Fosse:

HAN

福瑟在大学时代得到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创作奖，奖项由《西部学生》报组织。

从福瑟在弗雷豪于格的家，搭渡轮过峡湾再开车上公路，31分钟后就到了卑尔根。在这个西挪威文化商业政治中心，福瑟度过了本科、硕士和大半写作生涯。他是20岁的大学生和奶爸，和女友及儿子住在学生公寓里；他读海德格尔、德里达、本雅明和阿多诺，奋力笔耕给报刊写文学评论，稿费和文学奖金是学生贷款和奖学金之外的重要收入来源。进入以卑尔根大学为中心的新挪威语知识分子圈后，他的新挪威语写作从自发变成了自觉。福瑟在《我亲爱的新挪威语》里写道，“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书写着新挪威语的人，”他说，“我爱我的语言，这可能是我这辈子与之链接最深的东西，要我去解释为什么用新挪威语写作会让我觉得耻辱，因为这几乎就等于要我去解释我为什么要存在一样。”

福瑟的所有写作，不管戏剧还是小说，童书还是文学批评，那个写作着的“我”无疑说着新挪威语。新挪威语是19世纪一些激进挪威语言学家提炼出的一套保存各地方言特点、又体现和古挪威语历史联系的本土语，是挪威三种官方语言之一，另外两种是使用者占挪威人口85%的布克摩挪威语（Bokm?l）和主要在北挪威使用的萨米语。挪威文学创作就在这并行的几种语言中流淌。

在福瑟之前最重要的新挪威语写作者，阿尔纳·加博格（Arne Garborg，1851—1924）可以算一位。他办报纸，用当时被称为本土语（landsm?l）的新挪威语写书，其小说《农民大学生》（1883）、《疲劳的人》（1890）和《和平》（1892）分别代表加博格三个时期写作的风格：古典现实主义、前现代主义和自然主义。在《农民大学生》里，加博格提出了语言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大哉问，挪威方言传统里巨大的文学资源当如何被保护发展？语言自由即是政治自由。加博格在挪威民族建构过程里坚决捍卫新挪威语的地位。

在加博格及其太太作家、文化活动家胡尔达的奔走之下，专门上演新挪威语戏剧的挪威剧院（Det Norske Teatret）得以在1913年创立；加博格倡议在挪威各地兴建国立乡村高中，1916年起，这些乡村高中纷纷兴建起来，从西挪威扩展至北部和东部，不但给农村青年创造了高中日后受高等教育机会，更为新挪威语在中高等教育系统争得了一席之地。一个反面例子是，北挪威的原住民萨米人被强制挪威化，20世纪初大批萨米孩子被迫离开家庭，进入寄宿学校；他们中很多人基本听不懂挪威语授课，被剥夺了语言，也被剥夺了教育和文化身份。这种残酷的同化政策引发了1917年开始的大规模萨米人反抗运动。

新挪威语知识分子把发展这种语言视为自己的文化责任。加博格把多种文学经典译介为新挪威语，把《奥德赛》从希腊文翻过来，把《罗摩衍那》从梵文翻过来（与印度诗人阿察雅合作），把《浮士德》从德语翻过来，以及把挪威剧作家路茨维·霍博格的作品从“丹麦挪威语”（也即后来的布克摩挪威语）翻译为新挪威语。随后几代新挪威语文学领军人物，都在戏剧、诗歌、评论、童书、小说各领域“有写无类”，全线推进，从20世纪40—70年代中北欧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以及挪威新诗代表人物泰耶·维索斯（Tarjei Vesaas，1897—1970）到福瑟都是如此。在这诸多阵地中，以戏剧对于新挪威语的存在、丰富、传播作用最为核心，在每一次剧场演出中， 这种语言的合法性、美学意义和传播力都得到进一步强化。

小镇青年福瑟和剧场演出是隔膜的。那个小镇上，孩子们常去的是教堂和少年俱乐部。俱乐部的舞台被少年福瑟用作乐队排练，在高中前他几乎没看过剧场演出。因为新挪威语编剧人才一直稀缺，1985年11月，卑尔根国家剧场的总监组织了一个为期10天的编剧课，邀请新挪威语写作新秀参加。福瑟虽然文学批评硕士还没毕业，但已出版了两本小说，也在被邀学员之列。这个课程夜以继日地讨论和练习，极大加强了学员之间的凝聚力。在老师看来，

福瑟并不活跃，甚至有些被动，交的作品也不太成形。福瑟则认为，这是一段奇妙的经历，但是"已决定此生不写剧本"，也多次拒绝写剧本的邀约，由此得到"戏剧仇人"的绰号。但是，他还是于1993年应邀参加了由国家巡回剧院（Riksteatret）等几家机构主办的原创剧作大赛，一方面因为不好意思再拒绝，其次因为他手头紧。可是他拒绝交提纲，认为那是诗的反面，他只交了些样章，最终没有中选。福瑟却在写作剧本的对白中得到乐趣。他写得很顺，完成了这部《有人将至》的剧本，并卖给了挪威剧院，得到稿费11万克朗。演出非常成功，而福瑟的文学事业至此才真正起飞。

边界和异质空间的文学

声音，是福瑟进入表达的通道，也是理解福瑟写作的通道。童年时在夜间出去划船钓鱼，晦暗中的自然、同伴的动静，化成一抹抹音色渗入感知；他说，写人物时把人当作一种声音，人和人之间则是不同声音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处理好这些声音则交织成歌，再厉害一点就变成一部乐曲；他说，好的文学里有一种声音附着在文字上，它无法被简化为内容或形式，却关联着内容或形式的独特性质。他把这无法降解之物称为"文本的声音"（skriftsstemma），而文学之本质就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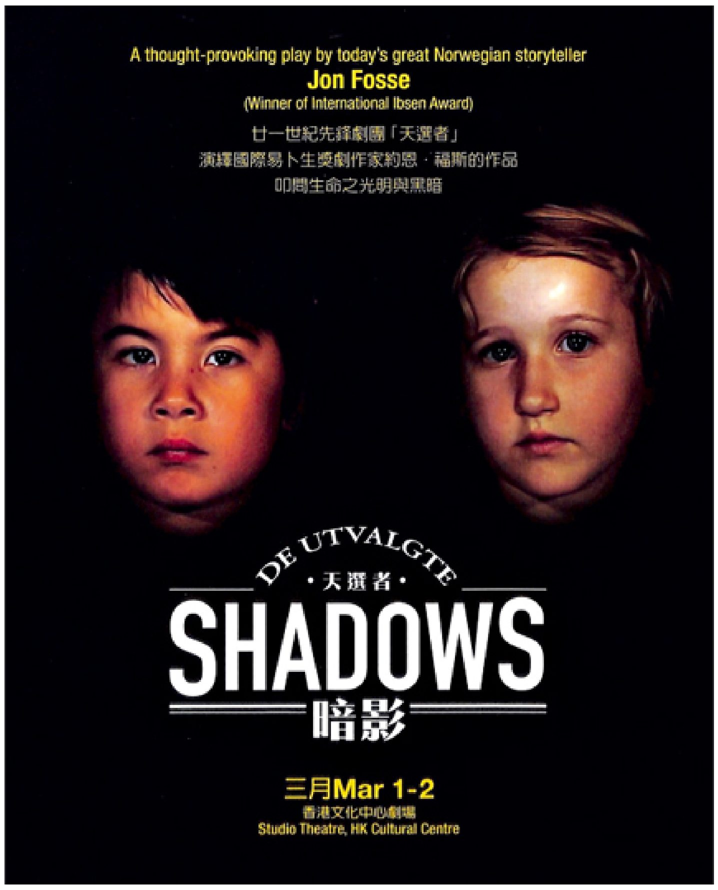
福瑟戏剧作品海报。

福瑟在理论上涉猎很广，也著有文论多部。小说创作伊始，他就持先锋态度，与上世纪70年代挪威主流的社会现实主义文学决裂。他的处女作《红与黑》借用了司汤达小说的标题，而他当时还没有亲自读过这本小说。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红色代表火焰和生命，黑色代表忧郁、死亡和焦虑，这就是书中主角15岁玩乐队的少年的情感维度。他在前辈泰耶·维索斯那里找到了灵感源泉。维索斯从上世纪40年代已经开始实验性写作，探索个人边界以及对边界的跨越，尤善于对青少年心灵状态的勾勒。维索斯的《大火》和福瑟的《晨与夜》，都援引可上溯到中古北欧诗《梦歌》（Draumkvedet）的梦幻诗（visjonsdikt）写作传统，将主人公置于一个内在真实和外在真实之间的边境地带。



福瑟戏剧作品海报。

福瑟写作中对自身经历的引用随处可见，如小说《三部曲》和剧作《名字》的主角都是未婚先孕的小两口。这种借用与其说是自传性的，不如说是构造一个如巴赫金所言的时空体（chronotope），在其中不但展开了每日生活的历险——也即历险时间和日常时间的结合融洽，更有中世纪民俗叙事——也即天真汉小人物如何挑战中世纪的垂直价值观。



福瑟戏剧作品海报。

无论在小说还是戏剧里，福瑟关注的不是情节推动和人物塑造，而是其时空体的建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福瑟的理由是“以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体作品为不可言说之物发声”。这里的不可言说之物到底是什么，可能没有固定答案。许多事物在被言说之前，都曾是不可言说的，比如女性在父权社会家庭框架中的感受，在多丽丝·莱辛之前可能是无法被言说的，直到莱辛赋予其文学语言。同样的话，可以用来形容非裔美国人的生命体验和托妮·莫里森的关系。



福瑟戏剧作品海报。

福瑟笔下所涉及的不再是社会现实的维度，而可能是一种对异质时空（heterotopia）的捕捉，就是那些真实存在并构成社会基础，却只能通过感觉来确定的场域。在福瑟这里，就是被抽象简化提纯后的“个体内在”和“人与人之间”这样一个场域，个体的呼吸和沉默，两人之间互相影响的呼吸和沉默，或者加入第三者后的呼吸波动和沉默，这些都是福瑟在戏剧和韵文作品中所赋予表达的对象。静默，在福瑟的时空构造里可能是最重要的元素。他的作品已经尽量地剥离了外在的属性，只剩那些最本质的、最存在主义的——平静与不安、死与生、对孤独的渴望或焦虑、对不孤独（或者一起孤独）的渴望或焦虑。各种形式、各种节奏、各种氛围的静默包围着寥寥对白和微乎其微的动作，构成了他独特的戏剧空间，使观众沉溺且抽离。



福瑟戏剧作品海报。

福瑟把自己的小说都称为Prosa，将其译为“散文体”不但不够准确，且可能有些误导。瑞典语和挪威语的Prosa并不像英语的prose那样是诗的反面并时刻准备向说明讲理奔去，prosaic更是平庸拖沓的婉称；prosa更接近无韵之诗，可能不按韵脚，但有口述的声韵和节奏，福瑟把自己小说称为prosa，即以注入诗性、音乐性、哲学感受、身体感受的叙事来构成文本。

我在翻译《三部曲》的过程中感到，福瑟是通过对所有人物在外在动作、言语上连续单调的描述，来传达这叙事中的心理深度、感情浓度和戏剧张力。因为福瑟极简主义的写法，以及新挪威语中强烈的口语性和单纯感，在把这个叙事转译成中文时，既有挑战又有奖赏。

挑战性在于，哪怕是很短的一段描述，其中也蕴含着节奏呼吸和动作，有气氛，有光影，有温度，有许多言外之意，最重要的是有沉默。如何把作者举重若轻的表达中这些丰富的部分，比如对身体感和节奏韵律的传达，转译为中文，就需要相当的斟酌和反复的打磨。

但是奖赏就在于，一旦找到了挪威文和中文的这种对应关系，就好像建立起了两个宇宙中的一个秘密通道，所有那些以前没有被连接的部分，建立起了新的连接，这个连接是译者的创造，而福瑟宇宙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福瑟的文学经纪说，福瑟在世界各地的译者都很爱他，他并不是一个难翻译的作家。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各种非语言表达的精妙运用，二是在于他的文本里非本质的文化特征和社会特征已经被剥离得相当干净，有效降低了文化转译的难度。

北欧文学内部

福瑟的学生克瑙斯高为其获奖欢呼雀跃，他说福瑟是真正的艺术家，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终究颁给艺术了。但是福瑟被提名诺奖已有多年，之前每年出版社都让福瑟在奥斯陆皇宫旁边国家为其提供的荣誉住宅里准备接受媒体采访，香槟也都就绪。陪跑多年，福瑟对“不拿奖”已感厌烦，所以今年干脆躲到弗雷豪于格的度假屋去，出版社也不再备好香槟，冰箱里只放了瓶苹果汁——看来这个组合利于得奖。

但是从果倒推因是容易的：20世纪80年代把福瑟小说陆续译成瑞典文的作家、译者斯蒂夫·森-桑德伯格，就是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6名成员之一。一直以来，瑞典文学圈、戏剧圈和一般读者对福瑟的接受程度是高于挪威的。在挪威读者还对现代主义文学视为畏途的时候，1988年福瑟的第二本小说《关闭的吉他》被瑞典大出版社伯尼尔慧眼识珠，翻译成瑞典文后，立即受到从评论家到普通读者的一致好评，挪威文化人必读的《日报》（Dagbladet）才开始登福瑟作品的书评。福瑟第三本小说《船库》在挪威和瑞典同时出版，《日报》才肯定了福瑟。而就在福瑟拿奖以后，《日报》刊出一篇标题为“福瑟：一个瑞典的发现”的评论，把福瑟形容为“在挪威还是一个难读的、受众较窄的作家”；文中引用瑞典文学评论家维克托·马尔默的话：“诺奖该颁给另一个挪威作家”，也就是挪威文学评论重要阵地《阶级斗争报》一直看好的达格·索尔思达。



福瑟在弗雷豪于格买下度假屋，算是在新挪威语土地上给自己找了个定居点。图：Helge Skodiv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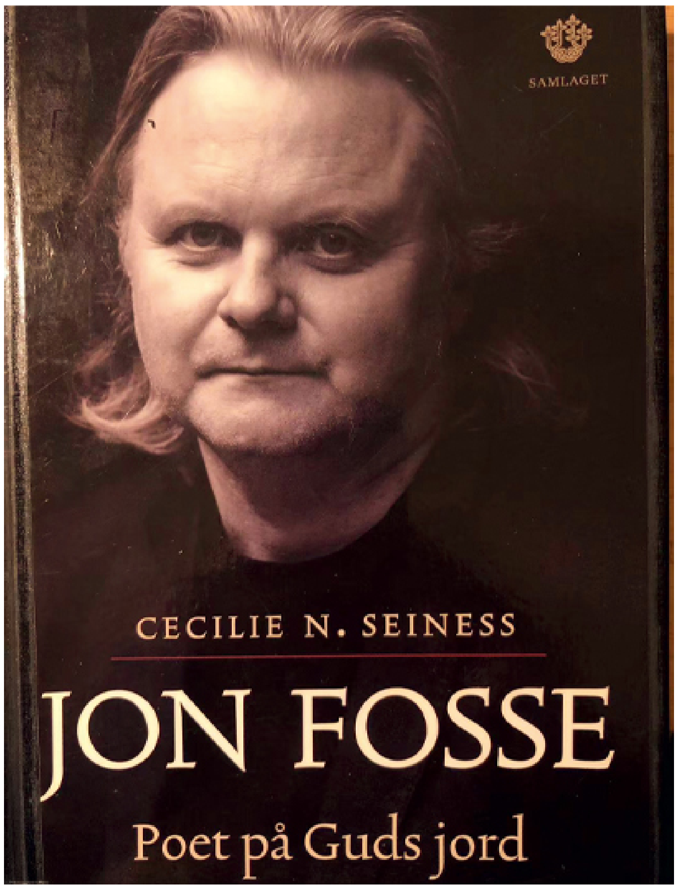
福瑟剧作《名字》在挪威剧院上演。图：Eric Berg/ DNT



福瑟剧作《一个夏日》中文版剧照。图：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瑞典戏剧界对福瑟的评价也从开头就非常高。买下福瑟第一个剧本的挪威剧院总监西西莉亚·奥勒维泽基是匈牙利人，来挪威前一直在瑞典马尔默城市剧院任戏剧构作师，是她把福瑟介绍给瑞典戏剧界最有能量的女性之一贝丽特·古尔博格。古尔博格读《有人将至》的剧本，在里面听到一种“清澈深沉的音色，那闪耀的洁净、脆弱、黑色激情、幽默，让人想到洛卡、辛格、贝克特，似乎看到爱德华·霍普的画，似乎能听到由现代爵士四重奏演奏的赋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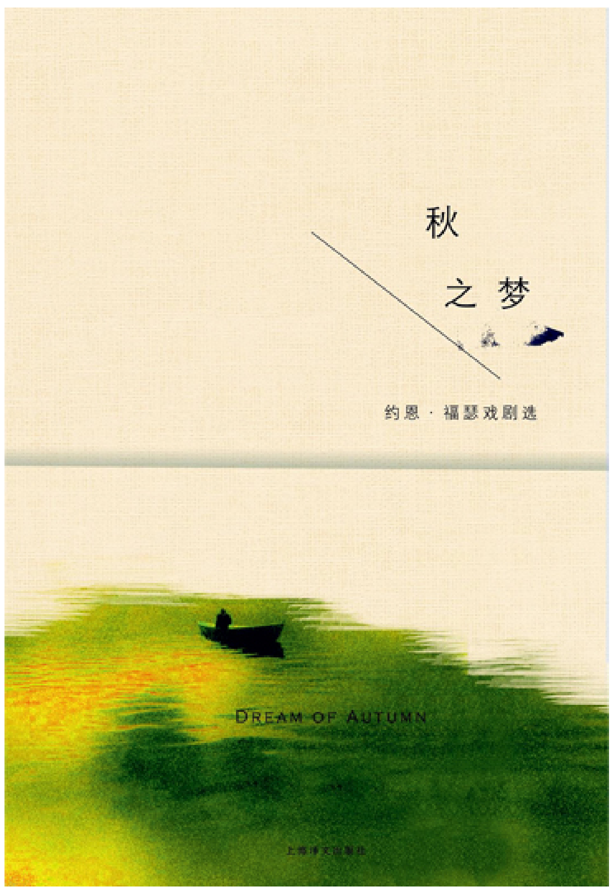
古尔博格曾经是英格玛·伯格曼的助手，她认识戏剧圈里所有该认识的人。于是，她自己成立了Colombine戏剧出版社，成为福瑟的戏剧代理。他的作品被翻译成瑞典语、丹麦语、法语、德语、英语、匈牙利语、波兰语。至于福瑟的翻译和推广为什么没有从某家挪威戏剧出版社开始，因为当时挪威没有戏剧出版社。一个瑞典独立剧团排了福瑟的戏，带到巴黎的法国喜剧节；古尔博格成功把福瑟推到英国的实验剧场，世界像一个牡蛎那样朝福瑟打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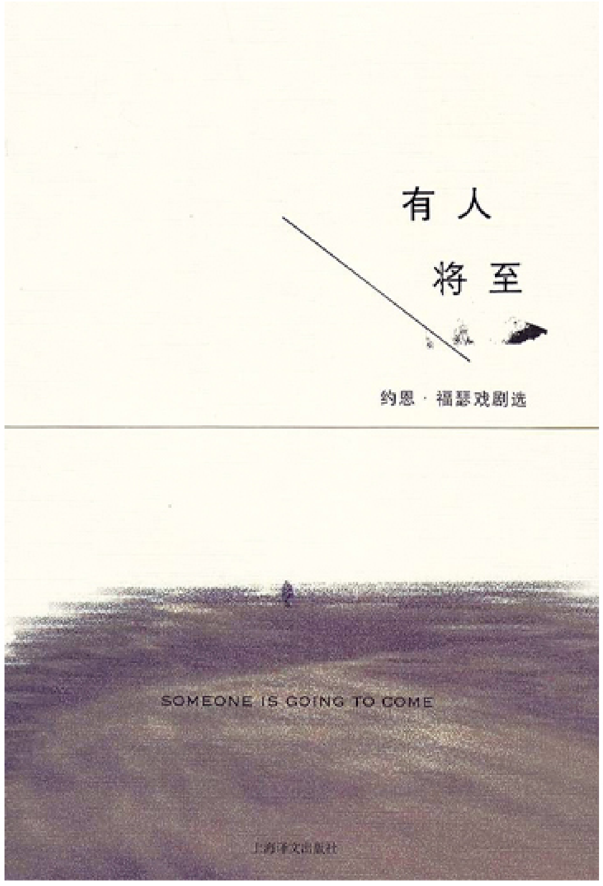
瑞典学院宣布2023年诺奖得主后，福瑟一系列作品被展出。图：Jonathan Nackstrand



2009年出版的挪威语福瑟传记。



福瑟作品中译本《有人将至》《秋之梦》。



福瑟作品中译本《有人将至》《秋之梦》。

挪威、瑞典、丹麦、冰岛和讲瑞典语的那部分芬兰作家的语言文学，都可以溯源至古北欧语（Norr?nt）传奇，这也是北欧文学圈的实在基础之一。在挪威或许是曲高和寡的福瑟，在见多识广的亲戚瑞典人这里找到知音，其戏剧已然呈交出艺术水平；而近作《七部曲》的完成和出版，则证明了他创造力的音色之宽广和弘厚，大概这就是是福瑟被掂量了22年后终于被一锤定音的那个砝码了。

版面编辑：李东昊

专栏｜重逢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很多重逢，乍看喜悦，深处可能是悲凉，是绝望。残酷的是，与人重逢常悲剧，倒是与物重逢大多是喜悦，是热烈



当地时间2021年8月23日，意大利博洛尼亚，97岁的美国退役军人马丁·阿德勒(Martin Adler)重返当地与他二战时救下的三个孩子重聚。图：视觉中国

文丨杨葵
作家

人活一世，与离别相比，重逢不知道是更多还是更少。由夏入秋之际，我常无端想到这件事。

夜凉如水，但是白天窗外的树木颜色由绿转红，倒是一天天热烈起来。气味也突然不由分说冲进鼻腔，是桂花香浓似蜜，也是热烈的。草木顺时生长，岁岁枯荣轮回，节奏稳而坚实。在心乱如瀑变幻莫测的人看来，这些草木也够怪，热的时候只管阴凉，该冷的时候倒热烈了，貌似别有深意的反差呢。其实生出这样的想法，只是我们俗人深陷二元概念的谜团，凉和热，收敛和热烈，诸如此类，草木才不管这些。

重逢和离别看起来也是一对反差。而且，早被二元论洗脑的我们，还会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分别赋以延伸对比。一般认为，离别总是悲凉，重逢常有喜悦。

显然不是。“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是重逢，起头欢笑好像是喜悦，落脚却是萧疏，是鬓已斑，怎么会是喜悦？“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也是重逢，可是这钟一敲，悲凉到头了。

老同学聚会是重逢，毕业30多年东零西落，绝大多数人从未聚首，乍一见，互认不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帧帧当年的影像瞬间奔来眼底，眼神还那样，语气也没变，就连一些标志性的小动作都不带走样儿的。这过程，相应的这首诗要倒着读才对——乍重逢，萧疏鬓已斑；过后是欢笑情如旧。

可惜欢笑不持久。大酒之后，微信群建起来，欢笑之后，群里鸡一嘴鸭一嘴，好不热闹，一派祥和。没过两天时势动荡，自然又聊到热点新闻，祥和不再，五花八门的三观激烈碰撞，多亏不是当面锣对面鼓，否则会大打出手吧。打够不着，就大吵出口。人人都有个性，一幕幕拉黑、退群，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

当初少年，经历少磨难少，三观都未定型。30多年过去，生存环境和各自经历不同，互不理解是正常的，分道扬镳也是正常的，所以悲剧也是注定的。

夫妇父母兄弟姐妹亲人之间，也会为各种原因久别重逢。这里说的并非日常出差或外出务工那一类，那是有去有回，君问归期有归期的小别；也有没回来的，纯属意外。这里说的是满以为从此天涯各方，连下落何处都全无知晓，只图梦里相见，重逢纯属意外那一类。想想1949年海峡相隔，想想后来的特殊年代，这类情形数不胜数。

这类重逢，和前述同学重逢情形不太一样。苏轼有词，“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虽是悼亡妻，记梦中相逢，现实中的此类重逢也大抵如此，因为确实在重逢之前，视作亡人了。

亲人重逢，也常难以跨越时间掘出的鸿沟。上世纪80年代，见过很多被海峡相隔了几十年的亲人，希冀亲情再续，渐渐发现都是徒劳。当时有部电影《牧马人》，说的是父子重逢，最终也唯有各过各，如同过去几十年一样，愿不愿意再重逢都难说。当然也不乏破镜重圆的事实，不过以我所见所闻，还是悲剧多。

比上述重逢更复杂、更容易折磨人的，是昔日恋人重逢。爱之火焰早已熄灭或早已各有所属还好，假如二人内心都还保有微暗的火苗，风风雨雨从未熄灭，或者有诸多爱恨情仇未及化开，其中曲曲折折百转千回，这样的重逢，每一桩都是一幕大剧，都是一部长篇小说。

友人中有一对恋人，女方新恋不断，但每次分手，都重新找回老恋人。老恋人始终深爱对方，觉得她总有厌了倦了的那一天吧，于是每一次都二话不说，再度百般呵护，朝花夕拾。如是一二三四五六，外人看来，不啻一场永无终结的肥皂剧。我曾问过男方，是爱这个人呢还是爱重逢？他说，爱火不灭，也是无奈。至于重逢，每当她再次离开，反倒习以为常，而每次重逢那一刻，面上是喜悦，内里却是无边无际的绝望。

你看，重逢未必是喜悦。或者说，很多重逢，乍看喜悦，深处可能是悲凉，是绝望。残酷的是，与人重逢常悲剧，倒是与物重逢大多是喜悦，是热烈。所谓失而复得，比如回老宅找到儿时玩具，比如丢了的东西又找到，收藏家们这类故事就更多了，那都是真正堪比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人，是多复杂的生物啊，哪有物好伺候。

开头说季节变换，草木枯荣，每年一轮回，我们和它们也是一次又一次重逢，直到我们的生命终点，它们又会迎接新一代人的重逢。这么说起来，每一次重逢，就在离别的道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人的一生，如果按婴儿幼儿少儿少年青年壮年这样一路列举下来，似乎出生是喜悦；可如果无情一点，比如像常说的“生老病死”所言，一出生就是老病死，就无从喜悦了。

当然，也可以不这么残酷，不妨这么想：离别中有重逢，重逢中有离别。这样是不是容易接受一些？

版面编辑：李东昊

专栏｜从宇宙之书到生成之书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在知识形态的演化路上，我们今天也许正处在巴别图书馆3.0的节点。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一种新的方式结构了或者压缩了宇宙之书



资料图：法国巴黎，黎塞留国家图书馆的主椭圆形展厅。图：视觉中国

文丨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文学青年喜欢引用博尔赫斯的诗：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在小说《巴别图书馆》中，博尔赫斯幻想了一个藏有记录人类所有知识的图书馆，这个无限延伸的六面体由数不尽的书架构成。在他看来，这些无限的知识才是宇宙的本质。

古往今来，无数人一直梦想建立这样一个保存人类所有知识的图书馆，被大火烧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可能在当时最接近这个理想。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不久、书籍总量尚在可控范围内，这个梦想似乎不难实现。按照金克木在《书读完了》里的设想，勤奋的读书人是有可能读完中国古籍的；欧洲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也有类似的思路，如果对人类18世纪掌握的知识删繁就简进行压缩，是有可能掌握大概的。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西海岸的嬉皮士也还想通过办一本《全球概览》浓缩所有知识。这种类似论坛式的知识结构，似乎预示着互联网文化的诞生。

不过在今天，像谷歌图书那样，将所有图书数字化似乎也并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网上前赴后继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再加上像Z-library这样的置版权于不顾的“公益”网站，也许有一天，等到没有什么人再看书、图书失去了经济价值，这个庞大的巴别图书馆没准还真能建成。

数字图书馆也就是博尔赫斯在一个脚注里提到的另一种宇宙图书馆——只有一本书的图书馆。这本书由无限薄的纸和无限多的书页构成。虚拟的数字图书资料库或者维基百科的完美版本，似乎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但是，如何找到我们需要的知识？没人能够读完这么庞大的藏书。如果人类身体之外的记忆工具所储存的“死知识”不能被激活，变成被理解和掌握的“活知识”，这些书籍仍然没有意义。所以对多数人而言，羡慕由图书馆构成的天堂只是叶公好龙，除非阅读者有无限的时间和兴趣，否则它也可能是地狱。

博尔赫斯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巴别图书馆里可能还存在着一本书，它是所有一切书的完整的压缩或者概要。但是在今天，真有可能编一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吗？

问题可能出在对媒介的想象过于贫乏。纸质书籍在媒介形态上存在缺陷，它只能以二维平面媒介的方式静态呈现，读者无法与之互动，更不可编辑（编程）。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明一种新的媒介，来重新组织这本宇宙之书。

1965年，尼尔森（Ted Nelson）提出了超文本和超链接概念。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紧密纠缠在一起。知识的存在方式并不遵循书本排列那样的线性秩序，层级的、封闭的结构只不过是人为强加给世界的秩序。尼尔森的思路

颠覆了人类熟悉的单向传播的书页结构，将其转变成彼此相互链接的复杂结构。就像大家熟悉的数字百科全书，没有开始和结束，每个页面的链接指向其他页面与知识，它们错综复杂地构成了一个无限的非线性的页面结构。它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网络，一种“可以举行集体婚礼的地方”：“真正的梦想是让一切尽在超文本中。”

尼尔森自己的超文本系统就是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的2.0版，它通过一个全新的媒介重新定义了宇宙之书。尽管这个系统2014年才真正上线，且没有任何实用性，但超文本思想启发了后来者。当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将这一思路与网页结构和地址结合在一起时，一种新的知识结构就诞生了。

在巴别图书馆2.0中，书籍被网页替代，图书的索引和目录被搜索引擎替代。但它仍然没有摆脱书页的形态，更像是把过去那些承载体系化知识的书拆成了无数纸页，再把它们用超文本规则链接在一起。读者仍要在这些页面间进行比较、跳转和阅读；链接只提供了道路，仍需人选择和行走。只有被人加工后，这些生的知识才能成为熟的知识。问题也随之而来——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不是正确的知识，也永远不知道是不是还遗漏了其他重要的知识。换句话说，无限知识的压力依然存在。

博尔赫斯在《巴别图书馆》里还提到过另一个解决问题的线索：也许这个图书馆的无限性只是人类的错觉，很可能是同样的一些书以同样的杂乱无章在重复。如果能找出这种知识中蕴含的规律，也许就能解决宇宙之书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与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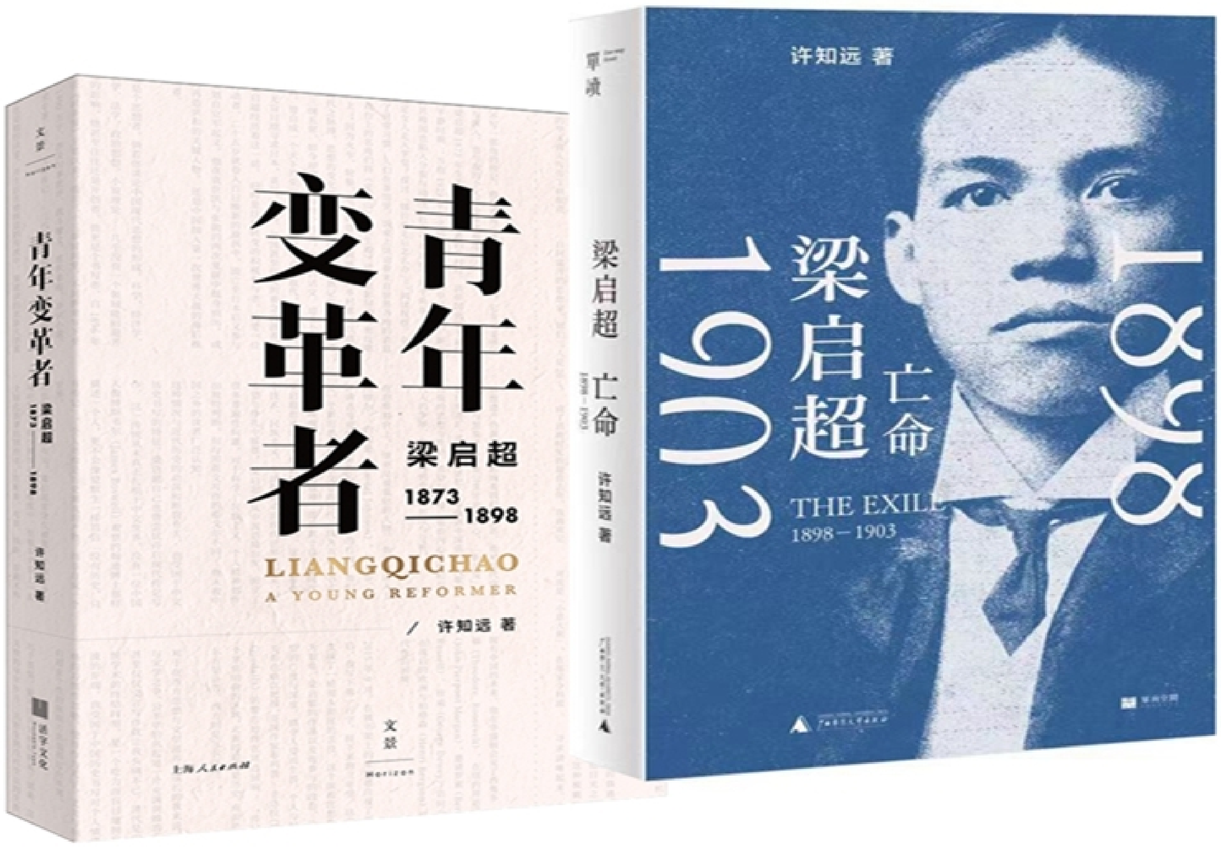
在知识形态的演化之路上，我们今天也许正处在巴别图书馆3.0的节点上。刚出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结构了或者压缩了宇宙之书。大语言模型通过对语言组合规律的总结，将杂乱的宇宙之书进行整理和重排，并在此基础上抛开对这些知识的简单呈现，另起炉灶，按照它发现的规律，重新生产知识。也就是说，它是在阅读了巴别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后，按自己的理解重新写了一本包含我们所有问题答案的新书。它真的把宇宙图书馆压缩成了一本书！

版面编辑：李东昊

阅读｜梁启超：启蒙与自觉的双重变奏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梁启超拼命消化新的知识和思想，然后天才地将之化约为通俗语言，源源不断地输入旧大陆和东京留学生的头脑中



《梁启超：亡命（1898—1903）》《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许知远 著

文丨李礼
历史学者

1903年5月12日，纽约，20辆汽车和几百人在站台迎接一位远来的年轻人。欢迎队伍以西洋乐团开道，一群中国儿童拿着小旗，上面写着"恭迎维新领袖梁启超"。这是梁启超流亡的第六个年头。如果说1898年变法失败时，他还是康有为背后的一个身影，如今这位漂泊海外的年轻人却获得了巨大影响力。这一年他在海外刮起旋风，在国内，青年们、官员们出于不同目的，公开或私下谈论梁和他的报纸，后者正成为一种广谱意义上的思想资源。

1898—1903年的中国和世界发生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许知远在2019年完成了梁启超传记的第一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之后，新近出版了传记的第二部《梁启超：亡命（1898—1903）》（下称《亡命》），试图让梁启超本人来回答这些对急剧变化中的清帝国意义重大的问题。

此时的"青年变革者"30岁，却已经开始回忆人生（《三十自述》）。过去几年的生活过于跌宕起伏，梁徘徊于革命与保皇，着迷于现代民族国家，并决意为此塑造"新民"。

这一切是两张报纸和四海流亡共同完成的。眼花缭乱的流亡之旅让梁启超兴奋，同样也让许知远兴奋。他一路尾随梁启超，用一连串地名——东京、横滨、夏威夷、新加坡、悉尼、温哥华、纽约、旧金山——跨越太平洋，近乎贪婪地捕捉着每一个历史信息。本书最吸引人之处，正是提供了一种"流亡"叙事。这两个字击中了很多2023年的读者，它既标注了一段历史，又升腾起一股巨大的现实感：世界正在见证新一代华人移民社会的形成，他们四海为家，兴奋而惴惴不安。

政治流亡是19世纪世界一大景观，这受益于通信技术与一个国际社会的形成。它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现代"产物，很大程度因为流亡者能利用各国现代进程中的"自由差"，扩大自身势力并借此赢得外国人和捐献者支持。《亡命》第二章"求救"为人们展示了这种"自由差"。英国和中国香港首先庇护了康有为，"这也是香港价值的另一种体现，它不仅展示了另一种经济、社会与技术理念，还接纳失败的改革者"；葡萄牙人治下的澳门保护着流亡者家眷，一个康门流亡社群凭借《知新报》和澳门的新闻自由，继续鼓吹维新。

东京此时已进入宪政时代，而且正流行着亚洲主义，"百日维新及其失败，给了这一合作潮流以新动力，也令东亚会与同文会找到了明确的着力点"。他们在康、梁不知生死的情况下发起了营救。1898年6月，恰逢大隈重信就任首相，意味着立宪党人翻开了日本政治新的一页。"大限主义"的理想，"立志要帮助朝鲜和中国摆脱专制体制，获得自由与民主"。东京在接纳中国维新党人后俨然成为一个新的流亡者聚集地，如同19世纪前几十年的伦敦、巴黎、苏黎世、日内瓦和布鲁塞尔。

19世纪末的中国人熟悉"通缉犯"，却并不熟悉现代政治流亡者。后者并非普通罪犯，而是被指控威胁政府、被

迫离开祖国的人，他们是持不同政见的"祖国的陌生人"，而在另一个国家却变成反抗暴政的英雄。这种对待政治流亡者的"文明差"，尤其体现在康梁的北美之旅。他们先后受到加拿大、美国最高当局的热情欢迎，过于兴奋的舆论甚至让梁启超有点措手不及。在最后一站洛杉矶，市政府的溢美之词简直让"这个30岁的流亡者突然跻身于世界领袖的行列"。

如果说1896年孙中山遭遇清国公使馆（伦敦）绑架后，从此变成一个世界人物，那么东京于梁启超也是如此。不同的是梁凭借的是手中的笔和两张报纸。

日本舆论对中国亡命者"表现出一种迟来且矛盾的兴趣"。欢迎的热情不久冷却了下来。很快康有为被得体地"驱逐"（见第三章"劝离"），梁启超则不仅在日本站住了脚跟，而且将影响力发散到世界。他很快成了中国流亡者的第一符号，正如他在一通家信里所说的那样，"海外华人仰慕他甚至过于老师"。

这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带来的一种结果，两份报纸延续并扩大了《时务报》主笔的魅力。"梁启超也正进入伟大的流亡新闻人的行列"，它始于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创刊，距离梁到日本不足两个月。它几乎是一个人的媒体，但发出的声音更有力量。在横滨，梁启超可以毫不忌讳地批评讽刺慈禧、荣禄和张之洞。报纸"采取了更直接的批评和控诉，创造出一种反对派的声音"。这种声音从境外发出，再传到国内，实为中国政治生活前所未有。

《清议报》延续着一种变法失败的愤怒，这是梁启超一生最为激进的时刻。1899年夏，他和孙中山交往频繁，并形成了一个疏离康有为的小团体"江岛十二郎"。这个在镰仓"江之岛"结拜的12位同学，显然以梁启超为首，"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孙文的革命思想，准备与他达成新联盟"。康有为则对此颇为愤怒，试图离散这种凝聚力。梁启超被老师派往檀香山，他没有如愿从那里进入美国大陆，却意外邂逅了一场恋爱。当1900年之乱袭来，梁短暂潜回上海，却目睹自立军惨败，之后命运把他从新加坡送到了澳大利亚。当他从"新金山"归来，"游历拓展了他的视野，令他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不久，《新民丛报》应运而生。

《亡命》几乎连续三章聚焦这份新杂志（《新民丛报》《新历史和新英雄》《留学生》）。这份刊物收敛了批评，把目标从统治者转向普通民众。梁启超拼命消化新的知识和思想，然后天才地将之化约为通俗语言，源源不断输入旧大陆和东京留学生的头脑中，其中充满了启发，鼓励着不满和抗争，正是这张报纸塑造了梁启超启蒙先驱的形象。

《新民说》系列无疑是《新民丛报》的灵魂。许知远用9页来诠释似乎仍略显单薄，不过考虑到它跨越1902年至1906年，或许能够理解本书涉猎有限。实际上，全面而自洽地解读这一组文章相当困难，因为正如本书所注意到的，它结构松散，逻辑上经常前后矛盾。这是梁启超思想"善变"的体现。《新民说》给人的初印象，可能是作者将民族国家置于第一位。梁相信"当今世界的竞争舞台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最重要的"群"乃是民族国家。他所提倡的"新民"，强调的并非个人至上，而是希望"合众人之力量以为力量"。

"如何理解国家"作为一条隐蔽的线索贯穿全书。从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影响到《新民说》，从第一章接触孙中山的共和理念到纽约旧金山之旅得出的结论：中国"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美洲之旅让梁转而支持"开明专制"。正如本书结尾所暗示的那样，这其中的思想转变也许将构成传记第三部的焦点。

不过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与清政府并不是一回事。他深刻指出爱国家和爱朝廷的区别，在报纸上大力鼓吹国家与朝廷分离。他笔下的国家与政府注定潜伏着一种紧张，这种张力在恰当时机随时可能导致冲突。他笔下的新民，自立而勇敢，也注定和传统温顺的臣民格格不入。他为开启民智的努力，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启蒙，而"新民"理论的系统阐释，"证明梁启超已具有对社会舆论独立发生影响的实力"。（夏晓虹：《文章与性情：阅读梁启超》）

"他尤其钟情于远方的流亡者、殉道者，赋予他们悲壮感、浪漫精神"，许知远笔下的梁启超在相当程度上投射着作者自身。不知何时开始，许知远对陌生感和他乡有一种格外的执着，他不安于待在一个熟人社会，受困于其中的亲密感。很难说这是天生敏感，还是对长期记者生涯好奇心的过度发挥。许很早便以游记著称。事实上，和伏案工作的书斋学者相比，这是他的显著优势。行走和现场不仅还原了细节，再造历史氛围，还提供了一种贯通古今的眼光和见识。或许正因如此，本书比第一本更加流畅，自信十足。"比起之前的梁启超传，我更充分地描述了时代情绪、城市气质、各地华人社区的面貌，以及同代人的选择。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个体精神与性格得以真正浮现"。序言里的这句话带着几丝骄傲，却相当中肯。

就文本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看的梁启超传记，而且凝结了相当深入的思考。新书注释比第一卷更加审慎，在一些学术争议的话题上处理得相当成熟，文献规模和质量总体上更加恰当。有批评者对作者的文献功夫表示怀疑，就某些主题的深度而言，这种评价可能不无道理，不过许的文献胜在开阔和发散，必须承认，它构成了另一种深度。更何况，历史现场本应作为广义文献之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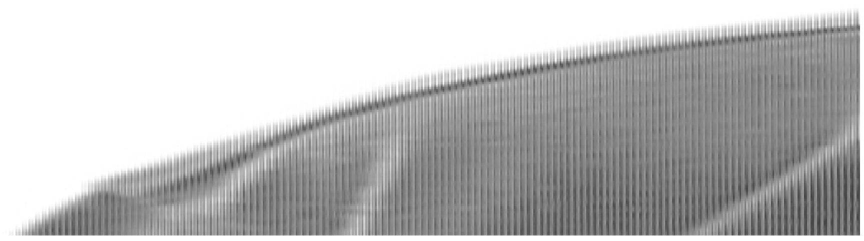
与第一卷相似，对资料的使用方法依然构成了对"文本"的某种妨碍。大段文言文被直接引用于正文，如孙宝瑄论梁启超、杨度与弘文学院校长的辩论。不少页面近半为引文占据，影响了叙事节奏，干扰了整体风格。此外，对文献的理解因人而异，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图书，作者理应给出更多自己的诠释。这个"形式"问题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许的文字以流畅叙事见长。当然这也可视为作者对旧我的挑战和一种学术雄心（后记中称是对张灏、列文森等研究的"某种回应"）。事实上，严肃历史写作中，作家和学者之间的所谓界限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许的写作也正被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尽管他们的看法和心态相去甚远。

版面编辑：李东昊

逝者｜郑光美：世界雉类研究带头人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郑光美（1932—2023）鸟类生态学家



郑光美（1932—2023）鸟类生态学家

文丨财新周刊 康佳

2023年10月3日，动物学和鸟类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光美在京逝世，享年91岁。

郑光美祖籍北京，1932年11月出生在哈尔滨。父亲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在日军占领东北之后，携一家老小返京。少年郑光美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完成学业，随着家道中落，不得不常常停学转学，断断续续读完中学。1949年，郑光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学习，1954年8月留校任教。1956—1958年在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毕业后回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工作。

1960年，郑光美带队在秦岭南麓科考。山高林密，环境苛刻，有时一天能打死几十条蝮蛇，补给一度消耗殆尽，他们最终扒上了进山拉木头的卡车才得以出山。这次科考成果卓著，团队偶然发现了大熊猫的皮毛、碎骨，并拼出了带有牙齿的大熊猫头骨。1964年，郑光美在《动物学杂志》上向世界宣布，首次在中国秦岭发现了大熊猫。这一发现，把大熊猫分布的区域扩大了1倍，秦岭大熊猫得到了科学界承认。

1983年，郑光美收到老师、鸟类学家郑新作的一封信，嘱托他尽力保护好我国特产珍禽黄腹角雉。角雉被称作“长角的鸡”，雌雄都有一对肉质的角，全世界仅存5种，其他4种在国外均有分布。黄腹角雉是中国特有的鸟种，喜隐蔽，常在茂密的林下灌丛和草丛中活动。当时，外国科学家推测这一物种种群仅剩60只。“怎么保护黄腹角雉？要回答这个问题，惟一的办法就是到野外去，到大自然去。”郑光美随后启程，走访多地，最终在浙江泰顺县乌岩岭方圆数百公里的林区里，拍下了世界上第一张野外生活的黄腹角雉照片。此后，他们对浙江乌岩岭黄腹角雉种群生存力的分析表明，百年内种群遗传多样性损失率为14%，绝灭概率为7.3%；巢卵损失率高、典型栖息地面积不足等，是造成这一隔离种群衰退的主要原因。

为了保护这一世界濒危物种，1985年，郑光美将黄腹角雉引种到北京，开展易地保护工作。他领导的团队攻克了存活、受精、孵化、育雏等难关，并建立濒危雉类人工授精、精液品质分析、精液低温保存等技术。目前已繁育出包括子6代百余只个体的、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纯系种群。在长时间努力保护下，黄腹角雉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摘掉了“濒危”的帽子。

为表彰郑光美的贡献，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杰出贡献奖等，2007年当选为世界雉类协会会长。世界雉类协会雉类专家委员会主席彼得·佳森（Peter J. Garson）称他为“世界雉类研究带头人”。

除了黄腹角雉、红腹角雉、褐马鸡、朱鹮这些濒危物种和光鲜亮丽的鸟类，郑光美还将目光集中于人们身边最普通的麻雀身上。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他坚持研究城市化过程对麻雀分布的影响、麻雀的生态位等问题，提出了评价麻雀益与害的新见解。有学生发文回忆，在汇报观鸟进展时，郑光美几次嘱咐，不要一味追求观鸟的物种数量，

一定要关注身边常见鸟类如麻雀、喜鹊、啄木鸟等。

郑光美依据国内外对鸟类分类和系统发育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鸟类的分类和分布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对世界鸟类分类系统和相关物种的分类地位进行了修订；主编出版《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卷）、《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第二卷 鸟类）》、《世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1—2版）、《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1—4版）、《中国雉类》等一批专著，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

在紧张的科学研究同时，郑光美并重教学，尤其是本科生教学。他主编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的教材，其中《普通动物学》和《普通动物学实验指导》累计印刷180万册，是国内该领域印量最大、使用最广泛的教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正旺撰文回忆，1982年，郑光美带着他们到北京小龙门林场进行动物学实习，当时郑光美年近50岁，清晨4点就带着学生观鸟。30多年后，北师大2020届毕业生如先古丽写道，年近九旬的郑光美和他们本科生一同前往小龙门，参与动物学野外实习，还主动把羽绒服借给衣衫单薄的同学。

郑光美在北师大工作近70年，"我努力教书、育人，热爱我的学生们"。1991年，他获评全国优秀教师。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版面编辑：李东昊